

糧食工作小叢書之一

蘇聯糧食問題參考資料

中央人民政府糧食部翻印

一九五四年三月

目錄

- 關於成立糧食收購機構以迎接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度收購運動的決議
一九二六年四月六日至九日的中央全會通過
- 關於一九二七——二八年的經濟指示（摘錄）
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聯共（布）中央委員會與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通過的決議
- 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委員會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摘錄）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日
-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十章第二節（摘錄）
- 斯大林：糧食收購運動的初步總結與今後黨的任務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三日第一次刊印
- 關於本年度收購糧食和組織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糧食收購運動的決議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一日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根據米高揚同志的報告
一致通過的決議
- 斯大林：在糧食戰綫上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與紅色教授學校、共產主義學院以及斯維爾德洛夫夫大學學生的談話摘錄
- 斯大林：論工業化和糧食問題
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的演說
- 適應總的經濟情況的糧食收購政策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聯共（布）中央全會根據米高揚同志的報告所通過的決議
- 斯大林：論工農結合和國營農場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一日的演說摘要
- 斯大林：關於聯共（布）中央七月全會的總結（摘錄第二、三兩節）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三日在聯共（布）列寧格勒組織積極分子大會上的報告
- 斯大林：論國家工業化與聯共（布）黨內的右傾（摘錄）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在聯共（布）中央全體會議上的演說
- 八二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十章第三節（摘錄）	九〇
關於一九二八——二九年國民經濟控制數字（摘錄）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全會一致通過的決議	九二
斯大林：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摘錄）	
一九二九年四月在聯共（布）中央全會上的演說	九九
斯大林：大轉變的一年（摘錄）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	一〇七
關於一九二九——三〇年國民經濟控制數字（摘錄）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全會通過的決議	一一〇
斯大林：論蘇聯土地政策底幾個問題（摘錄）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一一五
斯大林：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與結論（摘錄）	
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一日	一二七
斯大林：論農村中的工作（摘錄）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的演說	一二二
斯大林：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摘錄）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一二六
斯大林：在先進的男女收割機師會議上的演說（摘錄）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	一三〇
斯大林：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摘錄）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	一三三
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摘錄）	
一九五二年十月五日	一三五

關於成立糧食收購機構以迎接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 的收購運動的決議

一九二六年四月六日至九日的中央全會通過

一、供應國內糧食市場的利益、輸出的利益以及符合蘇聯國民經濟利益的價格政策的實行，都要國家掌握一個統一的糧食收購機構，這一機構按其收購的範圍和集中在其手中的糧食的數量來說，實際上既要能掌握收購市場，又要能掌握消費市場。

二、爲迎接即將到來的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糧食收購運動，這一基本糧食收購機構應由下列的統一的組織組成：

甲、穀物販賣股份公司；

乙、中央消費合作社聯盟；

丙、農村消費合作社聯盟；

這些組織有計劃地在蘇聯各地收購糧食。

三、爲了和那些與個別麵粉廠有聯系的、計劃外的私人的糧食收購機關的充斥所造成的糧食市場的混亂現象作鬥爭，必須在各地組織省和區的地方托拉斯，經內外貿易人民委員部允許，在個別情況下可組織較大的托拉斯聯合組織，在目前把烏克蘭麵粉托拉斯保留爲全烏克蘭托拉斯和組織省的北高加索托拉斯是適當的。

每個托拉斯只應該在它麵粉廠的活動區域內收購糧食並應該服從總的調撥指令，其主要任務在滿足

地方需要。

這些托拉斯如要收購超過地方市場的需要之糧食，其超過部分應通過主要的糧食收購機關、國家銀行或按照第七條的規定進行收購。

四、穀物販賣股份公司的基本目的是供應消費區、實行輸出和進行徵購，它直接經過自己的糧食收集所、麵粉廠、穀倉和採取與合作社組織訂合同的辦法向農民購買糧食。

通常穀物販賣股份公司在生產區內既不批發也不零售，並且根據消費合作社能够掌握零售的程度而縮減自己在消費區的零售額。

內外貿易人民委員部應改進穀物販賣股份公司的組織，加強穀物販賣股份公司各地方機關的責任，使它們和各地方組織對糧食收購工作的贏利更加關心。

五、鑒於有把合作社系統變成更強有力的銷售農民產品的機構的必要，中央全會認為必須最大限度地利用消費合作社和農業合作社來收購糧食，認為由合作社組織通過基層合作社系統向農民購買糧食乃是必要的條件。

基層合作社組織在本區內和與本區相聯的車站、碼頭附近收購糧食。

其他組織在下述情況下才能通過合作社網收購糧食，就是下層和中層的合作社除完成上級合作社組織和合作總社規定的任務外，還有多餘的收購能力。

穀物販賣股份公司、國家銀行和其他組織利用下層和中層合作社來收購糧食，一定要取得合作總社的同意。

內外貿易人民委員部應注意使合作總社或主要收購機關保證整個基層網能發揮全力進行收購。

六、實成國家銀行通過信貸、合同、代辦和其他各種業務來按照內外貿易人民委員部所規定的條

件、期限和數量購買糧食，以影響計劃外的糧食流轉。

國家銀行執行內外貿易中失委員部收購糧食的國家任務，只限於極少的數量。

國家銀行要與內外貿易人民委員部商定在何時何地撤銷國家銀行的糧食收購機關，和那些機關繼續參加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收購運動。

七、爲了防止不包括在計劃收購機關之內的個別組織收購糧食的混亂現象，不容許個別國家機關或合作社組織通過自己的糧食收集所直接收購糧食或直接向農民、向私人或基層合作社購買糧食，通常這些組織的糧食供應問題應通過與主要糧食收購機關、國家銀行或地方的麵粉托拉斯簽訂合同的辦法來解決。在上述方法不能保證需要的情況下，允許這些組織與生產區的合作社組織簽訂合同，但這些合同要在內外貿易人民委員部的地方機關裡進行登記。

八、爲了整頓全國的糧食市場，凡買賣糧食不是其直接職責的國家組織不允許進行任何買賣糧食的活動。

除國家銀行外，任何銀行和其他信貸機關一律停止撥款給國家的和合作社的組織收購糧食。

九、個別地區的糧食收集所的配置和個別收購機關中的糧食收集所的分配，由內外貿易人民委員部的地方機關規定之。

每個糧食收購機關在每個收購站上只能設一個糧食收集所。糧食收集所所長管理該糧食收購機關在該站的一切糧庫。

糧庫的面積、其最大的容量、對當地條件的最大適應性等等，均由糧食收購機關的地方事務所規定，由內外貿易人民委員部的地方機關（州的或省的）批准。

十、爲使主要的國家計劃收購機關和地方托拉斯在市場上的行動統一和協調，在市場上活動的各個

組織必須在中央、州和省訂立公約。

蘇聯內外貿易中央委員會或它的共和國、州和省的機關所批准的上述公約，應解決價格政策的實行問題，收購區的面積和收購條件，滿足計劃外的組織特別是地區的組織的需求的辦法，減低雜費的措施的實行，以及滿足地方消費市場的需求的辦法。

指定主要國家收購機關的地方辦事處的主任，應與邊區和州的執行委員會商得一致。

除合作社外，主要糧食收購機關要把在該地區收購糧食所得的利潤的一部分提歸地方預算，對這一點應作單獨的報告。

利潤提成的形式、數量和報告的辦法，由中央政府機關特別規定之。

十一、由於磨粉廠和糧食流轉有極密切的聯系，由於糧食的收購市場和消費市場要以麵粉工業供給麵粉的情況來決定，所以必須：

甲、使內外貿易中央委員會和合作社把麵粉廠掌握在自己的手裡。例外情形由政府規定；

乙、堅決減少租給私人的麵粉廠的數目，將其移交合作社、地方麵粉托拉斯或穀物販賣股份公司，即令歇業亦在所不惜；

丙、根據第三條的規定接入股原則成立區的地方麵粉托拉斯，在個別情況下成立規模較大的麵粉托拉斯；

丁、成立丙條所載的麵粉托拉斯，不必按照對所有地區都一樣的決定，而應根據地方條件逐步地成立起來；

戊、對建立新的麵粉廠實行批准制度；

己、麵粉廠的調整和管理一律由內外貿易中央委員會負責。

內外貿易中央委員部應和各加盟共和國的經濟會議共同採取措施，以使閉工的麵粉廠的數目適合於磨粉的需求。

有關的蘇維埃機關應在一個月內訂出把其他人民委員部和機關移交內外貿易中央委員部管理的手續和期限。

應向政府呈交蘇聯內外貿易人民委員部和各加盟共和國的麵粉廠管理機關的組織草案。

十二、關於組織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糧食收購運動的上述一般原則，應由蘇聯內外貿易中央委員部根據地方條件和過去運動的經驗應用到各共和國和各州中去。

十三、中央委員會認為，爲了順利地收購糧食，必須改善整個居民糧食供應系統，以保證收購價格和售實價格彼此更加適應。

(註一) 廢除國家進出口貿易局和烏克蘭國家進出口貿易局的糧食科，內外貿易人民委員部應在一個月內把移交這些組織的各種機關和資本給中央及地方的國家和合作社的糧食收購機關的計劃提交全蘇勞動國防會議。

(註二) 國家銀行參加糧食收購運動按照本決議第六條進行。

(註三) 莫斯科消費社聯盟和列寧格勒消費社聯盟有獨立的收購計劃，該計劃包括在中央消費合作社聯盟的總計劃之內。

(註四) 通過政府在兩星期內製定一個關於收購釀酒業的油籽和玉蜀黍的特別指令草案。

(譯自「聯共(布)歷次會議決議」一書俄文版第二卷第九七——一〇〇頁。)

關於一九二七——二八年的經濟指示（摘錄）

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聯共（布）中央委員會與中央監察委員會
聯席全會通過的決議

（上略）

九、在確定一九二七——二八年的經濟遠景時，必須考慮到：由於農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還存在着盲目性的因素，由於乾旱地區的農業尚未實行改造，因此在連續三年豐收之後，在最近一二年內可能發生歉收。因此在一九二七——二八年必須採取許多特殊的預防辦法（組織糧秣儲備，增加國家糧秣儲備，保證供給乾旱地區抗旱種籽，獎勵非乾旱地區擴大播種面積等）。對農業的財政撥款，必須與這些任務，與國家預算增長的速度，與國家銀行及農業銀行系統信貸能力的增長速度相適應。

在基本農民群眾經濟上昇之中，鄉村中的富農階層也增長了。在這種情況下，一切的與蘇維埃的機關必須特別注意，堅決貫徹黨關於協助一切貧、中農羣衆的經濟上昇，全力幫助農村貧農，保護貧農利益（特別是在稅收政策、合作社與機器共用社的信貸等方面）的指示。必須採取堅決措施改進農業、信貸合作社的工作方法，以便克服在實際工作中途反黨關於保證貧、中農羣衆利益的指示的現象。此外，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認為，明年在國家預算與地方預算中必須增加貧農補助基金，並保證增加農貸基金中的長期貸款，特別是機器供應基金。

十、估計今年收成大體上可算中等（雖較去年稍低），中央委員會與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認為在行將到來的購糧運動中，必須保證完成五千萬普特以上的國家糧秣儲備。

要使糧食價格與特種作物價格大體上保持去年的水平，必須規定各種作物之間與各個生產地區之間更適當的差價。爲着消滅農產品首先是糧食採購價格與銷售價格之間的脫節，必須縮減商品流通網的開支，以便不僅用以補償某種作物及個別地區因採購價格較高而增加的開支，而且可以保證進一步降低銷售價格。

由於連續獲得兩次豐收的結果，農村中存有大量餘糧，這就使我們有可能在明年擴大糧食採購計劃。而順利完成這一計劃的前提，就是運送大量工業品至糧食採購地區，以滿足農民的需要；將工業品價格降低到農村消費者有力購買的程度；並全力協助糧食採購機構的工作。

(下略)

(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聯共(布)關於經濟建設的決議」第二輯，第二九

—三〇頁。)

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

委員會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摘錄）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日

（上略）

（乙）我國農業發展速度與我國國有化工業發展速度相較起來這種相對較遲的原因何在呢？

這原因一方面是由於我國農業技術過分落後和農村文化水準非常低微，另一方面特別是由於我們的散漫農業生產不像我們國有化的聯合經營的大工業那樣擁有種種優勢。第一，農業生產不是國有化的，不是聯合經營的，而是散漫和分成許多小塊的。它並不是按照計劃經營而是絕大部分暫時還受小生產自發勢力支配的。它還沒有按集體化路線聯合成爲規模巨大的經濟，因而它還是一種使富農份子便於進行剝削的場所。這些情況就使散漫的農業不能像我們國有化工業那樣擁有種種巨大優勢，即聯合一致按計劃原則經營的大規模生產所具有的那些巨大優勢。

農業的出路何在呢？也許是在於一般減低我國工業發展速度，尤其是減低我們國有化工業發展速度麼？絕對不可這樣作！這樣作就會是極反動的和反無產階級的妄想。（喊聲：「對呀！」）國有化工業應該而且一定會加快速度向前發展。這就是保證我們向着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條件。這就是保證農業本身終歸工業化的條件。

究竟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於用公共耕種制做基礎來把零散的小農莊聯合爲大農莊，用新的更高的技術做基礎來實行集體耕種制。

出路就在於循序漸進，然而一貫到底地，不是用強迫方法，而是用表彰和說服方法，把小的和極小

的農莊聯合爲大的農莊，以公共的共耕式的集體的耕種制做基礎，同時採用農業機器和拖拉機，採用增加農業強度的科學方法。

(中略)

黨底任務：擴大合作社和國家機關在銷售及供給方面包括農民經濟的範圍。並在我們農村建設工作方面提出一個迫切實際任務：即逐漸把散漫的農民經濟轉移到聯合的巨大的農莊軌道上來，轉移到以農業強度和機械化爲基礎的公共集體耕種制軌道上來，因爲這條發展道路是加快農業發展速度和克服農村中資本主義成份的極重要手段。

(下略)

(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第三二——三三、三六頁)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十章第二節(摘錄)

(上略)

農業，特別是穀物業方面的情形，却就不同了。雖然農業整個說來已超過戰前水準，但它的主要部門——穀物業——出產總量，却祇等於戰前水準百分之九十一，而穀物出產總量中的商品部分，即賣出供給城市需要的部分，至多也不過等於戰前水準百分之三十七，並且當時所有一切事實都說明，穀物出產總量中的商品部分有繼續低落下去的危險。

這就是說，一九一八年開始在農村中發生的那種由巨大商品經濟單位碎裂為細小經濟單位，再由細小經濟單位碎裂為極小經濟單位的過程，仍然繼續着，細小和極小農民經濟變成為半自給的經濟，祇能出產最低限度的商品穀物，一九二七年時期穀物業所出產的穀物，雖然只稍微少於戰前穀物業所出產的數量，但當時穀物業所能賣給城市的穀物，却只稍多於戰前穀物業所能出賣的數量三分之一。毫無疑義的，讓穀物業所處的這種狀況繼續下去，那蘇聯的軍隊和城市居民就會陷於經常挨餓的境地。

這會是穀物業的危機，在這種危機後面一定會有畜牧業的危機跟着發生。

爲要逃出這種狀況，必須在農業方面過渡到能運用拖拉機和農業機器並把穀物業商品產量提高幾倍的大規模生產。

(下略)

(一九五三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三五三頁。)

斯大林：糧食收購運動的初步總結與今後黨的任務

（給聯共（布）各級組織）

一個半月以前，即一九二八年一月初，我們在糧食收購方面有了極嚴重的危機。截至一九二七年一月初為止，我們共收購了四億二千八百萬普特糧食，而截至一九二八年一月初為止，收購的糧食勉強達到三億普特。所以，拿一九二八年一月初和一九二七年一月初比較，我們少了一億二千八百萬普特糧食。這個缺額也就是糧食收購危機的概約的數字表現。

糧食收購危機表明什麼呢？它的意義和可能產生的後果如何呢？

首先表明工人區發生了供應危機，這些地區的糧價上漲，工人的實際工資下降。

第二表明紅軍的供應發生了危機，紅軍中產生了不滿情緒。

第三表明種籽和植棉區的供應發生了危機，這些地區出現了投機的糧價，棉農和蔗農改種糧食；因而棉、蔗生產縮小，有關的紡織工業部門也隨之縮小。

第四表明國家手中缺乏糧食儲備，不能滿足國內需要（逢歉收時），也不能滿足為輸入裝備和農業機器所必需的出口需要。

最後表明我們的整個價格政策遭受破壞，穩定糧價的政策遭受破壞，不斷減低工業品價格的政策遭受破壞。

爲了擺脫這些困難，就應當彌補損失並消滅糧食收購上達一億二千八百萬普特的赤字。要消滅這個赤字，就應當使黨和政府的一切槓桿動作起來，打破各組織中的死氣沉沉的狀態，把黨的優秀力量自上

而地下地投到收購糧食的戰線上，充分利用泥濘時期到來之前一段短時期，無論如何要加強糧食收購工作。

正是爲了這種目的，聯共（布）中央發出了頭兩個購糧指示（第一個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發出，第二個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發出）。但因爲這兩個指示沒有發生效力，聯共（布）中央不得不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六日又發出第三個指示，這個指示不論按其語氣或要求來說，都是絕無僅有的。指示的結尾提出，如果黨組織的領導者在最短期間不能徹底扭轉糧食收購工作的現狀，那末就要對他們採取強硬手段。顯然，這種強硬手段只能在特殊情況下運用，而且，黨組織的書記們並不是爲公務工作而是爲革命工作的。可是，中央由上述特殊情況出發，認爲採取這一步驟是適當的。

引起糧食收購危機的原因有很多，但必須指出下列幾個原因：

第一，農村是在發展並富裕起來。富農首先發展了，富起來了。三年的豐收是有其作用的。今年的餘糧不比去年少，正如今年國內工業品也不比去年少而比去年多一樣。可是農村富裕階層今年已可依靠原料作物、肉類產品等實行周轉，而國下糧食以便抬高糧價。誠然，不能認爲富農是糧食的主要持有者，但他們是農村中的經濟權威，他們和肯出較高糧價的城市投機商有勾結，只要不遇到我們糧食收購機關的阻撓，他們就有可能在抬高糧價的問題上，在破壞蘇維埃的價格政策的問題上使中農跟着他們走。

第二，我們的糧食收購機關未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它們濫用壓價和各種「依法」加價的辦法，它們不去制服投機商，反而互相拚命競爭，破壞了糧食收購機關的統一戰綫，使糧價上漲，不自覺地幫助了投機商和富農去破壞蘇維埃的價格政策，使市場惡化並降低了收購工作。誠然，黨是可以實行干涉而消滅這些缺點的。但是黨爲去年糧食收購的成績所陶醉，同時又忙於爭論（一），於是放過了這些缺點，以爲一切缺點自然而然後就會克服的。而且，有許多黨組織形式主義地對待糧食收購工作，好像這個工作

與它們無關，忘記工人階級對糧食收購工作中的缺點，以及對一切經濟的與合作社的組織工作中的缺點所負的責任，首先是擔在黨的身上。

第三，我們的農村工作路線在許多地區被歪曲了。「依靠貧農，和中農建立鞏固的聯盟，一分鐘也不要停止對富農的鬥爭」這個黨的基本口號，往往執行得不正確。各級黨組織已經學會了和中農結成聯盟，這是黨的一個巨大成績，但是這些組織還沒有把各地的貧農工作做好。至於說到同富農和富農危險作鬥爭，那末，我們的黨組織在這方面也還沒有作到它們所應作的一切。就中這是因為，在我們各組織中，不論是黨的或其他的組織中，最近出現了一些黨的異己分子，他們看不見農村中有階級，不懂得我們階級政策的基礎，企圖這樣來進行工作：在農村中誰也不去得罪，同富農和平共居，在農村「各個階層」中都保持聲望。顯然，在農村中有這種「共產黨員」是不能改善我們的農村工作，不能限制富農的剝削趨向，也不能把貧農團結在黨的周圍的。

其次，到正月時，農民的購買力因非穀類農作物、畜牧、外出幹活等收入增加而較去年大為提高，同時運往農村的工業品數量雖然已經增加，但商品的供應在價值上却有些減少，也就是說，商品的供應落後於購買力的提高。

這一切，和我們工作中的一些錯誤（如工業品運至農村遲緩、農業稅徵收不足、不善於吸收農村物資等等）結合起來，就造成了引起糧食收購危機的條件。

不言而喻，應對這些錯誤負責的首先是中央委員會，而不僅是黨的各級地方組織。

爲了克服危機，首先必須使各級黨組織行動起來，告訴它們糧食收購工作是全黨的事情。

第二，用打擊投機商和富農投機分子的辦法來制止投機活動並使市場正常起來，爲此必須利用那些對付必需品的投機的蘇維埃法律。

第三，必須利用關於離派、農民公債和禁止釀造私酒的法律來吸收農村游資。

第四，必須使我們的糧食收購機關受黨組織的控制，迫使它們停止互相競爭，責成它們執行蘇維埃的價格政策。

最後，必須使黨的路綫在農村實際工作中不再受到歪曲，把對富農危險作鬥爭的任務當作工作重點，責成我們的黨組織「繼續向富農進攻」（見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關於農村工作」的決定）。（二）從中央委員會的指示中可以知道，黨在加強糧食收購工作的鬥爭中，正是採取了這樣一些措施，並在全國開展了相應的運動。

在另外的條件和情況下，黨也許採取其他的鬥爭方式，譬如把幾千萬普特糧食拋到市場上去，以此困住農村中不肯拿糧上市的富裕階層。但是爲此國家手中就要有足够的糧食儲備，或者有充分的外匯儲備，以便從外國輸入幾千萬普特糧食。但是，大家知道，國家沒有這些儲備。正因爲沒有這些儲備，糧食在黨面前的就是中央委員會指示中所說的那些非常措施，這些措施已在開展了的糧食收購運動中表現出來，其中大部措施只能在今年收購糧食的時期內有效。

有人說我們好像在廢除新經濟政策、實行餘糧收集制和剝奪富農財產等等，這是反革命的胡說，必須與之進行堅決的鬥爭。新經濟政策是我們經濟政策的基礎，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不會改變。新經濟政策意味着商品流通，意味着在國家有權和有可能以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調整商業的情況下允許資本主義存在。否則，新經濟政策就會是單純地恢復資本主義，這一點是大談廢除新經濟政策的反革命造謠者所不願意了解的。

現在，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斷定，我們採取的措施和開展的糧食收購運動，已經給黨贏得了首次決定性的勝利。各地收購糧食的速度已猛然提高。一月份收購的糧食比十二月份增加了一倍。二月份收

購糧食的速度又有所提高。糧食收購運動對於我們所有的組織，不論是黨的、蘇維埃的或合作社的，都是一次檢查，它幫助這些機關清除化分子，提拔新的革命工作人員。各種糧食收購機關工作中的缺點已暴露出來，並在糧食收購運動的進程中制定了糾正這些缺點的辦法。黨的農村工作已在改進和有生氣，歪曲黨的路綫的現象已在克服。富農在農村中的影響正在削弱，貧農工作日趨活躍，農村蘇維埃的工作人員正在加強，蘇維埃政府在農民基本群眾（包括中農）中的威信正在提高。

我們顯然正在擺脫糧食收購的危機。

但是，除了在實際工作中執行黨的指示所得到的上述成績外，還有許多歪曲和過火行爲，如不加以克服就會造成新的困難。這些歪曲和過火行爲就是個別地區企圖採取直接的商品交換，強迫推銷農業公債，建立類似巡查隊的組織，以及濫肆捕人，非法沒收餘糧等等。

所有這些現象必須堅決消滅。

除了進一步加強各機關的工作以使糧食收購計劃全部完成外，中央委員會並責成各級地方黨組織和蘇維埃機關立即着手進行春耕運動的準備工作，保證能擴大春耕播種面積。

應當在農村貧苦階層和中農中間展開一個團結的、友好的、有組織的、得到集體農莊特別支持的大播種面積的運動，來對抗個別富農投機分子關於縮小播種面積的鼓動。

根據上述情況，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建議：

- （一）毫不放鬆並繼續加強糧食收購運動，無論如何要完成全年的糧食收購計劃。
- （二）加緊和一切直接或間接提高公議價格的方式作鬥爭。

（三）堅決消除國家和合作社糧食收購機關之間的競爭，在同投機倒把抬高糧價的收買商和富農進行鬥爭時，真正保證收購機關的統一戰綫。

(四) 繼續對富農，即對那些真正持有剩餘的商品糧的大戶施以壓力，但要完全根據蘇維埃法律來執行（其中，對擁有兩千普特或更多剩餘商品糧的富農中的個別蓄意破壞分子，應依照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刑法第一百零七條以及烏克蘭法律中相當的條款處理），千萬不要用這些或類似的辦法來侵犯中農。

(五) 從依法沒收的投機商和富農投機分子的餘糧中，抽出百分之二十五以長期信貸方式去滿足貧農對種子的需要，必要時也滿足他們的消費需要。

(六) 堅決取締在加緊糧食收購運動的實際工作中發生的歪曲和過火行為，在個別情況下這種行為會發展為採用徵收餘糧的方法，如挨戶徵收糧食，在個別地區之間設搜查隊等等。

(七) 在處理農民拖欠國家款項時（欠農業稅、保險費、貸款等），繼續對農村富裕階層施以壓力，特別是對富農階層施以壓力，對貧農，必要時也對貧苦中農，則採取減輕或優待的辦法。

(八) 在攤派方面，對富農和農村富裕階層採用較農業稅為高的累進率。保證對農村貧苦階層免除攤派，對貧苦中農和紅軍家屬減輕攤派。在各地開展攤派運動時，要發揮社會的自動精神，廣泛吸收貧農、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婦女代表和農村知識分子參加這一工作。對攤派得來的款項應嚴格實行專款專用，不許挪作機關經費，要在農民大會上具體討論和批准動用的事項、支出預算等等，款項的使用並要受廣大公眾的監督。

(九) 堅決取締用行政手段推銷農民公債的現象（用公債券買糧食，挨戶強行分配公債等等），集中注意力向農民解釋農民公債對他們的好處，並利用農村中社會團體的影響和力量在農村富裕階層中推銷農民公債券。

(十) 在滿足糧食收購區對工業品的需要方面，不要削弱注意力。取締已經出現的糧食和工業品交

換的直接和間接方式，在特殊情況下，對於奇缺的商品，可以把優待合作社勸募的辦法擴大到未參加合作社的農民，只要他們肯出賣糧食。

(十一) 在收購糧食的進程中，繼續檢查工作，並堅決清洗黨、蘇維埃和合作社的組織，驅逐異己分子和混進來的壞分子，以堅定的黨員和經過審查的非黨工作人員代替他們。

斯大林受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委託而作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三日第一次刊印

(譯自「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

〔一〕這裡指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反對派聯盟迫使黨進行的爭論。一九二七年十月，即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前兩個月，黨中央宣佈了全黨的爭論。關於此次爭論，見「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三五〇—三五二頁。——俄文編者註

〔二〕見「聯共(布)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四一年版第二卷第二五五頁。——俄文編者註

關於本年度收購糧食和組織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

糧食收購運動的決議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一日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

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根據米高揚同志的報告一致通過的決議

在一般的生產力特別是國營工業的生產力的迅速增長的背景上，特別是在三次總的豐收之後，本年度糧食收購運動遇到了許多困難，這些困難一時會造成演為總的國民經濟危機的威脅（糧食的收購、原料的收購、工業原料的供應、城市的供應都有中斷的危險，出入口計劃也有遭受破壞的危險）。

市場的均衡之遭到急劇的破壞，是產生這些困難的基礎，而市場關係（一方面是農村的需要，一方面是工業品的供應）中的不均衡的現象的尖銳化則是由農村收入特別是富裕階層和富農收入的增加引起的。

農村的需要之超過工業品的供應，由下述各種原因引起：工業品價格的減低，技術作物和畜產品價格的同時提高，技術作物和畜產品在農業中的比重的增加；臨時工人的工資總數的大大增加（這首先是與建築的擴大分不開的）。農村的購買力提高了，但商品的供應沒有相應地增加（供給農村的商品在數量上是增加了，但由於價格的降低，其價格總和並未增加），對農村富裕階層的課稅沒有相應地提高，對非農業上的收入沒有徵稅。另一方面，穀物價格跟技術作物和畜產品的價格相差很大，從納稅的觀點

來看，穀物的生產不如其他農業部門的生產有利。這一切原因加在一塊，就減少了對出賣餘糧的刺激，由於市場糧食供應的縮減，農村糧食的消費增加了，存糧增加了。這種經濟情況是與社會階級表現分開的。由於農村進一步的分化，這種情況遂使富農階級（雖然大部分糧食沒有掌握在富農手裡，但富農在經濟上的比重是增加了）有可能利用其在市場上的地位並與私商一道擾亂市場。

國家的和合作社的收購組織沒有在市場上一致行動（而是激烈競爭，在客觀上幫助了私商和富農），沒有以必要的速度開展工作，同時沒有及時地展開廣泛的行動來根據主要收購區的需求把工業品在規定的期限內運往收購區去，這一切，更使富農階級能夠利用這種市場情況。另一方面，黨的組織放鬆了與收購糧食有關的當前的重要任務，以為糧食收購工作會自然而然地獲得很好的效果；某些黨組織特別是農村的黨組織表現得軟弱無力，沒有給富農以應有的反擊，沒有適當地使貧農和中農發揮積極的作用。

上述經濟情況的形成，富農階級對這種經濟情況的利用，實行工業品分配計劃時的錯誤（工業品的運輸發生遲誤現象），一般計劃工作的錯誤（對農村上層分子徵稅不夠，穀物價格與其他農產品價格相差很大等等），工業品的增產的暫時落後，各機關（包括黨組織在內）的組織性和積極性的不夠（這一點雖然排在最後，但也起極重大的作用），這一切加在一起，遂造成極大的經濟困難，這些困難是在生產力和社會主義成份大為增長的背景上出現的，如能及時而正確地使主要的經濟要素保持平衡並消除經濟機關和黨的機關的缺點，這些困難是不會有的。

二

爲了消除整個經濟危機的威脅，保證供給城市以糧食並保持黨所採取的國營工業化速度，中央應採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緊急措施在內），這些措施的最近的目的是：

（一）加強工業品的生產和運輸，甚至暫時減少城市的供給，以供應糧食收購區的農村市場；

(二) 加重對農村上層分子的課稅以吸取農村積累起來的一部分資金，同時把所吸取的大部分資金用於農村本身的生產事業上去（加強農民經濟公債，攤派法；徵稅期限上的嚴格的紀律等等）；

(三) 打擊進行糧食投機、抬高糧價並使工人、貧農和紅軍遭受飢餓威脅的富農和投機糧商（運用第一〇七條，將依法沒收投機家的糧食的百分之二十五貸給貧農等等）；

(四) 建立糧食收購機關的真正一致的行動，停止它們之間的競爭；

(五) 在實行減低工業品價格的政策條件下，保證實行蘇維埃的穩定糧價的政策，反對合作社組織、蘇維埃機關和黨的機關個別人員在這一問題上的任何動搖；

(六) 黨要干預糧食收購工作，從上而下地動員黨的力量以順利展開糧食收購運動；

(七) 在糧食收購區的蘇維埃機關、合作社組織和黨的機關中進行審查，把腐化分子、看不到在農村中的階級和不願與富農「吵嘴」的人清洗出去。

中央和中央監委聯席全會認為，如不實行上述這類措施，就不能消除糧食收購方面的極嚴重的困難。

因此，聯席全會完全贊同政治局本年一月六日和二月十三日指示信中的糧食收購問題方面的路線。

現在我們可以完全有根據地認為，黨的上述各種措施（其中相當部分是緊急性的）在加緊糧食的收購上獲得了極大的成績。截至本年一月一日止，本年度上半年的穀物收購數量較上年度同期少一億二千八百萬普特，而今年的三個月（從一月一日至四月一日）則比上年度同一時期多一億一千萬普特，這就是說，幾乎完全補足了少購的數量；各種穀物的收購（九個月內）共為六億四千四百萬普特，而上年度的九個月僅收購六億一千七百萬普特。因此，收購量已經總的提高，雖然某些穀物還收購不足。

因此，我們減輕了和最後消除了城市、紅軍和工人區的糧食供應中的中斷現象，防止了實際工資的

減低，消滅了產棉區、產麻區和伐木區的糧食供應不足的現象，以及儲存了一定的最低的數量的糧食。

三

中央和中央監委聯席全會認為，雖然中農的上層有些不滿，特別是由於一些偏差和過火行為而有所不滿，但黨在農村中的工作已經改善和有起色，富農階級的作用和影響已經減弱，貧農中間的工作已經活躍，蘇維埃政權在基本農民群眾中的威信已經提高。

黨的和蘇維埃的機關在各地所犯的這些偏差和過火行為，必須斷然糾正，黨要宣佈與它們作最堅決的鬥爭，因為如不糾正，它們就會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造成長期的不良的後果。

屬於這類偏差和過火行為的方法，不僅打擊富農，而且打擊中農，事實上是偷偷地向餘糧徵收制的道路，這些方法就是：沒收餘糧（沒有依法運用一〇七條）；禁止農村內部買賣糧食；或禁止一般「自由」糧食市場；進行搜索以「發現」餘糧；組織攔阻隊；強迫分配農民公債，折成糧食；用行政命令壓中農；實行直接產品交換制；如此等等。

中央和中央監委聯席全會斷然宣告，這種對黨的路綫的歪曲，與黨的一般方針，與中央因現時糧食收購運動中發生的特別困難而實行的各種緊急措施，毫無共同之處。聯席全會要求與這些方法作無情的鬥爭，並消滅這類偏差和過火行為，因為它們破壞黨的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威脅着城鄉之間的經濟聯繫，破壞信貸制度，削弱信貸制度，削弱工人階級與基本中農群眾的聯盟。

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的「繼續展開對富農的進攻」的口號，只是在「新經濟政策」（它是社會主義大工業與小農經濟相結合的唯一正確的形式）和嚴格實行無產階級國家的革命法制的基礎上實現的。因而對富農的進攻應該在下列基礎上進行：使大量的農民經濟進一步商品化，加強城鄉物資交流，促進農

業的高漲（農業方面的缺點已爲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指出）。展開對富農進攻的辦法，一方面是不斷加重對富農的課稅，限制其剝削傾向（勞動法，租賃法，一般土地政策，在機器供應和農業貸款等方面的階級原則，以及其他等等）。另一方面是大力和全面支持廣大農民群眾的合作化，支持各種形式的集體經濟，支持農村中的貧農組織，並且以各種方式和方法加強國家和計劃對市場與小農經濟的影響。

「新經濟政策」是黨堅定不移地所走的道路，只有經過這條道路才可能實行對全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因而富農分子、耐澆曼及其應聲蟲關於廢除新經濟政策的惡意宣傳，必定遭到黨的堅決回擊。因而黨必須特別堅決地消滅各種偏差與過火行爲，雖然中央政治局已發出相當的警告，但是這些偏差與過火行爲在實際活動中仍未徹底根絕。

中央與中央監委聯席全會認爲，今年在收購糧食中遇到各種困難決不是一種偶然現象。這些困難是與國內外環境促使無產階級國家採取的高速度國家工業化所遇到的困難，與計劃的經濟領導方面的錯誤息息相關的。農村中的富農分子與投機家企圖利用這種困難情況，抬高糧價，破壞蘇維埃價格政策，因而使得這些困難更爲加重，更爲複雜。鑒於糧食收購上的困難在將來也會出現，黨必須盡極大的努力，務使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關於「繼續展開對富農的進攻」、調整私人市場、使合作社與國家機關有步驟地把個體農民經濟納入社會主義建設軌道的口號得以實現。

同時，聯席全會認爲，隨着糧食收購上的困難的消除，黨所採取的那些緊急措施也就應該取消。中央和中央監委聯席全會委託政治局採取一切措施，以保證在將來的糧食收購運動中收購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同時估計到黨從本年度糧食收購工作的錯誤和缺點中所取得的教訓。

中央和中央監委聯席全會認爲，在基本經濟措施方面首先必須使國民經濟的各個要素之間有更正確的比例，使它們相互之間有應有的計劃上的聯系。

鑒於工業產品特別是供應廣大市場的工業產品已大為增加（去年為百分之十五，今年增為百分之二十七），中央和中央監委聯席全會委託政治局採取一切措施，以便：第一、避免工業產品在夏季發生季節性的縮減，第二、專門控制最暢銷的工業品作為後備，以便在糧食收購運動熱烈展開時供調撥之用。

鑒於國家為春耕地播種發放的種籽貸款比去年增多一倍（去年為一千三百萬普特，今年為兩千九百萬普特），按訂購合同而預付給農民的款項增為一億三千五百多萬盧布，集體農莊建設的撥款增加一倍（撥給集體農莊的專款共為六千五百萬盧布），農業撥款的總數已超過七億一千七百萬盧布（這應大大推動農業的發展），中央和中央監委聯席全會委託政治局採取各種措施，以保證一般播種面積特別是穀物播種面積的產量的增加，同時還採取各種措施，特別是擴大本國的複雜機器與拖拉機的生產，以保證集體農莊生產基礎在未來一年中大大加強。

鑒於百分之三十五的貧苦農戶已免徵農業稅（這是近幾年的重要成就之一），對農村上層分子徵收的農業稅已有增加，中央和中央監委聯席全會委託政治局特別注意抓住富農分子之非農業收入，把穀物生產的課稅與農業其他部門的課稅加以適當的調整，並在決定的期限中徵收農業稅。

四

為了保證上述指示的執行和建立國家的和合作社的收購組織的一致的行動（這是收購政策得以貫徹與國民經濟計劃得以實現的必要前提），中央與中央監委聯席全會決定：

在改組收購機關方面：

（一）統一國家糧食收購機關，把穀類販賣股份公司和地方的國家收購機關與麵粉廠（烏克蘭糧食公司，高加索糧食公司，西伯利亞貿易公司，卡查赫糧食公司等），合併為全蘇糧食股份公司，這些機關的財產則作為股份交給全蘇糧食股份公司，同時，在全蘇糧食股份公司的的工作中，要保證地方機關

所起的影響與作用，以按股分紅和將收購價格的一部分歸地方預算的辦法，使股東和地方機關關心蘇糧食股份公司工作的順利進行；其次，保證其他未併入全蘇糧食股份公司的麵粉公司，將其所收購的糧食中的一切餘糧（彌補本地需要的除外），根據合同交給全蘇糧食股份公司。

（二）在國家收購機關與消費合作社收購機關（一方面是全蘇糧食股份公司，另一方面是中央消費合作社聯盟）的關係上，應該制定並實行總合同制度，按照這種合同，消費合作社系統照全國計劃（即不包括計劃外的地方收購）所收購的全部糧食，應直接交給全蘇糧食股份公司附近的糧倉、麵粉廠；以及靠近車站與碼頭堆棧。

（三）應為麵粉廠與穀倉的工作建立必要的條件，保證其不斷工作，並使居民與它們有直接的聯系（合作社收購的糧食可以直接運去，直接運到麵粉廠與穀倉的糧食除原有價格外須特別增加若干等）。

（四）保證按照莫斯科消費社聯盟與主要收購機關簽定的總合同直接為莫斯科消費社聯盟收購。為了使主要收購機關履行總合同，特為莫斯科消費社聯盟劃出特別的收購區與運糧區及專為莫斯科用的麵粉廠，同時莫斯科消費社聯盟有權向這些地區派出代表，監督主要收購機關及時完成其與莫斯科消費社聯盟所訂的總合同的義務，並把收購與運糧狀況報告莫斯科消費社聯盟。

在改組調撥機構方面，中央與中央監委聯席全會決定：

（一）保證蘇聯內外貿易人民委員部在組織並調整收購工作和對計劃收購的糧食資源的利用方面，行使全蘇人民委員部的權力。

（二）提高工作人員的業務能力和增加工作人員的數量，以在各地加強內外貿易人民委員部的機構。

(三) 建立附屬於蘇聯貿易人民委員部的定期召開的常設會議，由主要收購機關的負責人和重要糧食收購區的代表參加，在人民委員部的直接領導下制定糧食收購的實際計劃與收購方法等等。

中央與中央監委聯席全會特別注意下列各點：必須大力鞏固合作社（消費合作社與農業合作社），加強合作社的幹部，鞏固合作社內部的紀律，擴大所包括的農民人數，發展合作社的群眾性，保證階級政策的實施等等。

為了全力保證一切國家機關與合作社組織在糧食市場上的步調一致，中央與中央監委聯席全會責成黨組織與所有一切破壞和不遵守收購政策和紀律的現象，與地方主義，與本位主義，與對待實際計劃的形式主義態度（糧草平衡表，沒有根據的聲請等等）作堅決的鬥爭。

鑒於有必要使所有從事糧食收購、加工和銷售的經濟機關合理化，中央和中央監委聯席全會責成在蘇維埃機關中工作的黨員和黨組織進一步大力降低糧食購銷方面以及磨粉和烤製方面的雜費支出。

中央與中央監委聯席全會要求所有黨組織特別注意樹立在執行總的經濟計劃時的嚴格的革命紀律，因為在高速建設社會主義和廣泛展開基本建設的情況下，在無產階級國家的一切力量和資源都很緊缺的情況下，只有在一切經濟機關中實行嚴格的無產階級紀律，才可能順利地向社會主義邁進。

（譯自「聯共（布）歷次會議決議」一書俄文版第二卷第二六三——二六九頁。）

斯大林：在糧食戰綫上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與紅色教授學校、共產主義學院以及

斯維爾德洛夫大學學生的談話（摘錄）

問題：我國糧食事業困難底基本原因是什麼呢？逃出這些困難的出路何在呢？既有這些困難，那末對於我們一般工業發展速度，特別從輕工業與重工業對比關係方面看來，應得出什麼結論呢？

回答：驟然看來，也許覺得我國糧食困難是一種偶然現象，只是由於設計工作不好，只是由於在經濟計算工作中有些錯誤。

可是，只有驟然看來才會覺得是這樣。其實，這種困難底原因是更深刻得多的。設計工作不好，經濟計算工作上的錯誤，在這裡起了頗大的作用，——這是不能有絲毫懷疑的，可是，如果以設計工作不好與偶然錯誤來解釋一切，那就大錯特錯了。輕視設計工作底作用與意義，那是錯誤的。可是，誇大計劃原則底作用，以為我們已達到可能計劃與調節一切的發展階段，那就更錯誤了。

不要忘記，在我們國民經濟中，除那些服從於我們計劃影響的成份而外，還有另一種成份，即暫且尚不服從於計劃工作的成份，最後還有些敵視我們的階級，而這些階級是不可用單純的國家計劃局的設計工作手續來克服的。

正因為如此，所以我認為不可把一切都歸結為簡單的偶然現象，歸結為設計工作錯誤等等。那末，我國糧食戰綫上種種困難底基本原因何在呢？

我國糧食困難基本原因，就在於我國商品糧食產量增長速度是比糧食需要額增長速度慢些。

工業是在增長着。工人數量是在增長。城市是在增長着。最後，需要商品糧食的各種技術作物（棉、麻、糖蘿蔔等等）出產區域，是在增長着。所有這些情形，就使糧食需要額，商品糧食需要額迅速增長起來。而商品糧食產量增長速度，却慢得要命。

不能說我們今年採辦得來的由國家支配的糧食比去年或前年少些。恰巧相反，我們今年所採辦得來的由國家支配的糧食，要比過去幾年多得多。可是，我們現在畢竟遇到了糧食困難。

請看幾個數字吧。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截至四月一日止，我們共採辦有四萬三千四百普特糧食。其中輸出國外的有一萬二千三百萬普特，所採辦得來的糧食剩留在國內的有三萬一千一百萬普特。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截至四月一日止，我們共採辦有五萬九千六百萬普特糧食。其中輸出國外的有一萬五千三百萬普特。所採辦得來的糧食剩留在國內的有四萬四千三百萬普特。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截至四月一日止，我們共採辦有五萬七千六百萬普特糧食。其中輸出國外的有二千七百萬普特。所採辦得來的糧食剩留在國內的有五萬四千九百萬普特。

換言之，在本年度，截至四月一日止，我們已經採辦來供國內需要的，比去年多一萬萬普特，比前年多二萬三千萬普特。可是，我們今年在糧食戰線上還是遭到了困難。

我有一次做報告時已經說過，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特別是富農，利用這些困難來破壞蘇維埃經濟政策。你們知道，蘇維埃政權已採取好些辦法來消滅富農底反蘇維埃發動。因此，關於這點，我現在不來多說。我在這裡所注意的，是另外一個問題。我所指的，就是關於商品糧食出產額增長得緩慢的原因問題，就是關於雖然我國播種面積和糧食出產總量已達到戰前程度，而我國商品糧食出產額還是比糧食需要額增長得慢些的問題。

我國播種面積已達到戰前程度，這難道不是事實麼？是的，這是事實。糧食出產總量在去年已等於戰前出產額，就是說已達到五十萬萬特糧食，這難道不是事實麼？是的，這是事實。那末爲什麼雖有這些情況，而我們所出產的商品糧食却比戰前少二分之一，而輸出國外的糧食却幾乎只有戰前的二十分之一呢？

這首先和主要是因爲在十月革命發生後，我國農業結構發生了變化，已從商品糧食出產極多的巨大地主經濟和巨大富農經濟，過渡到了商品糧食出產量極少的小農經濟和中農經濟。戰前我國有一千五百萬至一千六百萬個體農戶，而現在我國却有二千四百萬至二千五百萬農戶，——單是這一點就已說明現在我國農業底主要基礎，是商品糧食出產極少的小農經濟。

巨大農莊，不管它是地主農莊也好，富農農莊也好，或是集體農莊也好，其所有的長處，就是它能採用機器，利用科學成績，採用肥料，提高勞動生產率，所以它能出產最多的商品糧食。反之，小農經濟所有的弱點，就是它沒有這種可能性，或幾乎沒有這種可能性，所以它是半消費性的經濟，商品出產量很少的經濟。

例如拿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來說吧。它們所出產的商品糧食佔它們的總產量百分之四七點二。換言之，它們所產出的商品糧食比戰前地主農莊所出產的還要多。而小農農莊和中農農莊呢？它們所出產的商品糧食只等於它們的出產量總量的百分之一一點二。可見，這裡的差別是很大的。

從下面的數字中，便可看出過去戰前時期與現在十月革命後時期糧食生產底結構情形。這些數字是中央統計局委員聶蒙啓諾夫同志製定的。據聶蒙啓諾夫同志在說明書裡附帶聲明說，這些數字並不能說完全精確，而只能使人作出一種大約的計算。但這些數字完全足使我們明白，從一般糧食生產底結構上看來，特別從商品糧食底結構上看來，戰前時期與十月革命以後時期是有很大差別的。

戰前：

	糧食出產總量		商品糧食(運出農村以外的)		商品糧食所	
	單位百萬普特	百分數	單位百萬普特	百分數	佔百分數	佔百分數
(1) 地主	六〇〇	一二・〇	二八一・六	二一・六	四七・〇	四七・〇
(2) 富農	一、九〇〇	三八・〇	六五〇・〇	五〇・〇	三四・〇	三四・〇
(3) 中農和貧農	二、五〇〇	五〇・〇	三六九・〇	二八・四	一四・七	一四・七
總計	五、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三〇〇・六	一〇〇・〇	二六・〇	二六・〇

戰後：

(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

	糧食出產總量		商品糧食(運出農村以外的)		商品糧食所	
	單位百萬普特	百分數	單位百萬普特	百分數	佔百分數	佔百分數
(1) 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	八〇・〇	一・七	三七・八	六・〇	四七・二	四七・二
(2) 富農	六一七・〇	一三・〇	一六二・〇	二〇・〇	二〇・〇	二〇・〇
(3) 中農和貧農	四、〇五二・〇	八五・三	四六六・二	七四・〇	一一・二	一一・二
總計	四、七四九・〇	一〇〇・〇	六三〇・〇	一〇〇・〇	一三・三	一三・三

這個統計表是說明什麼呢？

第一，它說明絕大部分糧食出產，已從地主富農方面轉到小農方面。這就是說，小農中農既已完全解脫了地主壓迫，在基本上打破了富農勢力，於是就得到了最切實改善自己物質狀況的可能。這是十月

革命底結果。基本農民羣衆從十月革命方面所獲得的最大利益，首先就表現在這裡。

第二，它說明我國商品糧食底基本擁有者，是小農，尤其是中農。這就是說，不僅從糧食出產總量方面看來，而且從商品糧食出產額方面看來，蘇聯在十月革命之後，已變成小農經濟的國家，中農成了農業方面的「中心人物」。

第三，它說明地主經濟（巨大經濟）已被消滅，富農經濟（巨大經濟）已縮減三分之二強，我國已由巨大地主富農經濟過渡到只能輸出百分之二一的产品的小農經濟，同時在糧食生產方面又還沒有若何發展的巨大公共經濟（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這些情形，本來應當而且果然已使商品糧食出產額比較戰前銳減了。雖然我們現在糧食出產總量是與戰前產額一樣，而我們現在所有的商品糧食，却比較前少二分一，——這是事實。

這就是我們在糧食戰線上困難底基本原因。

正爲如此，所以不可把我們在糧食採辦工作方面困難當作是簡單的偶然現象。

毫無疑義的，還有一個情況也在這裡起了某種不良作用，這就是我們商業機關担承了本來沒有必要的一種替許多中小城市供給糧食的義務，結果不能不在某種程度上減少了國家儲存。可是，我們在糧食戰線上遇到困難的基本原因，當然不是這個情況，而是我國農業商品額增長得遲慢，而同時商品糧食需要額即增長得很迅速的事實。

出路何在呢？

有些人認爲出路就在有恢復富農經濟，在於發展和擴展富農經濟。這些人不敢說要恢復地主經濟，因爲他們大概懂得，在現時來談說這類事情，是很危險的。可是，唯其如此，他們也就更高興說必須多方發展富農經濟，以利於……蘇維埃政權。這些人認爲蘇維埃政權可以同時倚靠於兩個彼此對立的階級：

一方面倚靠於以剝削工人階級爲經濟原則的富農階級，另一方面倚靠於以消滅任何剝削爲經濟原則的工人階級。這真是只有反動派才表演得出來的把戲。

不必證明：這種反動「計劃」，是與工人階級利益，與馬克思主義原則，與列寧主義任務沒有絲毫相同處的。有人說，富農並「不劣於」城市資本家，富農絲毫也不比城市剝削受危險，因此我們現在不必「害怕」富農，這種說法是自由派的空話，是用來催眠工人階級和基本農民羣衆底警覺性的。不要忘記，如果說我們在工業方面能用供給工業商品總量十分之九的巨大社會主義工業去和城市小資本家對立，那末我們在農村生產方面所能用去與巨大富農生產對立的，却不過是尙未強固而糧食產量只有全體富農農莊糧食產量八分之一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不懂得巨大富農農莊在農村中的意義，不懂得富農在農村中的比重超過小資本家在城市工業中的比重百倍的事實，那就是神經錯亂，完全離開列寧主義，而投奔到工人階級底敵人方面去了。

那末，出路究竟何在呢？

(一) 首先，出路就是把落後的散漫的細小農場聯合爲大規模的公共農莊，這種公共農莊是得到機器供給，用科學成績武裝起來，而能够生產最多商品糧食的。出路就是要在農業方面由個體的農民經濟過渡到集體的公共的經濟。

列寧還在十月革命最初時日，就已號召我們黨去組織集體農莊。從那時起，關於集體農莊思想的宣傳，在我們黨內是始終沒有停止過的。可是，關於建設集體農莊的號召，直到近來才獲得羣衆方面的響應。這首先是因爲農村中合作社運動的廣闊發展，已在農民情緒上準備了一個趨向於集體農莊的轉變，而有許多集體農莊現時已能每俄畝出產一百五十至兩百普特糧食，其中商品糧食佔全部收成百分之三十的情形，又在貧農和下層中農裡面造成了很願意加入集體農莊的趨向。

還有一個情況在這裡也有不小的意義，這就是我們國家直到最近以來才獲得了大大資助集體農莊運動的可能。大家知道，國家在今年所已支出幫助集體農莊的款項，比去年多至兩倍（在六千萬盧布以上）。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是完全正確的，它認為群眾集體農莊運動所需要的條件已經成熟，認為加強集體農莊運動是提高我國糧食生產商品額的最嚴重方法之一。

據中央統計局統計，集體農莊在一九二七年的糧食出產總量不下五千五百萬普特，其一般平均商品額是等於百分之三十。本年年初所發生的那個成立新集體農莊的廣闊浪潮和實行擴大舊集體農莊的事實，將使集體農莊糧食產量到本年年底大大增加起來。任務就是要保持現時集體農莊運動發展速度，擴大集體農莊規模，取消那些虛強的集體農莊，而組織真正的集體農莊，並規定各集體農莊必須把全部商品糧食交給國家和合作社機關，不然就領不到國家方面的津貼和借款。我認為只須遵守這些條件，那我們經過三四年後，就能從集體農莊方面得到約近一萬萬普特的商品糧食。

人們有時候把集體農莊運動與合作社運動對立起來，大概認為集體農莊是一回事，而合作社却是另一回事。這當然是不對的。有些人甚至把集體農莊與列寧底合作社計劃對立起來。不行說，這種對立絲毫沒有真情的。其實，集體農莊是一種合作社形式，是最明顯的生產合作社形式。有銷售合作社，有供給合作社，也有生產合作社。集體農莊一般說來是合作社運動不可分開的組成部份，局部說來是列寧合作社計劃不可分開的組成部分。實行列寧合作社計劃，就是把農民從銷售合作社和供給合作社提高到生產合作社，提高到集體農業合作社。也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我們的集體農莊，是在銷售合作社和供給合作社發展和加強了的時候才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二)其次，出路就是要擴大和鞏固原有的國營農場，組織和發展新的巨大國營農場。據中央統計局統計，現有國營農場糧食出產總量，在一九二七年不下四千五百萬普特，其中商品額佔居百分之六十

五、毫無疑問，在國家予以相當贊助下，國營農場就可大大提高糧食生產了。

可是，任務並不以此爲限。蘇維埃政權已經決定，在那些沒有農民份地區域內應組織新的巨大的國營農場（每個農場由一萬至三萬俄畝不等），這些農場經過五六年後，就應出產約近一萬萬普特的商品糧食。組織這些國營農場的工作，已在着手進行。任務就是無論如何都要實現蘇維埃政權底這個決定。我認爲：只須完成這些任務，那我們大約經過三四年後，就能夠從新舊國營農場方面得到八千萬至一萬萬普特左右的商品糧食了。

（三）最後，出路就是要一貫提高小農和中農個體經濟底收成率。我們不可以而且不應當贊助巨大的個體經濟，即富農經濟。可是，我們可以而且應當贊助小的中等的個體農民經濟，提高它的收成，把它引上合作制軌道。這是一個舊的任務，是我們還在一九二一年用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時就已特別用力宣佈過的任務。這個任務後來又由我們黨在第十四次和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加以批准了。現在因爲在糧食戰線上發生困難，這個任務底重要性也就更明顯了。因此，應當堅決執行這個任務，也如必須堅決執行頭兩個任務，即關於集體農莊的任務和關於國營農場的任務一樣。

所有一切材料，都是說明農民經濟底收成率在幾年以內便能增高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現在我國所使用用的木犁，不下五百萬。只須用鐵犁代替這些木犁，就可使我國糧食產量大大增長起來。更不必說，我們將用某種最低限度數量的肥料、優良種籽和小型機器等等供給農民經濟。訂立合同，與整鄉整村訂立關於供給它們以種籽等等，同時一定要它們交出相當數量糧食的條約，就是提高農民經濟收成率和吸收農民加入合作制的最好方法。我認爲：只須在這方面認真工作，那末經過三四年以後，我們便能從小農和中農個體經濟方面取得不下一萬萬普特的新增商品糧食了。

所以，只須執行這一切任務，那末經過三四年以後，我們國家就會擁有二萬五千萬至三萬萬普特的

新商品糧食，而在國內和國外都頗能機動自如了。

爲逃出糧食戰線上的困難所必須採取的辦法，大體上就是如此。

除採取這些基本辦法而外，還要採取一些臨時辦法來改善關於用商品供給農村的設計工作，並且使我們各商業機關不再担任供給許多中小城市糧食的義務，——這就是現時的任務。

除這些辦法而外，是不是還應當採取其他某些辦法，譬如說採取降低我國工業發展速度的辦法，因爲我國工業增長是使糧食需要額迅速增長，甚至於暫時還超過商品糧食產量增長速度的？不是的，是不應當的。無論如何都是不應當的！降低工業發展速度，就是削弱工人階級，因爲在工業發展方面的每個前進步驟，每個新工廠，按照列寧說法，都是工人階級底「新要塞」，足以加強它在反對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鬥爭中，在反對我國經濟裡資本主義分子的鬥爭中的陣地。恰巧相反，我們應當保持現時的工業發展速度，我們應當在一切可能時就更加發展這個速度，以便把大批商品輸入農村，並從那裡多多收取糧食，以便把機器供給農業，首先是供給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以便把農業工業化，並提高農業生產底商品額。

也許爲着更加「慎重」起見，應當阻延重工業發展速度，把主要是供應農民市場的輕工業變成我國工業底基礎吧？無論如何都是不應當的！這就是會自殺，這就會是破壞我國全部工業，連輕工業也在內。這就會是離開我國工業化底口號，把我國變爲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底附屬品。

我們在這裡所持的出發點，就是列寧在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上所提出的著名的指示，這些指示是我們全黨所絕對必須運行的。請看列寧在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上關於這個問題所說的話吧：

「要挽救俄國，單靠農民經濟收成豐盛還不夠，而且單靠供給農民消費品的輕工業情況興旺，也還不夠，——我們還要有重工業」。

其次：

「我們在各方面，甚至在學校經費方面，都實行節省。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我們知道：不恢復重工業，不恢復重工業，我們就不能建成任何工業。而沒有工業，我們就根本不能維持我們爲獨立國家的地位」（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四九頁）。

列寧底這些指示，是不可忘記的。

既然採取上面所指出的辦法，那末工農聯盟又將怎樣呢？我認爲這些辦法只會促進工農聯盟鞏固的事業。

的確，如果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加快速度發展起來；如果由於直接幫助小農中農的結果，他們農莊上的收成率提高起來，而合作社又會包括日益廣大的農民群衆；如果國家又得到幾萬萬普特爲實行機動辦法所必要的新有商品糧食；如果由於實行這些以及諸如此類辦法的結果，富農將被壓制，漸被戰勝，——那末工農聯盟內的工農矛盾就會因此而日益消失。糧食採辦事業方面的非常手段將沒有採取的必要，廣大農民群衆將日益轉向農業集體形式，而爲戰勝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的鬥爭將日益帶有群衆的有組織的性質，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工農聯盟事業只會因實行這種辦法而得到利益，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只是應當注意一點：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工農聯盟，並不是什麼簡單的聯盟。這種聯盟，乃是工人階級與農民勞動群衆兩者階級聯盟底特殊形式，其目的是：（1）加強工人階級底陣地，（2）保證工人階級在這個聯盟內的領導作用，（3）消滅階級和消滅階級社會。對於工農聯盟的任何其他一種了解，都是機會主義，孟什維主義和社會革命黨主義，無論叫作什麼都可以，只是不可叫作馬克思主義，不可叫作列寧主義。

怎樣使工農聯盟思想與列寧說農民是「最後的一個資本主義階級」這一著名原理相容呢？這裡沒有矛盾麼？這裡只有表面上的，似是而非的矛盾。其實，這裡是沒有絲毫矛盾的。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把農民估計為「最後的一個資本主義階級」，同時他在這個報告中又再三論證工農聯盟底必要，說「專政底最高原則，就是維持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使無產階級能够保持領導作用和國家政權」。很明顯的，列寧無論如何也沒有認為這裡有絲毫矛盾。

應怎樣了解列寧說農民是「最後的一個資本主義階級」這一原理呢？這是不是說農民階級是由資本家組成的呢？不是的，不是這樣說。

這是說，第一，個體農民是個特別階級，它是把經濟建築在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因此也就與無產階級不同，因為無產階級是把經濟建築在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基礎上的。

這是說，第二，個體農民是從自己隊伍中分泌出，產生着和培養着資本家、富農以及其他各種剝削分子的階級。

這個情況是對於工農聯盟組織事業的一個不可克服的障礙麼？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並不是與全體農民聯盟。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是工人階級與農民勞動群眾聯盟。這樣一個聯盟，不與農民資本主義分子作鬥爭，不與富農作鬥爭，是不能實現的。這樣一個聯盟，不把貧農當作工人階級在農村中的支柱組織起來，是不能鞏固的。因此，現時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工農聯盟，只有在列寧所提出的一個著名口號，即倚靠貧農，與中農成立緊固聯盟，一分鐘也不停止反富農鬥爭的口號下，才能實現。因為只有在實行這個口號的條件下，才能把農民基本群眾吸引到社會主義建設軌道上來。

你們由此就可知道：在列寧這兩個公式之間只有臆造的矛盾，似是而非的矛盾。其實它們是沒有絲毫矛盾的。

斯大林：論工業化和糧食問題

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的演說

同志們！在談到我們糧食戰綫上的困難這個具體問題之前，讓我先談幾個具有理論意義的和在全會①討論中所發現的一般性的問題。

首先談談我國工業發展的主要泉源，也就是保證目前工業化速度的途徑這個一般性的問題。

這個問題奧新斯基和接着他發言的索赫里尼柯夫已經觸及。這一點，也許他們自己還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是頭等重要的問題。

我認爲滋養我國工業的主要泉源，我們有兩個：第一是工人階級，第二是農民。

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通常主要是靠掠奪其他國家，靠掠奪殖民地和戰敗國，或者靠借巨額的多少帶有奴役性的外債。

你們知道，英國從各個殖民地，從世界的各個角落搜刮了幾百年的資本，這樣就給本國工業追加了投資。這是英國一度成爲「世界工廠」的原因之一。

你們也知道，德國能使自己的工業發展起來，其原因之一，就是靠普法戰爭後從法國取得的五十億賠款。

然而，我們的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區別之一，就在於它不能而且不應當掠奪殖民地，它根本不能而且不應當掠奪其他國家。所以，對我們來說這條路是行不通的。

① 指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至十二日舉行的聯共（布）中央全會。

我們國家沒有借而且不願意借奴役性的外債。因而，對我們來說這條路也是行不通的。

在這種情況下還有什麼辦法呢？只有一個辦法：靠內部積累來發展工業，使國家工業化。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我國工業、運輸業等一般都是靠借外債來發展的。不論是建造新工廠或者改建舊工廠，不論是建築新鐵路或者建立巨型發電站，這樣的企業沒有一個不是依靠外債建立起來的。但是，這些外債都是奴役性的。

在蘇維埃制度下，我們的情形完全兩樣了：我們正在建築的長達一千四百俄里的土爾克斯坦鐵路就要花好幾億盧布。我們正在建設的德涅泊爾水電站也要花好幾億。在這裏我們借過什麼奴役性的外債沒有呢？沒有借過。這一切都是靠我們內部的積累來進行的。

但是，這種積累的主要泉源何在呢？這就是我已經說過的兩個泉源：第一是創造價值並推動工業前進的工人階級，第二是農民。

在這方面，我國農民的情況是這樣：農民不僅向國家繳納一般的稅，即直接稅和間接稅，而且他們在購買工業品時還要因為價格較高而多付一些錢，這是第一；而在出賣農產品時却多少要少得一些錢，這是第二。

這是為了發展工業以供應包括農民在內的全國人民而對農民實行的一種附加稅。這好像是一種「貢稅」，一種額外稅；為了保持並加快工業發展的現有速度，保證全國工業化，繼續提高農村物質生活水平，然後完全取消這種附加稅，消除城鄉間的「剪刀差」，我們不得不暫時徵收這種稅。

不用說，這件事是使人不愉快的。但是，如果我們抹殺這一個事實，如果我們閉眼不看當前的情況，即我們的工業和我們的國家在目前不向農民徵收這種附加稅（遺憾得很）就不能向前發展，那我們就不

是布爾什維克了。

爲什麼我要說到這一點呢？因爲有些同志看來還不了解這個無可爭辯的事實。他們的說法主要是：農民購買工業品付的錢多了。這種說法是絕對正確的。又說，農民出賣農產品得的錢少了。這種說法也是正確的。他們究竟要求什麼呢？他們要求調整糧食價格，要求立刻就消除這種「剪刀差」和這種少得多付的現象。但是，比如說要在今年或明年消除「剪刀差」，這意味着什麼呢？這就意味着阻礙國家工業化，也阻礙農業的工業化，破壞我們還不鞏固的年輕工業，因而也就是打擊整個國民經濟。我們能不能這樣做呢？顯然不能。是否應當消除城鄉間的「剪刀差」，消除所有這些少得多付的現象呢？是的，無疑是應當消除的。我們能不能立刻就消除這些現象，而又不削弱我國工業，因而也不削弱我們的國民經濟呢？不，我們不能。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政策應當怎樣呢？我們的政策應當逐漸縮小這種「剪刀差」，使它一年一年地接近起來，不斷降低工業品價格，提高農業技術，這樣就一定能使糧食生產的成本減低，以便在幾年以後完全消除對農民的附加稅。

農民能否挑得起這副重擔呢？絕對能。因爲：第一、這副重擔將一年一年地減輕，第二、我們不是在農民群眾計定遭受貧困和剝削的資本主義發展條件下徵收這種附加稅，而是在蘇維埃制度的條件下徵收這種附加稅，在蘇維埃制度下，社會主義國家方面對農民的剝削是不可能有的，而且這種附加稅是在農民物質生活狀況不斷改善的情況下繳納的。

關於我國目前開展工業化的主要來源問題就是如此。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中農結合的問題，關於這一結合的目的和方法的問題。

在某些同志看來，城鄉的結合、工人階級和基本農民群眾的結合只限於紡織品方面，只限於滿足農

民的個人需要方面。這對不對呢？同志們，這是完全不對的。當然，在紡織品方面滿足農民的個人需要是有巨大意義的。我們已經在新的情況下開始從這方面來和農民結合了。但是，根據這一點說，在紡織品方面來結合就是結合的全部內容，在滿足農民個人需要方面來結合就是工人階級和農民經濟聯盟的全部或主要基礎，這就犯了極嚴重的錯誤。其實，城鄉的結合，不僅在滿足農民的個人需要方面，不僅在紡織品方面，而且在滿足農業品生產者農民的經濟需要方面。

我們不僅供給農民印花布，我們還要供給他們各種各樣的機器、種子、鐵犁、肥料等等，這些東西在發展農民經濟和對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來說是有極重大意義的。

因此，工農結合的基礎，不僅是紡織品，而且有五金製品。否則，和農民的結合就是不鞏固的。那末，在紡織品方面的結合和在五金製品方面的結合有什麼區別呢？首先在於：在紡織品方面的結合主要關係到農民的個人需要，沒有或較少觸及農民經濟的生產方面；而在五金製品方面的結合却主要關係到農民經濟的生產方面，這種結合能改善農民經濟，使它機械化，使它贏利更多，並為分散的小農經濟聯合成大规模的公共經濟打下基礎。

如果以為結合的目的是要保存階級，其中也包括農民階級，那就錯了。同志們，這是不對的。結合的目的決不在此。結合的目的是要使農民和領導我們整個事業前進的工人階級接近，鞏固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力量的工農聯盟，以集體主義精神逐漸改造農民，改造他們的心理，改造他們的生產，從而為消滅階級創造條件。

結合的目的不是要保存階級，而是要消滅階級。既然紡織品方面的結合很少觸及農民經濟的生產方面，所以一般說來，它是不可能以集體主義的精神改造農民並消滅階級的；而五金製品方面的結合則恰恰

相反，它首先關係到農民經濟的生產方面、農民經濟的機械化和集體化，正因為如此，它一定能夠逐漸改造農民，逐漸消滅階級，其中也包括農民階級。

一般說來，怎樣才能改造農民，改造他們的心理，改造他們的生產，使之接近工人階級的心理並適應社會主義生產的原則呢？爲此需要做什麼呢？

爲此，首先需要在農民群眾中進行極廣泛的集體主義的宣傳。

第二、需要建立合作社，需要日益廣泛地把千百萬農戶吸收到我們的供銷合作社中來。毫無疑義，不廣泛地發展我們的合作社，農民就不會轉變到我們目前所看到的集體農莊運動方面來，因爲在我國的情況下，發展供銷合作社就是爲農民過渡到集體制作準備。

但是，所有這些對改造農民來說還是非常不夠的。以社會主義精神來改造農民的主要力量是新的農業技術、農業機械化、農民集體勞動和國家電氣化。

有人在這裏引證列寧的話，引證列寧著作中關於和農民經濟結合的一段著名的話。但是只援引列寧的一段話而不願意全面地援引他的話，這就是曲解列寧。列寧十分明白，在紡織品方面和農民結合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但是他並不以此爲限，因爲他還堅決主張在五金製品方面和農民結合，在供給農民機器方面，在實現國家電氣化方面，也就是說，在一切有利於以集體主義精神改造農民經濟方面和農民結合。

例如，請聽列寧的下面一段話：

「改造小農，改造他們的整個心理和習慣，是需要幾代的事情。只有物質基礎，只有技術，只有在農業中大規模地使用拖拉機和機器，只有實行大規模電氣化，才能解決這個對小農的關係問題，才能使他們的整個心理健全起來。只有這樣才能根本地和非常迅速地改造小農。」（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九四頁）

問題要清楚：如果紡織品方面的結合，不加上五金製品方面的結合，那末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就不能鞏固和持久，工人階級和農民的結合就不能鞏固和持久，這種結合就不能達到逐漸改造農民，使農民接近工人階級，使農民走上集體制軌道的目的。

就是列寧同志對結合的看法。

第三個問題是關於新經濟政策和新經濟政策下的階級鬥爭問題。

首先必須肯定我們黨提出新經濟政策的原則，不是在戰時共產主義以後，像某些同志有時斷定的那樣，而是在戰時共產主義以前，還在一九一八年初，當我們第一次獲得可能開始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時候。我可以引證一九一八年初出版的依里奇的著名小冊子「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這本小冊子闡明了新經濟政策的原則。黨在武裝干涉結束以後實行新經濟政策時把它叫做新經濟政策，是因爲這個政策曾被武裝干涉打斷，直到武裝干涉結束以後，直到戰時共產主義以後，我們才有可能來實行它；而新經濟政策對戰時共產主義來說確實是一種新的經濟政策。爲了證明這一點，我認爲必須引證蘇維埃第九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著名決議，那裏講得清清楚楚，新經濟政策的原則是在戰時共產主義以前就提出來了。在「關於新經濟政策的初步總結」這個決議中說道：

「所謂新經濟政策，它的基本原則，早在一九一八年春季第一次喘息時機^①就已經確切地規定了，它是根據對蘇維埃俄國經濟力量的精確估計而規定的。這一政策會因俄國地主、資產階級和歐洲帝國主義反革命勢力聯合進攻工農國家而中斷，直到一九二一年年初，在軍事上消滅了反革命企圖以後，才有實現這一政策的可能。」（「見蘇維埃全俄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第十六頁）^②

由此可見，某些同志硬說，好像只是在戰時共產主義以後，黨才意識到必須在市場和貨幣經濟存在的條件下，即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這是錯誤到何等地步。

由此應當得出什麼結論呢？

首先應當得出結論說，不能認為新經濟政策僅僅是退却。

其次應當得出結論說，新經濟政策是預計到社會主義要向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實行勝利的和有步驟的進攻的。

以托洛茨基為代表的反對派認為既然實行了新經濟政策，那我們就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不斷「擴大」新經濟政策並放棄陣地，一步步退却，正像我們在新經濟政策初期的退却一樣。托洛茨基的論斷也是由於這種對新經濟政策的錯誤理解而產生的。他斷定說，黨在農村中容許租佃土地和僱傭勞動似乎就是「擴大了」新經濟政策，離開了列寧的立場。請聽一下托洛茨基的話：

「什麼是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的最近措施，就是容許租佃土地和僱傭工人，就是我們把它叫做擴大農村新經濟政策的一切……然而而不能不擴大農村新經濟政策呢？不能，因為不這樣，農村經濟就會衰退，市場就會縮小，工業就會停頓。」（見托洛茨基的「八年」第十六頁至第十七頁）

可見，若是固執地堅持不正確的想法，認為新經濟政策是退却，而且僅僅是退却，那就說出多麼糊塗的話來。

能不能斷言黨在農村中容許僱傭勞動和租佃土地就是「擴大了」新經濟政策，「離開了」列寧的立場等等呢？當然不能這樣說！發表這種謬論的人與列寧和列寧主義是毫無共同之處的。

① 蕭軍就是我加的。——斯大林

② 見「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決議彙編」，一九三九年莫斯科版第二二五頁。

我可以在這裏引起證列寧在一九二二年四月一日給奧新斯基的一封信，列寧在信中直截了當地說，必須在農村中容許僱傭勞動和租佃土地。這是在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即將結束時的事情，在這次代表大會上，代表們廣泛地討論了農村工作問題和新經濟政策以及新經濟政策的後果問題。

這封信成了黨的代表大會代表們的決議草案，下面就是其中的一段：

「關於農業方面使用僱傭勞動和租佃土地的條件問題，黨代表會議建議有關部門的一切工作人員不要使用種種不必要的手續去限制這兩種現象，而應執行最近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決議，並研究出一些適當的具體辦法來防止在上述問題上趨於極端並產生有害的誇張。」（見「列寧文集」第四卷第三九六頁。①）

由此可見，認為在農村中實行租佃土地和僱傭勞動就是「擴大」新經濟政策，「離開」列寧的立場等等，是何等愚蠢和無聊。

爲什麼我要說到這一點呢？

因爲那些空談「擴大」新經濟政策的人想利用這種謊話來辯護讓他們在農村資本主義分子面前的退却。

因爲在我們黨內和黨的周圍出現了一些人，他們認爲「擴大」新經濟政策就是「挽救」工農結合，他們看到非常措施已經取消，便藉口爲了結合的利益而要求取消對富農的限制，解除對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的束縛……

因爲必須用全部力量，用一切手段來保證黨不受這種反無產階級情緒的影響。

① 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卷第二九三頁。——俄文版編者註

爲了不說得太遠，我引證一個同志的信來談談，這個同志是「貧農報」①的工作人員奧西普·切爾諾夫。他在信上要求實行一系列的措施以減少對富農的限制，這些措施不是別的，而是真正地、不加掩飾地「擴大」新經濟政策。我不知道他是共產黨員還是非黨員。這位擁護蘇維埃政權並贊成工農聯盟的奧西普·切爾諾夫同志，在農民問題上竟糊塗到如此地步，以致很難把他和農村資產階級的思想區別開來。我們在糧食戰線上發生困難的原因，他認爲在哪裏呢？他說：「第一個原因毫無疑問就是累進所得稅制……第二個原因就是選舉法在權利方面的變更，選舉法中對什麼人是富農規定得不明確。」

要排除這些困難需要做些什麼呢？他說：「第一要做的就是必須廢除累進所得稅制，即目前實行的這種稅制，而改用土地稅制，並對牲口和大農具稍微收一些稅……第二個同樣重要的措施，就是要修改選舉法，把剝削人的富農經濟的界限劃分得更明確些。」

這才是「擴大」新經濟政策。由此可見，托洛茨基的種子並沒有白撒。對新經濟政策的錯誤理解產生了「擴大」新經濟政策的謬論，而這種「擴大」新經濟政策的謬論產生了各式各樣的短評、論文、書信和建議，要求給富農以自由，解除對富農的限制，並使他們能夠自由發財。

關於這方面，即關於新經濟政策和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階級鬥爭問題方面，我還要指出一個事實。我指的是一個同志所說的，新經濟政策條件下，因爲收購糧食，階級鬥爭好像只有極不重要的意義；並且階級鬥爭對於我們糧食收購的困難，好像沒有也不能有比較重大的意義。

同志們，我必須說，我決不同意這種說法。我認爲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沒有也不可能有一件比較重大的政治或經濟事件不反映出城市中或農村中階級鬥爭的存在。難道新經濟政策廢除無產階級專

① 「貧農報」(日刊)是聯共(布)中央的機關報，於一九一八年三月至一九三一年一月在莫斯科出版。

政了嗎？當然沒有！相反地，新經濟政策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表現和武器。難道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階級鬥爭的延續嗎？（喊聲：「是的！」）既然如此，那末在收購糧食時，富農起來反對蘇維埃的政策以及蘇維埃政權對富農和奸商採取對策並舉行進攻等等重大的政治和經濟事件中，難道還能說階級鬥爭只有極不重要的意義嗎？

在糧食收購發生危機時，我們遭到了農村資本主義分子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所發動的第一次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嚴重的進攻，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難道在農村中不再有階級和階級鬥爭了嗎？

列寧提出的依靠貧農、聯合中農、反對富農的口號是目前條件下我們農村工作的基本口號，這難道不對嗎？這個口號所反映的不是農村中的階級鬥爭又是什麼呢？

當然，決不可以把我們的政策看做挑起階級鬥爭的政策。為什麼呢？因為挑起階級鬥爭會導致內戰。因為既然我們掌握着政權，既然我們鞏固了這個政權，並且把一切經濟命脈集中在工人階級手裏，我們就不希望階級鬥爭採取內戰的形式；但是，這決不是說，階級鬥爭因而被取消了，這種階級鬥爭就不會尖銳化了。這更不是說，階級鬥爭好像不是推動我們前進的決定力量。不，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時常說，我們在商業方面發展社會主義形式的經濟。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們這樣做就是把成千上萬的中、小商人從商業中排擠出去。能不能認為這些被排擠出流轉領域的商人會沉默地坐着而不企圖組織反抗呢？顯然不能。

我們時常說，我們在工業方面發展社會主義形式的經濟。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由於我們向社會主義邁進，也許我們自己並沒有覺察到把成千上萬的中、小工業資本家排擠出去並使他們破了產。能不能認為這些破了產的人會沉默地坐着而不企圖組織反抗呢？當然不能。

我們時常說，必須在農村中限制富農的剝削意圖，向富農徵收高額的稅，限制租佃的權利，不讓富農享有蘇維埃選舉權，諸如此類等等。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們壓制並逐漸排擠農村資本主義分子，有時還要使他們弄到破產的地步。能不能設想富農會因此感謝我們，並且不企圖糾合一部分貧農或中農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政策呢？當然不能。

我們所有的進展，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每一個稍許重大的成就，都是我們國內階級鬥爭的表現和結果，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由於可見，隨着我們的進展，資本主義分子的反抗一定會加強，階級鬥爭一定會更加尖銳，而日益強大的蘇維埃政權一定要執行孤立這些資本主義分子的政策、瓦解工人階級的敵人的政策以及鎮壓剝削分子反抗的政策，而為工人階級和基本農民群眾的進一步發展打下基礎。

不能認為事情會這樣：社會主義形式的經濟將會發展，並排擠工人階級的敵人，而這些敵人會一聲不響地退却，為我們的前進讓出道路，然後我們再前進，而敵人再向後退却，最後，「出乎意料地」，所有一切社會階層毫無例外，無論是富農或貧農、無論是工人或資本家，都「突然地」、「不知不覺地」，沒有鬥爭和波折就投入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懷抱。這種神話根本是沒有的而且不可能有的，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情況下。

從來沒有過並且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垂死的階級自願放棄自己的陣地，而不企圖組織反抗。從來沒有過並且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在階級社會中，工人階級不經過鬥爭和波折就能向社會主義前進。恰恰相反，向社會主義的前進不能不引起剝削分子對這種前進的反抗，而剝削分子的反抗就不能不引起階級鬥爭的尖銳化。

正因為如此，決不能用階級鬥爭只有次要作用的說法來麻痺工人階級。

第四個問題是對待富農和奸商的非常措施問題。

決不能把非常措施看做一種絕對的、一成不變的東西。在一定的、非常的情況下，當我們沒有其他措施可以運用的時候，非常措施是必要的和適當的。但在另一種情況下，當我們有了其他靈活的措施可以在市場上運用的時候，非常措施就成爲不需要和有害的了。那些認爲非常措施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好的人是不對的。對這種人必須進行不斷的鬥爭。但是，那些認爲非常措施永遠都是必要和適當的人也是不對的。對這種人必須進行堅決的鬥爭。

在糧食收購發生危機的情況下採取非常措施是不是一種錯誤呢？現在大家都承認這不是一種錯誤，相反地，非常措施挽救了我們國家，使它沒有發生普遍的經濟危機。是什麼迫使我們採取這種措施呢？就是在今年一月缺糧一億二千八百萬普特，我們必須在泥濘期以前彌補這個缺額，並使糧食收購的速度正常起來。既然我們沒有一億普特左右的糧食儲備，以便待機投入市場來降低糧價；既然我們沒有足夠的外匯儲備，以便從國外輸入大批糧食，那末，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能夠不採取非常措施嗎？顯然不能。但是，如果我們沒有彌補這個缺額那會怎樣呢？那末我們整個國民經濟現在就會發生極嚴重的危機，城市就會鬧飢荒，紅軍就會挨餓。

如果我們有一億普特左右的糧食儲備，以便待機投入市場降低糧價，把富農控制起來，那末，當然我們就不會採取非常措施了。但是，你們知道得很清楚，我們沒有這種儲備。

如果我們那時有一億到一億五千萬盧布的外匯儲備，以便從國外輸入糧食，那末，我們也許就不會採取非常措施了。但是，你們知道得很清楚，我們沒有這種儲備。

這是不是說，我們今後還可以不作儲備而再度求助於非常措施呢？不，不是這個意思。恰恰相反，我們一定要想盡一切辦法來積蓄儲備並避免採取任何非常措施。那些想把非常措施變爲我們黨的經常方

針或長期方針的人乃是危險的人物，因為他們是在玩火，對工農結合造成威脅。

由此不能得出結論說，我們應當永遠不再採取非常措施了呢？不，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沒有根據來斷定說，要求採取非常措施的非常情況永遠不會再發生了。只有騙人的巫師才會做出這樣的斷定。

列寧論證了新經濟政策，但是他認為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在一定條件和一定情況之下，甚至不能拒絕採用貧農委員會的辦法。而且，我們更不能發誓永遠拒絕採取非常措施，因為這些非常措施還不能和貧農委員會對富農進行激烈鬥爭所採取的尖銳的方法相提並論。

在這裏回憶一下在我們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所發生的有關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一件和這個問題有直接關係的事情，也許不是多餘的。大家知道，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他的關於農村工作的提綱中企圖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一勞永逸」地拋棄以貧農委員會的辦法去和富農作鬥爭的政策。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他的提綱中寫道：「實行不要這個階層（富農和富裕農民），並以一九一八年貧農委員會的辦法對這個階層進行粗暴的超經濟的壓制這一政策是極為有害的錯誤。」（見該提綱第二段）

大家知道，列寧是用下面的一段話來回答他的：

「第二段的第二句話（反對「貧農委員會的辦法」）是有害的，不正確的，因為：譬如說，戰爭就迫使我們所取貧農委員會的辦法。關於這一點，應該完全是另一種說法，譬如這樣說：由於發展農業及增加農產品的極度重要，目前①無產階級對待富農和富裕農民的政策應該主要是限制他們的剝削意圖等等。我們國家應該而且能夠如何來限制這種意圖，如何來保護貧農，全部的實質就在於此。這是必須研究的，也是必須要大家在實踐中去研究的，至於一般的談論都是毫無意義的。」（見「列寧文集」第四卷第三九一頁）

顯然，必須具體地來看非常措施，因為一切都以時間、地點為轉移。

同志們，在討論中發生的一般性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讓我談談穀物問題，以及關於我們在糧食戰綫上的困難的根源問題。

我認為許多同志犯的錯誤就是把我們在糧食戰綫上的困難的種種原因都攪成一團，把臨時性的、暫時的（特殊的）原因和長期性的基本原因混淆起來了。糧食困難的原因有兩種：一種是長期性的基本的原因，這種原因要好幾年才能消除；另一種是特殊的、暫時的的原因，這種原因只要採取並實行一些必要措施就可以立刻消除。把所有這些原因攪成一團，就是把整個問題都弄得糊里糊塗了。

我們在糧食戰綫上的困難的主要意義和影響何在呢？就在於：它們在我們面前全面地提出了糧食問題，糧食生產問題，一般的農業問題，特別是穀物生產問題。

一般說來，我們的穀物問題是不是一個迫切問題呢？毫無疑問，是的。穀物問題是蘇維埃社會目前最迫切的問題，只有瞎子才會懷疑這一點。我們不能像舊時人那樣生活下去，沒有糧食儲備，沒有一定的儲備以防歉收，沒有儲備以調節市場，沒有儲備以防戰禍，也沒有某些儲備以供輸出。甚至經濟十分貧乏的一個小農，也不能積蓄一些儲備，也不能不留一些存糧。而一個佔地球上六分之一土地的大國更不能沒有國內和國外所必需的糧食儲備，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假如我們烏克蘭的冬麥沒有遭災，而我們可以「湊合」渡過這個糧食收購年度，能不能認為這個對我們已經够了呢？不，不能。往後我們不能「湊合」生活下去。如果想保衛住蘇維埃政權在對內和對外

① 蕭克是我加的。——斯大林

② 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一二頁。——俄文版編者註

兩方面的陣地，我們就必須擁有一定限度的儲備。

第一、我們不能保證不受到武裝進攻。你們想想，如果沒有任何糧食儲備以供應軍隊，國家能夠保衛得住嗎？有幾個發言的同志完全正確。他們說，現在的農民已經不是六年前的農民了，那時他們害怕失去土地，重歸地主所有。現在農民已經把地主忘了。現在他們要求有新的更好的生活條件。我們能不能在敵人進攻的時候，一面在前綫和外來的敵人作戰，一面爲了急需獲得糧食來供應軍隊而又在後方和農民幹起來呢？不，不能而且不應當這樣做。要保衛國家，我們就應該有一定的存糧供應軍隊，即使有足供最初六個月用的存糧也好。爲什麼要有這六個月的喘息時機呢？爲了使農民清醒過來，體會戰爭的危險，了解事變的現象，並且奮起參加保衛國家的共同事業。假如我們滿足於「湊合」過去，那我們無論在什麼時候都不會有任何儲備以供戰時之用的。

第二、我們不能保證糧食市場上不發生困難。爲了干預糧食市場，爲了執行我們的價格政策，我們絕對需要有一定的儲備。因爲我們不能而且也不應該每次都採取非常措施。要是我們每次在險些就要掉入深淵的時候，而以有可能「湊合」渡過糧食收購年度爲滿足，那我們無論是什麼時候都不會有這樣的儲備的。

第三、我們不能保證不發生歉收。我們絕對需要一定的糧食儲備，以便在歉收時供應飢荒的地區，即使是一定程度、一定時期內的供應也好。如果我們不增加商品糧食的生產，不堅決徹底地拋棄不存糧食而過活下去的舊習氣，那我們就不會有這樣的儲備。

最後，我們絕對需要輸出糧食的儲備。我們需要輸入工業裝備。我們需要輸入農業機器、拖拉機和這些機器的零件等。可是不輸出糧食，不靠輸出糧食來積累一定的外匯儲備，要做到這一點是不可能的。在戰前，每年輸出五億至六億普特的糧食。能夠輸出這許多糧食是因爲沒有讓自己吃飽。這是對

的。但是應該知道，我們戰前的商品糧食總額比現在要多一倍。正因為我們現在的商品糧食少了一半，正因為如此，現在才沒有糧食出口了。沒有糧食出口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們失去了必須藉以輸入工業裝備以及拖拉機和農業機器的泉源。我們能不能不積蓄出口所剩的糧食儲備而繼續這樣生活下去呢？不能。

可見我們糧食儲備方面的情況是如何沒有保障和不穩定。

更不用說，我們不僅在這四方面都沒有糧食儲備，而且我們也缺少一定限度的儲備，使我們平靜地從一個糧食收購年度進入另一個收購年度，並在青黃不接的六七月間不斷地供應城市。

既然如此，還能否否認穀物問題的迫切性和我們在糧食戰綫上的困難的嚴重性嗎？

但是，由於糧食方面的困難，我們在政治上也發生了困難。同志們，這一點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忘記的。我指的是我們這裏有一部分農民，即一部分貧農和一部分中農產生了不滿情緒，這種情緒在一定程度上威脅着結合。

當然，像弗魯姆金那樣在他的信中說我們的結合已經破裂，這是完全不對的。同志們，這是不對的。結合破裂是嚴重的問題。結合破裂等於內戰的開端，甚至等於內戰。不應當拿這些「可怕」的字眼來嚇唬自己。不應當張皇失措。這不是布爾什維克所應有的。結合破裂等於農民和蘇維埃政權的破裂。但是，如果農民真的和糧食的主要收購者蘇維埃政權破裂，那末他們就不會給你擴大播種面積了。可是，我們看到今年所有產糧區的春耕播種面積毫無例外地都擴大了。這叫什麼結合破裂呢？難道可以像弗魯姆金那樣把這種情況說成農民經濟「沒有前途」嗎？這叫什麼「沒有前途」呢？

我們在糧食方面的困難的原因，如果是指長期性的和基本的的原因，而不是指臨時性的、暫時的原因，那末困難的根源究竟是什麼呢？

我們在糧食方面的困難的根源就是農業日益分散和零碎。農村經濟，特別是穀物生產，正在日益縮小，收入愈來愈少，商品糧食生產也愈來愈少，這是事實。革命前我國約有一千五百萬至一千六百萬農戶，而現在則有二千四百萬至二千五百萬，並且這種分散過程還有繼續加強的趨勢。

是的，我們現在的播種面積比較前少了一些，但糧食總產量比較前總共只少百分之五左右。但糧食的是，儘管如此，我們的商品糧食却比較前少了一半，也就是少了百分之五十。這就是問題的根源所在。是怎麼一回事呢？問題就在於小經濟比大經濟收入少，出產商品糧食少並且不如大經濟穩定。馬克思主義關於小生產不如大生產有利這個著名原理，在農業上也是完全適用的。因此，在同樣大的一塊土地上，小農經濟比大規模經濟出產的商品糧食就要少得多。

出路何在呢？

如政治局決議中所說的，我們的出路有三條。

一、出路就在於：盡量提高中、小農民經濟的生產率，以鐵犁代替木犁，供給小型和中型機器，供給肥料，供應種子，給予農業技術方面的幫助，使農民合作化，和各農村訂立預購合同，貸給優良種子，從而保證集體農貸的發放，並通過出租站租給他們大型機器。

有些同志的看法是不對的，他們認為小農經濟已經沒有進一步開展的可能了，所以也就不值得再去幫助它了，這是完全不對的。個體農民經濟發展的可能性還不小。只是應當善於幫助它發揮這些可能性。

「紅色報」①的看法也是不正確的，它認為使個體農戶在供銷方面合作化的政策是不正確的。同志

① 「紅色報」(日刊)於一九一八年一月至一九三九年二月由列寧格勒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出版。

們，這是完全不對的。恰恰相反，組織供銷合作社的政策已經完全證明是正確的，它爲農民轉向集體農莊運動打下了實際的基礎。毫無疑問，不發展供銷合作社，農民對集體農莊的態度就不會有今天這樣的轉變，而這種轉變是幫助我們推進集體農莊建設的。

二、其次，出路就在於：要在新的技術和集體勞動的基礎上幫助貧農和中農，把他們分散的小農莊逐步聯合爲收入更多、出產商品糧食更多的大規模集體農莊。我指的是把小農莊聯合爲大規模公共農莊的一切形式，從簡單的協作社到勞動組合，這種勞動組合比分散的小農莊出產的商品要多得無比，其生產率也要高得無比。

這就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

有些同志提倡集體農莊，同時贊備我們爲小農經濟作「辯護」，這是不對的。顯然他們認爲對個體農民經濟的態度應當是鬥爭和消滅，而不是幫助和把他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同志們，這是完全不對的。個體農民經濟根本不需要「辯護」。它的收入少，這是對的。但這還不是說它就完全沒有用處了。如果我們離開了列寧的立場，反對由集體農莊經常幫助個體農民經濟，而主張和個體農民經濟作鬥爭並把他們消滅掉，那我們就是破壞結合了。

有些同志讚揚集體農莊，同時把個體農民經濟宣佈爲「該死的東西」，這就更不對了。這裏已經含有對農民經濟直接開火的味道。這種想法是從哪裏來的呢？如果農民經濟是「該死的東西」，那末怎樣解釋工人階級和基本農民羣衆的聯盟呢？工人階級和「該死的東西」聯盟，——難道世界上有這樣荒唐的事情嗎？既然鼓吹聯盟，怎麼同時又能說出這種話呢？人們時常提到列寧所說的我們必須逐漸從農民的瘦馬路上，工業的細馬那句話。這是很好的。但是，難道就是這樣從一匹馬路上另一匹馬嗎？還在蘇聯宣佈的集體農莊制度廣泛和強大的基礎之前，就宣佈農民經濟是「該死的東西」，這豈不是弄得沒有

有任何馬也沒有任何基礎了嗎？（喊聲：「對，對！」）這些同志的錯誤就在於他們把集體農莊和個體農民經濟對立起來。可是我們不是要把這兩種經濟形式互相對立起來，而是要把它們互助結合，以便使集體農莊在這種結合中幫助個體農民，幫助他們逐漸走上集體制的軌道。是的，我們要使農民不把集體農莊看做自己的敵人，而看做幫助他們的朋友，幫助他們擺脫貧困的朋友（喊聲：「對！」）。既然這是對的，那末就不應當說爲個體農民經濟作「辯護」，不應當說農民經濟是「該死的東西」了。

應當說，小農經濟和大規模的集體經濟比起來利益較小，甚至很小，但是它終究沒有喪失其一定的相當重要的作用。而你們的結論是：小農經濟根本是沒有益處的，也許甚至是有害的。

列寧對於小農經濟的看法不是這樣的。他在「論糧食稅」那篇演說中對於這一點是這樣說的：

「如果農民經濟能發展下去，那就必須確切地保證它能進一步過渡，而進一步過渡就必然使利益最小、最落後、分散和單獨的小農經濟逐漸聯合起來，組織成公共的大規模的農業經濟。對於這一切，社會主義者一向都是這樣設想的。我們共產黨的看法也正是這樣的。」（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六四頁）

由此可見，個體農民經濟終究是有一定作用的。

一種情況是：高級的經濟形式即大規模經濟對低級的經濟形式作鬥爭，使它遭受破壞並把它消滅。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情況就是這樣。而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情況則是：高級的經濟形式不是破壞低級的經濟形式，而是幫助它提高，幫助它走上集體制的軌道。蘇維埃制度下的情況就是這樣。

列寧關於集體農莊和個體農民經濟的相互關係是這樣說的：

「特別應當切實執行並徹底執行蘇維埃政權的法律（關於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法律。——斯大林說），這個法律要求國營農場、農業公社和一切類似的聯合對附近的農民和中農給予迅速和全面的幫

助。只有在給予實際幫助的這種基礎上和中農的協定才得以實現。只有這樣才能夠並且一定會取得中農的信任。」（「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九五頁）

由此可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應當幫助的農民經濟正是個體農民經濟。

最後，再引證列寧的一段話：

「掌握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只有當它在事實上給農民指明了公共的、集體的、協作社的、勞動組合的耕種制的優越性時，只有當它能用協作社的、勞動組合的經濟來幫助農民時，它才能真正向農民證明自己正確有理，才能真正把千百萬農民羣牢固地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一七三頁至第一七四頁）

這裏可以看到列寧對於集體農莊運動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造方面的意義的評價是多麼高。

有些同志在他們的長篇演說中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個體農民經濟的問題上，而對於我們黨迫切的、具有決定意義的關於發展集體農莊的任務却隻字不提，簡直連隻字也不提，這是非常奇怪的。

三、最後，出路在於：鞏固舊有的國營農場並發展新的大規模的國營農場，也就是鞏固並發展收入最多和生產商品糧食多的經濟單位。

這就是三個基本任務，完成了這些任務，我們就能夠解決穀物問題，從而就能把我們糧食戰線上的各種困難的根源剷除。

目前時期的特點就是：第一個任務，即仍然是我們工作的主要任務的發展個體農民經濟任務，已經不足以解決穀物問題了。

目前時期的特點就是：要發展集體農莊和發展國營農場這兩個新任務在實踐上去補充第一個任務。

不把這些任務結合起來，不頑強地在這三方面同時進行工作，那末不論在供應全國商品糧食方面，或是在社會主義原則改造我國整個國民經濟方面，穀物問題都不能得到解決。

列寧對於這一點是怎樣看的呢？我們這裏有一個著名的文件可以證明，政治局提請全會審核的決議和列寧在這個文件中所擬定的發展農業的實際計劃是完全一致的。我說的就是列寧親自起草的「勞動國防委員會的指令」。這個指令是一九二一年五月頒佈的。列寧在這個文件裏分析了三類實際問題：第一類是關於商品流通和工業的問題，第二類是關於發展農業的問題，第三類是關於各種經濟會議①和各省經濟調整會議的問題。

在這個文件中關於農業說了什麼呢？下面就是「勞動國防委員會的指令」中的一段：

「第二類問題。發展農業：（甲）農民經濟，（乙）國營農場，（丙）農業公社，（丁）勞動組合，（戊）協作社，（己）其他形式的公共經濟。」（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六八頁。）

由此可見，政治局關於解決糧食問題和整個農業問題決議的實際結論和一九二一年列寧在「勞動國防委員會的指令」中所提出的計劃是完全一致的。

很值得注意，列寧這個能够移山倒海的巨人，每次當他聽到關於建立起一兩個集體農莊或者給某個國營農場派去拖拉機的消息時，總流露出純粹是少年的喜悅。例如他在給「技術援助蘇俄協會」的信中寫道：

「親愛的同志們！我們的報紙上登出了一些非常可喜的消息，報道了貴會會員在唐波夫省基爾薩諾

① 指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建立的直屬於蘇聯埃執行委員會的地方經濟會議。——俄文版編者註

夫蘇和在數德薩賓米梯路車站附近各國營農場工作的情况，以及頓巴斯一批礦工的工作情况……我要請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授予最卓越的農場以模範的稱號，並給予它們爲順利開展工作所必需的特別的和及時的幫助。我再一次代表我們共和國向你們深深致謝，並請你們記住，你們幫助我們用拖拉機耕地是特別適時和重要的。我能够在你們準備組織二百個農業公社的時候向你們致賀，感到特別滿意。」

（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三四四頁）

列寧又在給美國「蘇俄之友協會」的信中寫道：

「親愛的同志們！我剛才曾特別向皮爾姆省執行委員會詢問並查對了我們報紙上發表的關於以哈羅德·羅爾爲首的貴會會員率領皮爾姆省拖拉機隊在「托依基諾」國營農場的工作情况的非常可喜的消息……我要提請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授予這個國營農場以模範的稱號，並在建築工程方面以及供給汽油、五金和獨建立供理工廠所必需的其他材料方面給予特別的和及時的幫助。我再一次代表我們共和國向你們深深致謝，並請你們記住，沒有一種幫助能像你們給予我們的幫助那樣適時，那樣重要。」

（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三四三頁）

可見，列寧就是這樣喜悅地閱讀關於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發展情况的每一個小消息的。

讓那些想欺騙歷史並認爲在我國勝利建設社會主義可以不要集體農莊和集體農場的人以此作爲說詞吧！

同志們，我就要講完了。我認爲，糧食問題上的困難對於我們不是沒有用處的。我們黨是在克服困難並克服各種危機中取得教訓而邁進的。我認爲目前的困難將使我們布爾什維克的隊伍受到鍛鍊，並促使他們認真地去解決糧食問題。而這個問題的解決就是掃除我國社會主義改造道路上的一個最大障礙。

適應總的經濟情況的糧食收購政策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聯共（布）中央全會根據米高揚同志的報告

所通過的決議

（一）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事實是社會主義大工業在新技術基礎上的迅速增長，包括電力建設在內的一般建設的發展，城市與工業中心的繁榮，以及工人階級在數量上質量上的成長。

但是社會主義建設不能僅限於工業。社會主義建設要得到充分而全面的發展，必須包括農業，把農業與工業結合起來，並提高農業發展的水平。可是農業還處在極低的水平上，而其發展速度又大大落於工業。

工業是使農業在社會主義工業化基礎上得到改造的強大動力，而農業則是工業發展的基礎，是吸收工業品的市場，是供應原料和糧食的基地。不僅如此，同時工業所帶的生產資料的輸入量（它給工業發展的速度造成某種限度）多半取決於農產品首先是穀物的輸出量。最後，經濟機動上所必需的外匯，其積累的可能性也多半取決於農產品的輸出量。

因此，在國內外情況迫使社會主義工業迅速發展的條件下，農業特別是穀物生產的極低的水平就包藏著社會主義城市與小農鄉村分裂的危險，從而包藏著使整個國民經濟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條件有遭受破壞的危險。

由於穀物生產的落後，這種危險特別明顯。無論就滿足國內市場的需要來說，或就擴大輸出來說，

穀物生產的增長都落後於對糧食的需要的增加。在農業的各部門中，穀物生產與其生產率（單位面積產量）或商品率來說都是最落後的。在這方面最突出的是下述情況：播種面積已達戰前水平百分之九十五，而穀物生產的商品量却剛剛達到戰前水平百分之五十。因此，糧食的輸出一落千丈，而戰前却是每年輸出六億至七億普特的。

穀物生產的落後及其商品的銳減的根源，是農業生產的散漫、分散、水平很低，穀物的生產是小農形式，因而具有半自然經濟的性質。

在這裡有同樣重大意義的是：一方面，能够提高中小農戶的生產率，特別是提高穀物收成的方法和可能性（選種、機器、肥料、土地整理、農業技術宣傳）未能充分利用，另一方面，從穀物價格與其他農業產品價格的差別來看，穀物生產處於不利地位。

因此，穀物問題是經濟政策中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爲了解決穀物問題，克服城鄉分裂的危險，消滅糧食戰線上可能發生的困難的根源，從而保證國家工業化的速度，必須：

一、保證促進中小個體經濟（在相當時期內還是國內穀物經濟的基礎）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價格、機器、礦物肥料、選種、預購合同、土地整理等等），使合作組織網包括更多的中小農戶，促進農民的生產合作。鑒於吸引農民參加合作社，特別是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工作效果很差，全會要求全黨特別注意列寧合作社計劃的實現對提高個體農戶的收成和商品率，對逐漸把他們納入社會主義建設的軌道的決定意義。

二、堅決實現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提出的「把個體小農經濟聯合並改造爲大規模的集體經濟」的任務。這種集體經濟是建立在新技术基礎上的自願聯合，無論從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來說，或從農業的生

產率 and 商品率的迅速提高來說，它都是穀物生產的高級形式。

三、發展現有國營農場和建立新的國營農場（生產穀物的），這些農場是「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經濟」（黨綱），它們能保證最高的商品率，並和集體農莊一樣是促進農民經濟的改造的據點。

穀物生產的散漫、分散和落後是糧食戰線上可能發生困難的根源，而這種可能正是在今年成爲現實，再加上其他特殊原因，結果就產生了收購的危機。這些特殊原因有如下述：

（一）由於農民的需求的增加較工業品供應的增加更爲迅速（這是由農村收入特別是富農收入引起的），遂使市場的平衡遭到破壞，而且日趨嚴重。

（二）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的比價不當，減少了對出售餘糧的刺激，然而，黨不與農村中的貧苦階層發生衝突，又不能使收購年度的下半年改變這種情況。

（三）計劃領導的錯誤，主要是在及時運送商品和稅收方面的錯誤（對農村有產階層課稅輕）。

（四）收購機關和黨政組織的缺點（步調不一致，缺乏積極性，任其自流）。

（五）城鄉資本主義分子（富農和投機者）利用所有這些弱點破壞糧食收購工作。

由於這些缺點，國家在一九二八年一月與上半年比較，少收購一億二千八百萬普特的糧食，這就使整個國民經濟遭到危機的威脅。

由於及時地採取了各種措施（其中相當部分是帶非常性的），黨和蘇維埃政權才防止了這一威脅，在一月至三月中補足了收購年度上半年的缺額，並在四月一日達到了去年的糧食收購水平，在繼續執行糧食收購計劃的條件下，這是會保證在新收成之前滿足國內市場需要的。

但是，由於主要糧食供應地烏克蘭南部和北高加索部分地區的秋季作物遭受災害，烏克蘭完全地和北高加索部分地不成其爲供應地了，這不僅使國家在新收成之前少收購二千五百萬普特糧食，並且要求

國家補助重糧所需的糧食，使國家必須在全國範圍內撥出三千萬普特的小麥。這種情況加上因滿足資本的消費界而造成的糧食超支，迫使收購機關在其他產糧區加緊收購並動及農民自用的存糧。

繼一切就為再度採取各項非常手段造成基礎，也為下述行為造成肥沃土壤：在收購區實行強迫命令，破壞革命法制，部分採用餘糧收集制的方法（四出巡查，封閉市場，非法搜查等等），而在消費區則急劇地縮小供應計劃，並在很多地方造成「空白區」並部分實行糧食配給制。

這些情況引起了一部分農民的不滿（表現在他們群起反對強迫命令的行為），使農村資本主義分子易於利用這種不滿來反對蘇維埃政權，使反革命分子等部分地活躍起來，並為廢除新經濟政策的言論提供理由。中央在進行非常手段時，特別強調了這些手段的暫時性，儘管如此，但仍有人把這些手段解釋為由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關於加緊向農村資本主義分子進攻的決議所自然而產生出來的手段，這種解釋只是證明，與黨敵對的思想直到現在還在影響黨內的一批黨員。黨在實行自己的政策時，既要與那些代表國內資產階級傾向和企圖拋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關於「繼續展開對富農的進攻」的決議的分子作堅決的鬥爭，也要與那些力圖賦予這些非常和暫時的手段以經常的或長期的方針的性質，力圖藉此使工人與基本農民羣衆的聯盟遭受威脅的分子作堅決的鬥爭。

中央全會堅決清除關於廢除新經濟政策和要求取消對富農權利的限制的反革命胡說，完全擯棄那種脫離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決議的路綫，繼續向富農進攻（決不是用所謂「剝奪富農」的辦法），並宣稱新經濟政策是無產階級國家的這一種政策，它「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完全保證我們能够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列寧語）。中央全會宣稱，社會主義經濟形式在新經濟政策基礎上的發展不是削弱而是會加強資本主義分子的反抗，同時蘇維埃政權及其羣衆基礎還更為加強，這就必然使某些居民階層在革命情況尖銳化的時候，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動搖。黨在農村中的基本階級方針應當是「依靠貧農，與中農結成鞏

團聯盟，向富農進攻的政策」(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社會主義經濟形式的發展引起資本主義分子反抗的加強，而計劃領導的錯誤和我們政策上的缺點則提高這種反抗的程度，使資本主義分子能够使城鄉小資產階級的動搖階層跟着他們走。因此，在當前的糧食收購運動中，黨的注意力必須集中在這一點上：實行一些措施來消滅這些缺點和錯誤，並消除採取任何的非常手段的必要性。

這些措施就是：

(一) 立即消滅四出巡查、非法搜查和各種破壞革命法制的現象。
(二) 立即消滅復活餘糧收集制的各種行爲，根據所有一切封閉市場的企圖，保證國家機關以最靈活的方式調整商業。

(三) 按不同地區和不同穀物而適當提高糧價。

(四) 不允許在工業品分配工作上再犯錯誤，保證及時把工業品運往糧食收購區去。

(五) 把收回貸款和徵收統一農業稅的政策跟糧食收購的利益結合起來。

(六) 與私自釀酒的現象作堅決的鬥爭。

(七) 正確組織糧食供應工作，不容許超支糧食，由地方商品流轉和地方收購機關擔負起供應不包括在國家總計劃內的消費者的責任。

(八) 必須建立國家的糧食(糧食和糧籽)後備。

蘇維埃政權在糧籽上對貧農和中農實行的認真的幫助，保證了春耕作物的播種面積的大大擴展。這種情況是與有利的收成景象(根據六月十五日的材料，蘇聯中央統計局估計其超過中等收成)相符合的。這一切加上工業的增產和收購機關的改組，再配合以上述的措施，雖然機動性的存糧不足，也必定能使收購工作在秋季以前就達到正常的速度。

要實現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關於繼續向農村資本主義分子進攻的決議，全黨和全體共產黨員必須進行堅持不懈的有系統的工作來提高黨的政治積極性和組織性，並加速其經濟的發展。

全會深信黨定會光榮地克服現時的困難。

全會號召所有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發揮自己一切力量來順利地實行黨在糧食收購方面的政策。

（譯自「聯共（布）歷次會議決議」俄文版第二卷第二七七—二八一頁。）

斯大林：論工農結合和國營農場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一日的演說摘要

有些同志在他們關於國營農場的發言中又回到昨天討論糧食收購問題時所發生的爭論上去了。既然如此，我們就回到昨天的爭論上去吧。

我們昨天所爭論的是什麼呢？首先是關於城鄉間的「剪刀差」問題。是講到農民購買工業品仍然要多付一些錢，而出售農產品仍然要少得一些錢。是講到這種多付少得的現象就等於向農民徵收一種類似「資稅」的額外稅，即爲了工業化而徵收的附加稅；我們必須取消這種附加稅，但是，如果我們不想破壞我國工業，不想減低我國工業（爲整個國家生產的並將我國國民經濟推向社會主義的工業）的一定發展速度，那末我們是不能立刻取消這種附加稅的。

有些人不喜歡聽這種話。看來，這些同志是害怕承認事實。這有什麼辦法呢？這是個人的口味問題。一些人認爲在中央全會上不應當說出事情的全部真相，而我認爲我們在自己黨的中央全會上必須說出事情的全部真相。不應當忘記，決不能把中央全會看做羣衆大會。當然，「額外稅」、「附加稅」這些字眼是令人不愉快的，因爲它們很刺耳。但是，第一、問題不在於用什麼字眼；第二、這些字眼完全符合實際情況；第三、用這些令人不愉快的字眼目的正是爲使人感到刺耳；正是要迫使布爾什維克極認真地來取消這種額外稅，來消滅「剪刀差」。

怎樣才能消滅這些令人不愉快的東西呢？那就要不斷地使我們的工業合理化，並不斷地降低工業品價格；不斷地提高農業技術和產量，並逐步降低農產品成本；不斷地使我們商業機構和糧食收購機構的工作合理化，如此等等。

當然，這一切不是在一兩年內就能做到的。但是，如果我們想去掉各種各樣的令人不愉快的東西和討厭的現象，那我們就必須把這一切在幾年內全部做到。

昨天有一部分同志堅持立刻消滅「剪刀差」的路綫，並實際上要求調整農產品的價格。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對此表示反對，認為這個要求在目前是違反國家工業化的利益的，因而也是違反我們國家的利益的。

同志們，這就是我們昨天爭論的問題。

今天這些同志承認他們放棄了調整價格的政策。這是很好的。可見昨天的批評對這些同志不是沒有好處的。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問題。我在自己的演說中曾經指出，一部分同志在關於因糧食收購問題而談到發展農業的辦法的發言中，對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這樣重要的措施竟隻字未提，這是反常的和奇怪的现象。怎麼能把在農業方面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這樣重要的任務「忘掉」呢？未必不知道，發展個體農民經濟的任務在目前雖然很重要，但是已經不夠了，如果我們在實踐中不拿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新的任制來補充這個任務，那末，我們就不能解決穀物生產問題，並且無論在對我國整個國民經濟（也包括農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方面，或在保證國家有一定的商品糧食儲備方面，我們就都不能擺脫困難。

既然如此，怎麼能把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問題「忘掉」並避而不談呢？

現在我們談談大規模國營農場的問題。有些同志認為北美沒有大規模的穀物農場，這種看法是不對的。事實上，北美和南美都有這樣的農場。我可以引證杜萊柯夫教授的話，他曾在「伏爾加下游」雜誌

①第九期上發表過考察美國農業的結果。

讓我來引證杜萊柯夫文章中的幾段話。

「坎柏爾農業公司」在蒙大拿有一個小麥農場。該農場面積九萬五千英畝，合三萬二千俄畝左右。農場的田地是一整塊，爲了便於耕作，分成四部分，每一部分相當於我國的一個獨立農莊，每一部分由一個人掌管，而整個農莊則由該公司經理湯姆士·坎柏爾一人掌管。

根據報上的消息，當然是來自該農場的消息，今年種植農作物的土地約佔該農場全部土地的一半，預計將收穫小麥約四十一萬蒲式爾（約八十萬普特），燕麥二萬蒲式爾，亞麻子七萬蒲式爾。該企業的總收入預計爲五十萬美元。

在這個農場中，馬和騾子幾乎全被拖拉機、卡車和汽車所代替。耕地、播種以及全部田間工作，特別是收割莊稼，都是日夜進行的；而且夜間，機器在探照燈照耀下在田裏工作。大塊播種而使機器能一直前進很遠而不必轉彎。這樣，如果莊稼情況許可，二十四英尺寬的聯合收割機可以一直走二十英里，合三十俄里多些。以前做這種工作需要四十四匹馬和四十個男工。一台拖拉機可以同時拖四個捆割機，它一週能把寬四十公尺、長二十八英里（約等於四十二俄里）一塊土地上的莊稼捆好。在收穫時，如果穀物還不够乾，還不能在收割的同時打穀，那就要使用捆割機。這時就要把捆割機上的切割器卸下，用特殊的傳送把割下的莊稼排列成行。莊稼這樣鋪開以後，經過二十四至四十八小時就乾了，而和莊稼同時

①「伏爾加下游」雜誌是月刊，於一九二四在薩拉托夫由伏爾加下游區計劃委員會和薩拉托夫省計劃委

員會出版，一九二六年起改由薩拉托夫省和邊區計劃委員會出版，一九三二年八月至一九三三年由邊區計劃委員會在新大林格勒出版。——俄文版編者註

割下的雜草的種子就落在地上。然後使聯合收割機，把機上的鋸刀取下，換上自動運送機，這種自動運送機把曬乾的莊稼直接送到脫穀機的圓筒中去。而且在機器上工作的只有一個拖拉機手和一個管脫穀機的人。在機器上再也沒有別人了。穀物從脫穀機直接倒入載重六噸的車廂中，然後，由每次拖十個車廂的拖拉機運到糧食倉庫。消息中說，這樣工作，每天能打穀一萬六千至二萬蒲式爾。」（見一九二七年九月「伏爾加下游」雜誌第九期第三十八頁至第三十九頁）

這就是一個資本主義類型的大規模的小麥農場的情況。在北美和南美都有這種大規模的農場。

有些同志在這裏說，在資本主義國家中，這種大規模農場發展的條件並不總是有利，或者不完全有利，因此，這種農場有時就分成一些規模較小的、佔地一千至五千俄畝的單位。這是完全對的。

根據這一點，這些同志就認為大規模的穀物農場在蘇聯的條件下也是沒有前途的。這就完全不對了。

看來，這些同志不了解，或者沒有看到資本主義制度和蘇維埃制度在條件上的差別。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土地是私有的，因此，也就有絕對地租，這就增加了農業生產的成本，給農業生產的重大進步造成了不可克服的障礙。而在蘇維埃制度下，土地不是私有的，也沒有絕對地租，這就不能不使農產品的生產成本減低，因此也就不能不促使聯合起來的大農場在技術方面和其他各方面不斷進步。

其次，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建立大規模穀物農場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最大限度的利潤，或者至少是爲了使資本獲得相當於所謂平均利潤率的利潤，一般說來，大規模穀物農場不這樣就不能維持和存在。這種情況不能不使生產成本增加，從而在發展大規模穀物農場的道路上造成極爲嚴重的障礙。而在蘇維埃制度下，大規模穀物農場，也就是國營農場，爲了自己的發展根本不需要最大限度的利潤或平均利潤，它只限於最低限度的利潤（有時暫時沒有任何利潤也可以），同時又沒有絕對地租，這種就給大規模穀物農

場的發展造成了非常有利的條件。

最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對大規模的穀物農場在信貸上沒有優待，在稅收上也沒有優待，而在全力支持社會主義經濟的蘇維埃制度下，現在却有這種優待，而且將來還會有這種優待。

在蘇維埃制度下（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同），所有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條件，都為促進國營農場這種大規模穀物農場的發展造成了必要的和極為有利的環境。

現在我們談談最後一個問題，即關於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是鞏固工農結合並保證工人階級領導作用的支柱的問題。我們需要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不僅是為了保證我們在將來實現對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我們需要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而且是為了現在就在農村中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支柱，這是為鞏固結合並保證工人階級在結合中的領導作用所必需的。我們不能現在就指望把這種支柱建立並發展起來呢？我相信我們能夠而且應當指望這一點。據糧食總社的報道，它跟集體農莊、勞動組合和合作社訂立了合同，根據合同它能使它們那裏得到四千萬至五千萬普特左右的糧食。至於國營農場，材料說明：我們的新國營農場今年也能供給兩千五百萬至三千萬普特左右的商品糧食。

如果再加上農業合作社按照預購合同應當從個體農民那裏得到的三千萬至三千五百萬普特糧食，那末，我們就完全有把握得到一億普特以上的糧食，這些糧食至少可以用來作為國內市場的一定儲備。這多少總算是一點東西。

這就是我們農村中社會主義經濟支柱的初步成績。

由此應得出什麼結論呢？由此應得出這樣的結論：有些同志的看法是不對的，他們認為工人階級在農村中無力保衛自己的社會主義陣地，它似乎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無止境地退却，不斷把自己的陣地讓給資本主義成分。同志們，這是不對的。工人階級在農村中並不像那些膚淺觀察家所感覺的那樣軟弱

無力。這種悲傷的哲學和布爾什維主義毫無共同之處。工人階級在農村中有許多經濟支柱，即國營農場、集體農莊和供銷合作社，依靠這些組織，工人階級就可以加強和農村的結合，孤立富農並保證自己的領導。最後，工人階級在農村中還有許多政治支柱，即蘇維埃、有組織的貧農等等，依靠他們，工人階級就能鞏固自己在農村中的陣地。

黨和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依靠這些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利用無產階級專政所掌握的一切資財和力量（經濟命脈等等），便可以滿懷信心地進行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逐步鞏固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逐步鞏固工人階級在這個聯盟中的領導。

這裏應當特別注意農村中的貧農工作。必須承認這個規律：我們的貧農工作做得愈好，愈有成績，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的威信就愈高；相反地，我們的貧農工作做愈壞，蘇維埃政權的威信也就愈低。

我們常常談到和中農聯盟。但是要在今天的條件下鞏固這種聯盟，就必須和富農、和農村中的資本主義成分作堅決的鬥爭。因此，我們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提出加緊向富農進攻的口號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不加強貧農工作，不發動貧農反對富農，不經常幫助貧農，這樣就不能勝利地向富農進行鬥爭呢？顯然不能！中農是一個動搖的階級。如果我們的貧農工作做得不好，如果貧農還沒有成爲蘇維埃政權的有組織的支柱，那末，富農就會感到自己力量，中農就會倒向富農一邊。相反地，如果我們的貧農工作做得好，如果貧農成爲蘇維埃政權的有組織的支柱，那末，富農就會感到自己被包圍了，中農就會倒向工人階級一邊。

① 糧食社即穀物和油料作物生產，加工和銷售農業合作社的全俄中央聯合社，該社於一九二六年成

因此，我認爲加強對貧農工作，經常幫助貧農，並把貧農變成工人階級在農村中的有組織的支柱，是我們黨當前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譯自「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

斯大林：關於聯共（布）中央七月全會的總結（摘錄）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三日在聯共（布）列寧格勒組織積極份子大會上的報告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

一、關於糧食收購政策的問題

讓我們提供一點歷史情況。

今年一月初我們的情況怎樣呢？你們從黨的文件裏已經知道，今年一月初和去年同期相比，我們少收購了一億二千八百萬普特糧食。我不來詳細說明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因為這些原因在報上公佈的一些黨的文件裏已經說明了。現在對我們重要的是當時我們有一億二千八百萬普特的赤字。然而離泥濘時期只有兩三個月。因此，我們必須有所選擇：或者彌補缺額並確立今後糧食收購的正常速度，或者使我們整個國民經濟不可避免地面臨着嚴重危機。

要採取什麼辦法才能彌補缺額呢？首先，必須打擊那些哄抬糧價、使全國有遭受飢荒威脅的富農和好商。第二，必須把大量商品運到產糧區去。最後，必須發動我們所有的黨組織，扭轉整個糧食收購工作的現狀，根除放任自流的現象。因此，我們不得不採取非常措施。這些措施已經生效，到三月底為止我們收集了兩億七千五百萬普特糧食。我們不僅彌補了缺額，不僅防止了總的經濟危機，不僅趕上了去

本文共分「共產國際問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結論」三節，爲了配合全國總路線的學習，現將本文的第二、三兩節譯出發表。——編者

年的糧食收購速度，而且，只要在今後幾個月內（四月、五月、六月）保持相當正常的收購速度，我們還完全能擺脫糧食收購危機而不受任何損失。

但是，由於烏克蘭南部和北高加索一部分冬季遭災，烏克蘭完全不能供應糧食，北高加索只能供應一部分，這使國家喪失了兩三千萬普特糧食。這種情況加上糧食的超支，使我們不得不加緊其他地區的收購工作，因此簡及農民儲備防荒的糧食，這不能不使情況惡化起來。

我們從一月到三月收購了將近三億普特糧食，當時收購的是農民機動的存糧；從四月到六月我們收購的糧食連一億普特也不到，因為那時我們必須在收成的好壞還不能預料的情況下，去簡及農民儲備防荒的糧食。但是糧食還是必須要收購的。於是使得採取非常措施，實行強迫命令，破壞革命法令，挨戶巡視，非法搜查等等老毛病又犯了，使得國家的政治狀況惡化，工農結合受到威脅。

這是不是工農結合的分裂呢？不，這不是分裂。也許這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吧？不，這不是小事。這是對工農結合的威脅。這種現象的發生是因為我們黨的某些工作人員不夠鎮靜和堅定，不能清醒地、毫不誇大地去估計當時的情況。

後來，因為收成看好，非常措施部分取消，群情才緩和下來，情況好轉。

我們在糧食戰綫上的困難的實質是什麼？這些困難的根源在哪裏？現在我們的穀物播種面積幾乎和戰前一樣（總共只差百分之五），這難道不是事實嗎？現在我們出產的糧食也幾乎和戰前一樣（約五十億普特，總共只差兩三億普特）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儘管如此，我們出產的商品糧却比戰前少了一半，原因何在呢？

這是因為我們的農業是分散的。戰前，我們約有一千六百萬農戶，現在則有不下兩千四百萬農戶，而且農戶和土地繼續分散的趨勢沒有停止。小農經濟是什麼樣的經濟呢？是商品率極低、獲利極小、多

半自給自足的消费經濟，它的產品只能有百分之十二到十五是商品。然而，我們的城市和工業正在全力成長，建設正在日益發展，對商品糧的需求正在飛速增大。這就是我們在糧食戰綫上的困難的根源。

對於這一點列寧在他「論糧食稅」的演說裏說道：

「要是農民經濟能向前發展，那末必須有力地保證它能進一步過渡，而進一步過渡，就必然要把獲利最小、最落後和分散的小農經濟逐漸聯合起來，組織成公共的大規模的農業經濟。社會主義者向來都是這樣想的。我們共產黨也正是這樣看的。」（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卷第二六四頁）

原來，我們在糧食戰綫上的困難的根源就在這裏。

擺說這種狀況的出路何在呢？

第一、出路在於高中、小農民經濟，用一切方法幫助他們提高收穫量，提高生產率。用鐵犁代替木犁，供給優良種子，供給肥料和小型機器，在個體農民經濟中建立廣泛的合作社網，和各農村訂立合同（預購合同）——任務就是如此。農業合作社和各農村訂立合同有這樣一種方式，其目的在供給農民以種子，藉此提高收穫量，保證農民及時把糧食交給國家，發給農民獎金（即在公議價格上補加若干）以獎勵及時交糧，並在國家和農民間建立穩固的關係。經驗證明，這個方法是有顯著效果的。

有人認為個體農民經濟已經失去作用，不值得予以支持。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種人和我們黨的路綫毫無相同之處。

另一方面，有些人認為個體農民經濟就是農業的整個內容。這也是不對的。而且，這種人是公然違反對列寧主義的基礎。

我們既不需要個體農民經濟的咒詛者，也不需要它的歌頌者。我們需要的是清醒的政治家，這種政治家能從個體農民經濟那裏取得最大限度可以取得的東西，同時也能把個體經濟逐漸納入集體主義軌道。

第二、出路在於把分散的中、小農民經濟逐漸聯合成爲完全自願聯合的、靠新的技術、靠拖拉機和其他農業機器進行勞動的大規模的集體和協作的組織。

集體農莊優越於小農經濟的地方在哪裏呢？在於集體農莊是大規模的經濟，因而有可能利用一切科學和技術的成就，在於集體農莊更能獲利，更爲穩固，有更高的生產率 and 商品率。不應當忘記：集體農莊的商品率是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而且每一俄畝的收穫量有時達二百普特或二百普特以上。

最後，出路在於改進舊的國營農場和建立新的大規模的國營農場。應當記住：國營農場是商品率最大的經濟單位。我們有些國營農場的商品率不下於百分之六十。

我們的任務在於正確地結合這三個任務並加強這三方面的工作。

目前這一時期的特點是：僅僅完成第一個任務，即提高中、小個體農民經濟的任務（它依然是我們農業工作方面的主要任務）顯然已經不足以解決整個任務了。

目前這一時期的特點是：要用提高集體農莊和改進國營農場這兩個新的實際任務來補充第一個任務。

除了這些基本原因以外，還有一些特殊的、臨時性的原因，使得我們的收購困難變成了收購危機。這是些什麼原因呢？中央全會的決議中指出下列幾個原因：

（甲）由於連年豐收，農村收入提高，特別是農村富裕階層和富農階層的收入提高，農民購買力增長的速度超過了工業品供應的增長，於是市場的平衡遭到破壞，而且這種趨勢還在加劇。

（乙）糧食價格低於其他農產品，因而減弱了對出售餘糧的刺激；但是，不損害農村力量單薄的階層的利益，黨就不能在今年春季改變這種狀況。

（丙）計劃領導發生錯誤，這主要是沒有及時調運商品，對農村富裕階層收稅過低，糧食的消耗

不得當。

- (丁)糧食收購機關、黨組織和蘇維埃機關有缺點(缺乏統一戰綫,缺乏積極性,聽其自流)。
- (戊)破壞革命法治,實行強迫命令,挨戶巡查,部分地封閉地方市場等等。
- (己)城鄉資本主義分子(富農、奸商)利用這一切缺點來破壞糧食收購工作並使國內政治狀況惡化。

一般性的原因需要好幾年才能消除,但特殊的臨時的原因完全可以立刻消除,以防止糧食收購危機的重演。

要消除這些特殊原因需要做些什麼呢;

那就必須:

- (甲)立刻制止挨戶巡視、非法搜查以及一切破壞革命法治的行爲;
- (乙)立刻制止各種各樣恢復餘糧收購制的行爲和任何封閉市場的企圖,同時保證由國家靈活地調整商業;

(丙)把糧食價格提高一些,其高低按地區和穀物種類有所不同;

(丁)組織正確的運送商品到糧食收購地區去;

(戊)正確地組織糧食供應工作,不准超支;

(己)一定要建立國家的糧食儲備。

在目前收成良好的條件下,如能忠實地有步驟地實行這些措施,在即將開始的糧食收購運動中就可以不必採取任何非常措施。

黨的當前任務就是要密切注視這些措施的切實執行。

由於糧食上的困難，在我們面前就出現了工農結合問題，工農聯盟的今後的命運問題，以及鞏固這個聯盟的方法問題。有人說，我們現在已經沒有結合了，分裂已經代替了結合。這當然只有張皇失措的分子才能有的愚謬說法。如果沒有結合，農民就會對未來喪失信心，閉關自守，不再相信作為農民糧食的主要收購者的蘇維埃政權的鞏固性，就會開始縮小播種面積，無論怎樣也不敢擴大播種面積，生怕又來挨戶巡視、搜查等等，並拿走他們的糧食。

然而我們的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我們所有的地區都擴大了春耕播種面積。主要產糧區的農民已把春耕播種面積擴大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這是事實。農民並不相信非常措施是永久性的，他們有充分的根據預計糧食價格定會提高，這難道還不明白嗎？這叫什麼分裂呢？當然，這並不是說沒有或者不會有過對結合的威脅。但是，從這裏就做出分裂的結論，那就是神經錯亂，做自發勢力的奴隸。

有些同志認為，要鞏固結合，就必須把重心從重工業移到輕工業（紡織品），以為紡織品就是基本的可以完全保證「結合的」工業。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

當然，紡織工業對於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和農民經濟間的物資交流，有巨大的意義。但根據這一點就認為紡織品是可以完全保證結合的基礎，那就大錯特錯了。事實上，工業和農民經濟間的結合，不僅靠農民個人消費所必需的印花布，而且也靠作為糧食生產者的農民所必需的五金、種子、肥料和各種農業機器。至於沒有重工業和機器製造業的發展，紡織工業本身就不能存在和發展，那就不用說了。

我們需要結合並不是為了永遠保存階級。我們需要結合是為了使農民接近工人階級，改造農民，改造他們的個人主義心理，以集體主義的精神改造他們，這樣來準備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消滅階級。誰不懂得或不願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誰就不是列寧主義者，而是向後看向前看的「農民哲學家」。

究竟怎樣改造農民呢？改造他們首先和主要的要最新的技術，靠集體勞動。

列寧對於這一點說道：

「改造小農，改造他們的整個心理和習慣，是幾代的事情。只有物質基礎，只有技術，只有在農業中大規模地使用拖拉機和機器，只有實行大規模電氣化，才能解決這個對小農的問題，才能使他們所謂的整個心理健全起來。只有這樣才能根本地和非常迅速地改造小農。」（「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二卷第一九四頁）

問題已很清楚，誰認為只要供給紡織品就能保證結合，而忘記在集體勞動基礎上改造農民經濟的五金和機器，誰就是要永遠保存階級，誰就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家，而是「農民哲學家」。

列寧在另一個地方這樣說：

「掌握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只有當它在事實上向農民指明了公共的、集體的、協作制的、勞動組合制的耕種方法的優越時，只有當它用協作制和勞動組合制的經濟來幫助農民時，它才能真正向農民證明自己正確有理，才能真正把千百萬農民羣衆牢靠地實在地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〇卷第一七三頁）

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真正牢靠地把千百萬農民羣衆吸引到工人階級方面來，吸引到社會主義方面來。

有時人們說，要保證結合，我們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向農民讓步。從這一點出發，就創造出不斷讓步的理論，認為工人階級只有不斷讓步才能加強自己。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這樣的理論只會使整個事業毀滅。這是絕望的理論。

爲要鞏固結合，除了讓步以外，還要有一系列其他的步驟，如建立農村中的經濟支柱（發展了的合

作社、集體農莊、國營農場）和政治支柱（在貧農中加強工作，得到貧農方面的可靠支持）。

中農是一個動搖的階級。要是貧農不支持我們，要是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軟弱無能，那末中農就會動搖到富農方面去。反之，要是貧農的支持有了保證，那末就可以有把握地說，中農是會動搖到蘇維埃政權方面來的。因此，有系統地進行貧農工作，保證貧農有種子和廉價的糧食，就是黨的當前任務。

二、關於培養工業建設幹部的問題

現在我們來談以技術知識分子的新幹部保證我國工業的問題。

這裏談的是我們工業方面的困難，因沙赫特案件而暴露出來的困難。

從改善工業的觀點來看，沙赫特案件的實質是什麼呢？沙赫特案件的實質和意義就是：應當保證我國工業有一定數量的忠於工人階級事業的專家，可是我們在這方面幾乎是赤手空拳，非常落後，落後得不像樣子。從沙赫特案件得到的教訓就是：要加速從工人階級中教育和培養出忠於社會主義事業並能在技術上領導我國社會主義工業的新的技術知識分子。

這並不是說，我們要拋開那些不按蘇維埃方式思想或不是共產黨員但同意和蘇維埃政權合作的專家。不是這個意思。我們今後還將用一切辦法，盡一切力量去吸收那些願意和蘇維埃政權携手並進來建設我國工業的非黨專家，非黨技術人員。我們並不要求他們立刻拋棄或立刻改變他們自己的社會政治觀點。我們只要求一點：既然他們同意和蘇維埃政權合作，他們就要老老實實地合作。

但問題在於這些準備和蘇維埃政權携手並進的舊專家相對地愈來愈少了。問題在於以年輕專家作他們的替班是絕對必要的。所以黨認為，要是我們不願再遇到新的意外事件，我們就要加速培養新的一代專家，並且必須從工人階級中，從勞動人民中來培養。這也就是說，要培養能夠滿足我國工業需要的技

術知識分子。

事實表明，教育人民委員部不負不起這個重要的任務。教育人民委員部消極保守，自行其是，兼之很少和生產聯系，所以我們沒有理由可以推斷它在最近將來能把這個任務担負起來。因此黨得出了結論：必須使教育人民委員部、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和交通人民委員部這三個機關來分担加速培養新的技術知識分子的工作。黨認為這是可以保證這一重要工作有必要速度的最適當的辦法。因此，決定把幾所高等技術學校移交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和交通人民委員部。

當然這不是說，把那些高等技術學校移交出去，加速培養新的技術知識分子幹部的任務就算完了。毫無疑問，物質上給學生以保證，在這裏應當起極重要的作用。因此，蘇維埃政權決定培養新幹部的費用在其比重上要向工業的基本建設費看齊，並決定每年增加這方面的經費四千多萬盧布。

結 論

同志們，應當承認，我們總是從我們的困難和錯誤中學習的。至少，到目前為止，情形是這樣：歷史是在困難中，在這種或那種危機中，在我們的這種或那種錯誤中教育我們並鍛鍊我們黨的。

一九一八年的時候是這樣：由於東綏的困難，由於和高爾察克鬥爭的失利，我們終於懂得了建立正規步兵的必要性，並真正把它建立起來了。

一九一九年的時候是這樣：由於鄧尼金戰綫上的困難，由於馬蒙托夫奔襲我軍後方，我們終於懂得了建立強大的正規騎兵的必要性，並真正把它建立起來了。

我認為，我們現在的情形也很相似。糧食的困難對我們不會是沒有作用的。這些困難定會推動布爾什維克，迫使他們認真着手發展農業，特別是發展穀物生產。要是沒有這些困難，布爾什維克未必會認真

着手處理糧食問題。

關於沙赫特案件及與之有關的困難也必須這樣說。沙赫特案件的教訓對我們黨不是而且不能是沒有作用的。我認爲，這些教訓定會迫使我們尖銳地提出關於培養能夠爲我國社會主義工業服務的新的技術知識分子的問題。

你們看到，在解決培養新的技術知識分子這一個問題上，我們已經採取了第一個重大的步驟。我們希望這不是最後一個步驟。（熱烈鼓掌，經久不息。）

載於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四日
「列寧格勒真理報」第「六二號」
（譯自「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

斯大林：論國家工業化與聯共（布）黨內的右傾（摘錄）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在聯共（布）中央全體

會議上的演說

（上略）

二 穀物問題

我在上面所講的都是關於提綱中的第一個基本問題，即工業發展底速度問題。現在來講第二個基本問題，即穀物問題。提綱底特點是在於：它強調發展一般農業、特別是穀物業的問題，提綱中的這個方針是否正確呢？我想是正確的。在七月全會上已經講到：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最弱的地方，就是一般農業特別是穀物底非常落後。

有些人在講到我國農業比工業落後的時候，便對於這種情形悲嘆起來，這自然是不鄭重的。農業總是比工業落後，而且將來也會比工業落後。這一點在工業十分集中而農業却十分散漫的我國條件之下是特別正確的。顯然，統一的工業將比散漫的農業發展得快些。從這裡也就發生了工業對於農業的領導作用。因此，農業之比工業的平常落後，還不是提出穀物問題的理由。

只有當農業之比工業的平常落後變為農業發展速度底過度落後的時候，農業問題、特別是穀物問題，才在舞台上出現。現在國民經濟狀況特別就在於：目前蒸蒸日上城市和工業區域對商品糧食的需要急劇地增加了，而我們的穀物業底發展速度却比工業發展底速度過度地落後。在這種情形之下，任務

並不是把工業發展底速度減低到穀物業發展底水平（這樣就會使一切混亂起來並且會使發展向後退），而是使穀物業底發展趕上工業發展底速度，並且把穀物業底發展速度提高，到能够保證全部國民經濟、工業與農業迅速向前發展的水平。

或者我們解決這個任務，而穀物問題也就因此解決，或者我們不解決這個任務，於是社會主義的城市與小農的鄉村之間就不可避免地要發生破裂。

同志們，我們的問題就是這樣。穀物問題底實質便是如此。

這是否說現時穀物業發展是「停滯了」或者甚至「退化了呢」？福龍金在他的第二封信中正是這樣提出問題來的，這封信我們根據他的要求今天發給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各委員。他在這封信中直接說道：「我們農業中有了『停滯』。他說：『我們不能而且不應把關於退化的事發表在報紙上，但是在黨內我們不應當掩飾：這種落後就等於退化。』」

福龍金底這個論斷是否正確呢？當然是不正確的！我們政治局委員完全不同意這種論斷，而政治局底提綱也根本不是這樣來說明穀物業狀況的問題的。

事實上，什麼是退化，而且退化在農業中應該表現於什麼地方呢？很明顯，退化應當表現於農業底後退和下降，應當表現於從新的經營形式退化到中世紀的舊的經營形式。退化應當表現於農民耕作底改變，例如從三田制過渡到移耕制，從犁和機器過渡到鋤頭，從純粹的清一色的種籽過渡到非純粹的非清一色的種籽，從現代農業耕作法過渡到下等農業耕作法，諸如此類皆是。但是我們現在難道看見了這類事實嗎？難道大家不知道成千成萬的農戶每年由三田制過渡到四田制以至多田制，從非純粹的種籽過渡到純粹的種籽，從鋤頭過渡到犁和機器，從下等農業耕作法過渡到高等農業耕作法嗎？這怎樣會是退化呢？

福龍金總愛拿政治局這個或那個委員底話來做自己觀點底證據。很可能，這次他也竭力想抓住布哈林底話，來證明布哈林在其經濟學家短評的論文中「也是這樣」說的。但是布哈林遠非「也是這樣」說的，布哈林在其論文中提出了關於退化底可能性或危險性的抽象的理論問題。抽象地說來，這樣的問題提法，完全是可能的而且合乎規律的。但福龍金做的是什麼呢？他把關於退化底可能性的抽象問題，變為農業退化的事實了。這就是他叫作的穀物業狀況底分析！同志們！這豈不是可笑嗎？

要是蘇維埃政權在它存在的第十一年使農業趨於退化，那還得了！對於這種政權，應該是趕走，而不是支持。這種政權如果真正是使農業趨於退化，那末工人們早就把它趕走了。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專門家都在向我們高唱退化，他們睡在夢裡也見農業在退化着。托洛茨基有一個時候會向我們高唱過退化。現在不料福龍金也走上這一條迷途了！

福龍金根據什麼提出自己的關於退化的論斷呢？首先就是我們今年播種穀物的面積比去年少些。這一事實的原因何在呢？是不是由於蘇維埃政權底政策所致呢？當然不是的。這個事實發生的原因，是因為烏克蘭草原地帶和北高加索一部分區域秋蒔作物枯死，與今年夏天在烏克蘭同一地方又遭受旱災的緣故。假如沒有這樣的不利的氣候條件（而農業又完全是依賴這些條件的），那末我們今年播種穀物的面積至少要比去年多一百萬俄畝。

其次，福龍金底論斷是根據於：我們今天的穀物總產量比去年多得有限（比去年多七千萬普特），而小麥與黑麥却比去年少兩億普特。這一切事實的原因何在呢？這也是因為旱災和秋蒔作物因大霜而枯死的緣故。假如沒有這些不利的氣候條件，那末我們今年的穀物總產量就會比去年多三億普特。請問，像大霜、旱災等等這些對於這區或那區底收成有決定意義的事實，如何可以撇開不談呢？

我們現在提出這樣的任務——播種面積擴大百分之七，收成提高百分之三，穀穀總產量大約增加百

分之十。毫無疑問，我們將採取一切方法來完成這一任務。然而，無論我們採用什麼辦法，還是不能保證不再遭受部分的歉收與這一區或那一區的旱災或霜災，而且在這些條件之下，穀物總產量也許難免較我們的計劃有一定的減低，也許甚至於比今天的總產量還少。這是不是說農業在「退化」呢？是不是說這種「退化」應歸咎於蘇維埃政權的政策呢？是不是說我們「褻奪了」農民在經濟上的刺激物呢？是不是說我們「破壞了」農民底經濟前途呢？

幾年以前，托洛茨基曾經犯了這樣的錯誤，他以為「下雨」對於農業是無關係的，李可夫在中央委員會大多數支持之下駁斥了他。現在福龍金犯了同樣的錯誤，他把對農業有決定意義的氣候條件撇開不談，而竭力把一切都歸咎於我們黨底政策。

提高一般農業、特別是穀物業底發展速度，需要一些什麼方法和手段呢？這種方法或途徑有下列的三個：

(一) 提高收成及擴大貧農中農個體經濟底播種面積；

(二) 繼續發展集體農莊；

(三) 擴大舊的國營農場與發展新的國營農場。

關於這一點，在七月全會的決議中就已經說過了。提綱把七月全會的決議重複一次，而把問題提得更具體了，並指出了這個事業上所應投資的數目。福龍金在這裡又找到攻擊的口實了。他以為如果把個體經濟放在第一位，把集體農莊與國營農場放在第二位和第三位，這恰好就是說他的觀點勝利了。同志們！這簡直是笑話。自然，如果從某些農業形式比重大底看來，那就要把個體經濟放在第一位，因為個體經濟出產的商品糧食比集體農莊與國營農場的幾乎要多到六倍。但是，如果從經濟類型底觀點看來，如果從哪一種形式最接近我們的觀點看來，那末就應當把集體農莊與國營農場放在第一位了，因為它們與個體

農戶比較起來，是一種更高的經濟類型。這兩個觀點對於我們都是可採用的，這難道還要證明嗎？

爲了使我們的工作可以沿着這三條道路進行，爲了達到農業特別是穀物業發展速度底實際提高，需要怎麼辦呢？

爲要達到這一點，首先必須使我們黨的幹部底注意力轉到農業方面來，把注意力集中在穀物問題底具體問題上面。應該把關於一般農業的普通言論和空話丟開，最後，應該按照各個區域底各樣條件訂出提高穀物業的實際措施。現在已經是從口頭轉到實際行動的時候了。最後，我們應當研究下面具體的問題：怎樣提高貧農中農的個體經濟底收穫量和擴大他們的播種面積，怎樣改善與向前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怎樣使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幫助供給農民以好的種子與好的畜種，怎樣經過租賃所給農民以機器與其他工具的幫助，怎樣擴大和改善訂立合同的事業與一般農業合作社的工作等等。（喊聲：「這是實際主義。」）這種實際主義我們絕對需要，因爲沒有它，我們就只好空談一般農業而不能解決穀物問題這一極嚴重的事情。

中央已提出任務，要組織主要產糧區域的重要工作人員在人民委員會和政治局報告農業發展的問題。在這次全會上你們可以聽到安德烈也夫同志關於解決北高加索穀物問題方法的報告。我想以後我們要依次叫烏克蘭、中部黑土區域、伏爾加流域、西伯利亞等等各區作同樣的報告。爲了轉移黨底注意力到穀物問題方面去，最後，爲了遷移我們黨的幹部到具體提出與穀物問題相關的問題的軌道上去，這是絕對必要的。

第二，必須使我們黨在農村中的工作人員，在其實際工作中嚴格地把中農和富農分別開來，不要把他們混在一塊，而且在打擊富農的時候，不要打到中農身上。最後，現在已經是消滅這些可以說是錯誤的時候了。例如，就拿個別稅的問題來說吧。按照政治局底決議及關於該項稅則的法律，個別稅不得超過

全體農戶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即是指富農中最富裕的一部分。但實際上是怎樣呢？有許多區域這種稅達到了百分之十、十二，甚至更多的農戶，因此觸犯到中農了。肅清這種單的時期不是已經到了嗎！

我們親愛的「批評家」不來指出具體的辦法以消滅這些和類似的不成體統的東西，而偏要考究字眼，提議把「富農中最富裕的一部分」這些字眼改作「富農中最強有力的一部分」或「富農中最上層的一部分」。好像這不是相同的！已經證明了我國富農約佔百分之五。已經證明了在個別稅的法律中只規定課加農戶百分之二至三，即富農中最富裕的部分。已經證明了有許多區域實際上是破壞了這項法律。然而「批評家」們並不指出消滅這些現象的具體辦法，而只進行字眼上的批評，不願意了解這完全是無濟於事的。簡直是些書獃子！（喊聲：「他們提議對全體富農徵收個別稅。」）呵！那就應該要求取消關於百分之二至三的個別稅的法律了。不過我倒沒有聽說過什麼人要求取消個別稅的法律。據說隨意擴大個別稅，其目的是在補充地方預算。但是不能用破壞法律、破壞黨的指令的方法來補充地方預算。我們的黨存在着，它還沒有消滅。蘇維埃政權存在着，它還沒有消滅。如果地方預算中的資金不夠，那就應該提出地方預算的問題，而不應該破壞法律，不應該取消消滅的指示。

其次，必須繼續發展對貧農和中農的個體經濟的剌激作用。毫無疑問，提高糧食價格，切實執行革命法律，用訂立合同的辦法實際地幫助貧農中農經濟等等，會大大地加強對農民經濟的剌激作用。福龍金以爲我們消滅了或差不多消滅了這種剌激作用，制奪了農民底經濟前途。這當然當是胡說八道。如果這是对的，那就不明白工人階級和基本農民群眾底結合、聯盟怎樣能保持得住。不能認爲這種聯盟是精神上的聯盟。最後，應當懂得，工人階級和農民底聯盟是各有指望的聯盟，是兩個階級底利益聯盟，是工人和農民基本群眾底階級聯盟，目的是雙方相互有利。顯然，假使我們消滅了或者差不多消滅了對農民的經

濟上的刺激作用，剝奪了農民的經濟前途，那末我們就沒有結合，就沒有工人階級和農民底聯盟了。很明顯，現在問題並不是在於「建立」或「發揮」對貧農中農的經濟上的刺激作用，而是在於加強這個刺激作用，並把它繼續發展以達到工人階級和基本農民群衆的相互利益。國民經濟控制數字的提綱中所說的正是這個問題。

最後，必須增加對鄉村的商品供給。我所指的是消費的商品，而特別是具有生產性質的商品（機器、肥料等等），這種商品能够提高農產品底生產。不能說在這方面一切事情都是很順利的。你們知道，商品缺乏的現象還遠沒有消除，而且在我們這裡大概不會很快就消除。我們黨內有些人抱有一種幻想，以爲我們現在已消除商品缺乏的現象。可惜這種幻想是不對的。應該注意到：商品缺乏的現象，第一是與工農物質福利底增長，與商品購買力底大大提高相關聯的，雖然生產品逐年地增加，但是不能滿足全部需要；第二，商品缺乏的現象是與目前工業改造的時期相關聯的。

工業底改造，就是把資金從消費品底生產轉移到生產資料底生產。不這樣做，就不會而且也不能大規模地改造工業，特別是在我們蘇聯的條件之下。然而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投資到新企業建設中去，城市和新消費者數目增加起來，可是新的企業也要經過三四年後才能提供大批新的商品。容易了解：這種情形是不能幫助我們消除商品缺乏的現象的。

但這是不是說，在商品缺乏的現象面前我們只好束手無策並承認自己無能爲力呢？不，不是這樣說。事情是在於我們能够而且應當採取具體辦法來減弱和節制商品缺乏的現象，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我們現在就應當做到。爲此應該努力加強那些和農業生產底發展有直接關聯的工業部門（斯大林格勒的拖拉機工廠，羅斯托夫的農業機器製造廠，沃隆涅什城的犁機工廠等等）。其次，爲此必須盡可能地加強那種與增加稀缺商品（呢、玻璃、織綢等等）有關聯的工業部門。……

古巴克說：按照國民經濟底控制數字，供給個體農民經濟的款項今年比去年少。我認爲還是不正確的。大概古巴克沒有計算到我們今年用訂立合同的辦法供給農民大約三億盧布的貸款（比去年幾乎多一億盧布）。如果算到這一點（而這是不能不計算到的），那就可以知道：我們今年用作發展個體農民經濟的款項比去年增加了。至於說到舊的和新的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今年投在其中的款項大約有三億盧布（較去年多大約一億五千萬盧布）。

應該特別注意到集體農莊、國營農場和訂立合同的方法。不能把這些東西僅僅視爲增加我們商品數物來源的方法。它們同時還是工人階級和基本農民羣衆結合底新形式。

關於訂立合同的方法，我們這裡講得够多了，我用不着多說了。每個人都明白，大批簽訂合同的方法，便利於我們把個體農民經濟底力量聯合起來，給政府和農民底互相關係輸入固定的因素，從而鞏固城市和鄉村的結合。

我希望你們都注意集體農莊，特別是國營農場，因爲它們是一些樞樞，便利於在新技術基礎上改造農業事業，使農民頭腦起一番革命，幫助他們從因循習慣和守舊思想中解放出來。拖拉機、大農業機器和成排的拖拉機隊在產糧區域中的出現，對於周圍農民底經濟，是不會沒有影響的。以種籽、機器、拖拉機幫助周圍的農民，無疑地會使農民估計到和考慮到這是蘇維埃國家力量強大底標誌，蘇維埃國家是在盡力使他們走上大大提高農業的康莊大道。這個情況我們過去沒有估計到，而且現在我們大概也沒有充分地估計到。但是，我認爲這是目前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在解決穀物問題和鞏固新形式的聯合方面所起的和能起的最主要的作用。

一般來說，這就是我們在解決穀物問題的工作方面所應當採取的道路和方法。

（下略）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十章第三節(摘錄)

托季聯盟爲反對我黨政策，爲反對社會主義建設，爲反對集體化而進行的煽動，以及布哈林分子所進行的煽動，說什麼集體農莊事業行不通，說不要觸動富農，因爲富農會自行「長入」社會主義，說資產階級發財致富對於社會主義沒有什麼危險，——所有這些煽動，都在國內資本主義分子中，首先是在富農中得到了強烈的回應。現在富農從報章上上所登載的消息中知道他們並不是孤獨無助的人，知道有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及其他等人保護和辯護他們。當然，這種情形不能不鼓起富農反對蘇維埃政府政策的精神。果然，富農也就一天天加緊進行反抗了。大批大批的富農實行拒絕把他們積蓄得不少的剩餘糧食賣給蘇維埃國家。他們採取恐怖手段來對付集體農民，來對付農村中黨的和蘇維埃的工作人員，放火焚燒集體農莊和國家穀倉。

黨很懂得，當富農反抗尚未被擊破，富農尚未在農民眼前被公開擊潰時，工人階級和紅軍是會苦於糧食不足，而農民的集體農莊運動是不能普遍發展的。

黨遵照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的指令，轉而對富農實行堅決的進攻。黨在進攻中所實現的口號是：穩穩倚靠著貧農，鞏固與中農的聯盟，堅決反對富農。爲了回答富農拒絕按固定價格把剩餘糧食賣給國家的行動，黨和政府實行了許多反對富農的非常手段，採用了刑律第一百零七條所定關於在富農和投機者拒絕按固定價格出賣剩餘糧食給國家時，得根據法庭判決沒收其所有剩餘糧食的辦法，同時又給予了貧農許多優待，使其能從所沒收的富農糧食中領得百分之二十五來供自己享用。

非常手段發生了應有的效力：貧農和中農加入了堅決反對富農的鬥爭，富農被孤立了，富農和投機

者底反抗被打破了。到一九二八年年底，蘇維埃國家已擁有充分的後備糧食，而集體農莊運動已是取着更有把握的步調向前邁進了。

(下略)

(一九五三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三五九——三六〇頁。)

關於一九二八——二九年國民經濟控制數字（摘錄）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聯共（布）中央委員會

全會一致通過的決議

（上略）

三、在上一經濟年度內，社會主義獲得了巨大成就，同時也產生了許多嚴重的困難與危機現象，對於這些困難與危機無論如何必須以黨與工人階級的力予以克服。這些危機的產生，歸根結蒂是由於整個農業、特別是穀物生產部門的極度落後與其發展速度緩慢而產生的。而且正如中央委員會七月全會所指出的：「農業、特別是穀物生產部門生產水平的極度低下……本身便包含着使社會主義城市與小農鄉村脫節的危險，因而也就包含着破壞整個國民經濟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條件的危險。」糧食問題，黑色金屬、建築材料的極度缺乏，商品的普遍飢荒，物資儲備問題，主要由於糧食不能對外輸出而造成對外輸出的極端落後，因此也使輸入大為不振，最後是鞏固幣制問題，所有這些都是經濟戰綫上最重要的問題，必須給以特別的注意。

四、在這一經濟問題中間，中心問題是農業問題。穀物生產遠未完成計劃任務。一切穀類作物的總收穫量在一九二六——二七年為四十七億四千七百萬普特，在一九二七——二八年為四十四億六千四百萬普特，在一九二八——二九年為四十五億三千五百萬普特，但食用穀類作物（黑麥與小麥）的總收穫量，因烏克蘭及北高加索秋蒔作物的死亡，而在一九二八——二九年較上年少收穫二萬萬普特。糧食

統一採購情況也是趨向下降的：一九二六——二七年採購量爲六億六千二百萬普特（其中輸出糧一億五千二百萬普特）；一九二七——二八年採購量爲六億二千七百萬普特（其中幾乎沒有輸出糧）。

而在糧食方面的所有這些情況，乃是在當一九二八年穀物播種面積還只達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九〇。一、糧食總產量只約達百分之八〇，其中商品糧食只達百分之五六（就全蘇計算），而蘇聯人口每年增加百分之二。三，城市人口每年增加百分之四，每個人，特別是鄉村每個人需要量增加的情況下產生的。

（中略）

然而應該注意，穀物生產乃是整個農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穀物生產是整個農業的決定因素，如果農業的發展很慢、特別是穀物生產過分落後，則有使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遭受破產的危險。

此外，最近數年來，在農業中出現了許多良好的改造因素。翻耕地面積的百分比提高了：如在一九二六年爲百分之二九。一，在一九二七年則增至百分之三二。一。多段輪種制的面積也擴大了：如在一九二五年爲三百六十六萬四千公頃，在一九二七年則增至九百四十二萬九千公頃。播種面積大量增加，因而貧農及資力薄弱中農的經濟比重也提高了。公有農業部分在農業商品產量中已開始起重要作用。對農業耕畜與農業機器的保證日益加強了。如在一九二六——二七年，每一百公頃土地有二五。六頭耕畜，在一九二八——二九年有二七。四頭耕畜。在一九二六——二七年，每一百公頃土地按價值計算有九個盧布九十個戈比的農業機器，在一九二八——二九年則將增至十一個盧布九十四個戈比。農業機器製造業將自一九二六——二七年的九千三百萬盧布增至一九二八——二九年的一萬九千萬盧布（按戰前價格計算），並將達戰前農業機器生產水平的百分之二八〇以上。

因此中央委員會全會認爲，關於我國農業、特別是穀物生產部分正在每況愈下的說法（如福祿木金

所說的)是毫無根據的。

然而，儘管有這樣許多良好的情況，但在農業發展中不利的趨勢還是很厲害的，因此在完成一九二八——二九年糧食採購計劃及糧食供應計劃上，仍需我們作極緊張的努力。引起糧食減產的原因，是在過去兩年內，在穀物播種面積擴大緩慢的情況下，在一九二八——二九年又凍死了五百萬公頃的秋播作物(其中有三百萬公頃，在政府及時的大力幫助下已進行補種)。加之凍死了莊稼的烏克蘭南部地區及北高加索在七月間又遭到一次旱災。

五、由於第一季度糧食採購工作的圓滿進行，使我們可以預期本年度統一採購的預定計劃，是能够徹底完成的。因此，中央委員會全會責成各地方組織，對糧食採購工作，不但不能放鬆，而且要更加強注意，以便改善國內糧食供給，並盡可能保證必要的種籽儲備，作為在春季救濟貧農及貧苦中農之用。

中央委員會全會一方面指出國內糧食收支對照表的不易平衡，號召黨以最高的警惕性注意糧食採購工作的進行，以最大的頑強性為節約糧食消耗而鬥爭，同一切浪費我國糧食儲備的現象作鬥爭，另一方面指出，黨與蘇維埃政府應爭取儘速使採用非常手段的糧食採購法過渡到正常的糧食採購法，指出這一事件是具有重大政治原則意義的。

中央委員會全會指出，七月全會所通過的各種措施，特別是提高糧食價格的措施，是完全正確的，這些不僅為順利開展今年糧食採購運動，而且為迅速提高農民經濟創造了前提。全會向各級黨的組織指出，只有全黨，特別是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對糧食採購事業給予特別的注意，只有向基本農民羣衆進行關於糧食採購事宜的廣泛政治宣傳工作，組織貧農、蘇維埃及合作社積極分子積極協助糧食採購員進行此項工作，並粉碎上層富農分子煽動人民囤糧不售的企圖——只有這樣，糧食採購工作才能繼續順利進

行。

由國內於糧食及原料極度缺乏，因此在一九二九年擴大播種面積百分之七，提高收穫量百分之三的任务，便成爲本年度經濟計劃最重要的中心任務之一。

中央委員會全體黨員注意這一指示的特殊重要性，並以最大的努力執行各種措施，保證這一指示的實現。

在這些措施中，除大量增加農業機器的供給，大大增加對各種農作技術改良措施的撥款，及規定一九二八——二九年度加強土壤改良工作外，作爲聯系與扶助農村經濟之新方法的定購合同，亦具有巨大作用，因而本年預定用於這類合同的撥款將達三億盧布。

中央委員會特別強調指出，必須保持與盡可能發展受凍、旱災害嚴重的草原地帶（烏克蘭與北高加索）的穀物生產，並責成政治局在一九二八——二九年計劃中規定出各種必要的措施。

六、農業乃是工業的基礎，農業的增長，也就是工業化糧食基地及原料基地的增長。如果沒有農業的相應發展，工業的長久發展客觀上是不可能的。

經濟計劃方案，在工業方面是超額完成了，但在農業方面，特別是在穀物生產方面却遠未完成。因此，紡織工業的停工（由於糧食不能輸出，棉花、亞麻不能輸入），其他許多部門的呈現某種解體狀態（主要由於糧食的供應不足等等），以及對工業化具有重大意義的輸出計劃的被破壞，——所有這些不良症狀，都是工業化事業由於農業的落後而正在遭受着各種困難的具體表現。農業基地的發展與工業發展之間日益不相稱的危險，乃是當前的主要危險。而農業發展特別落後的原因，是由於農業歷來落後、分散、技術水平極度低下，而且還有許多多半是臨時的因素。根據七月全會決議，這些妨礙農業迅速發展的許多臨時的因素，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剷除（如提高了糧食價格，廢除了糧食採購中的非常手段，加強

對農村的商品供給，對農民存貯給以扶助等等）。

同時，在一九二八——二九年，必須經過使個體農戶大批參加合作社，提高收穫量，在高度的技術基礎上逐漸將分散的農民經濟聯合成為大規模的聯合農莊，加強舊有的蘇維埃農場與發展新的蘇維埃農場等辦法，進一步消滅造成農業落後的根本原因。

對工業間發展不平衡益趨加深的危險，必須予以嚴重注意，因為從階級關係的觀點看來，這一危險，乃是對工人階級與基本農民羣衆聯盟的威脅。

目前的困難是與城市，特別是鄉村階級鬥爭的尖銳化，與國內資本主義分子，特別是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生長起來的富農對社會主義進攻採取日益增長的抵抗有關係。黨在農村中勝利的必要條件，就是在一切工作部門內嚴格遵守明確的階級路線。依靠貧農，鞏固地聯合中農，進一步加強對富農的進攻，是黨始終不變的政策的基础。特別是，必須保證貫徹執行黨與政府所規定的幫助鄉村貧農的各種措施。因此，關於在新的條件下無產階級對待中、貧農態度的問題，就又成爲擺在黨面前的頭等重要問題了。目前，工人階級給予農業生產技術與農村經濟關係轉向社會化方面以革命影響的可能性，大大地增加了。

無產階級只有迅速發展工業，進一步加強社會主義工業的領導作用與改造作用，才能實現無產階級對農業的這種革命性影響。在這方面，重工業及生產資料的生產，是整個國民經濟（其中包括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主要關鍵。而生產資料的生產與重工業的發展，也正是國家工業化的出發點。

七、堅決執行國家工業化方針，保證政府決議中規定增加的今年投資額，同時必須採取一切措施提高整個農業，特別是穀類作物，其中又特別是糧食生產，加強對剝削者及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的限制，以盡量發展農村生產力，鼓勵並盡量支持農業的集體經營形式（集體農莊、農業公社、農業組合等），盡

量加強對貧、中農大業的經濟刺激。

中央委員會全會強調指出，在刺激個體農民經濟發展方面，黨的機關與蘇維埃機關還未採取一切可以保證使基本農民經濟大大提高的措施。

同時，中央委員會全會指出，雖然在建設蘇維埃農場及集體農莊方面獲得了某些初步成績，但這還是非常不夠的。因此除加強建設新的蘇維埃農場與改進舊有的蘇維埃農場外，必須更進一步從數量上與質量上提高集體農莊。中央委員會全會同意控制數字中所規定的對農業底社會主義部分加強扶助的措施。

工業與城市的猛烈發展，向農業提出了許多要求，但這些要求，只有在發展農業，提高農業生產量，擴大並加速城鄉商品流轉，恢復與增加農業對外輸出的條件下，才能予以滿足。

為幫助提高個體中、貧農經濟並為其生產力的發展開闢廣闊的園地，黨與蘇維埃政府應通過城鄉生產結合形式（加強重工業、農業機器製造業、化學工業等的生產）逐漸加強對農業的幫助，改造農業的技術基礎，通過農民的生產合作運動，促進集體農莊的鞏固，加強蘇維埃農場對個體農民經濟文化、農作技術的幫助，運用新的幫助農業的模範，如定購合同等。

八、各種農作技術與飼養技術固極重要，但同時必須強調指出，適當的技術措施，只有在與農民本身經濟利益相結合的條件下，才能產生實際的效果。因此盡量給基本農民群眾以經濟利益的刺激，乃是我們目前的中心任務之一。在這裡，目前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一）對農村的商品供應問題；（二）鞏固幣制問題；（三）農業稅問題；（四）革命的法律制度與改善對農民經濟的幫助形式問題。

九、自正確的國家工業化政策觀點看來，必須年甚一年地改善對農村生產資料與個人必需品的供給。只有大量增產能夠投入農村市場的商品，才能保證糧食與原料的相應的供給。產品生產的相對不足，不能滿足迅速增長的購買力需要（雖然工業品產量年有增加），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進行巨額投

資而產生的（如工廠、住宅的建築、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消耗，但它們尚不能為市場生產商品），但這種生產不足的情況，不能而且也不應超過一定限度，因為這樣有使工業化事業遭受失敗的危險。因此，我們的方針，是在減輕，而最後是消滅商品飢荒。

（中略）

十二、因此，便提出了農業稅問題。去年經驗證明，這一影響農業的重要槓桿，必須在維持現行原則的條件下加以修正，使其不致促使農業分散，招致農村生產力有某種程度的下降。為此，必須在實行農業累進稅條件下，根據下列原則修改農業稅：（一）嚴禁廣泛採取個別課稅法，但對部分最富裕的富農，特別是對凡用普通徵稅法不能充分節制其收入的部分最富裕的富農（但不得超過所有農戶的百分之三），方可根據法律，採取個別課稅法；（二）必須不僅統計各農戶的收入總額，而且要統計其家庭人口；（三）必須固定稅額，嚴懲徵稅中的過火行為；（四）改進農業稅收方法，而使其更加因地制宜。全會同意政府決定的，對中農階層適當減輕統一農業稅的措施。

（下略）

（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聯共（布）關於經濟建設的決議」第二輯，第五八——五九、六〇——六六、六七頁。）

斯大林：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摘錄）

一九二九年四月在聯共（布）中央全會上的演說

（上略）

布哈林提議使市場「常態化」，按各區來「調度」糧食採辦價格，即增高糧食價格。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他不滿意蘇維埃市場條件，而想漸漸消滅國家在市場上的調節作用，主張向那從右邊來破壞新經濟政策的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讓步。

暫時假定我們聽從了布哈林底勸告吧。由此會得出什麼結果呢？譬如說，我們在秋季，在糧食採辦工作初期提高了糧食價格。可是，因為在市場上總有些人，各種投機商人和屯賣商人，能够多拿幾倍的價錢來收買糧食，而我們又不能同投機商人去競爭，因為他們總共不過收買一千萬左右普特的糧食，而我們却需要收買幾萬萬普特的糧食，於是糧食所有者橫直還是會把糧食扣着不賣，等候繼續漲價。到春季的時候，當國家正開始最需要大批糧食的時候，我們又得增加糧食價格。而在春季來抬高糧食價格，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害死貧農和農村窮苦階層，他們在春季不得不買進糧食，一部分作為種子，一部分供給食用，而他們所買進的糧食，也就是他們在去年秋季賤價賣出去的那些糧食。做完這些手續以後，我們是不是能得到什麼重大結果，就是說得到充分的糧食呢？一定是不能得到的，因為總有些投機商人和屯賣商人，又能比我們多拿幾倍的價錢來收買這些糧食的。於是我們又得準備更提高糧食價格，自費氣力來與投機商人以及屯賣商人競爭。

既然如此，既然我們走上了提高糧食價格的道路，於是我們就會要繼續滾下去，而且始終沒有担保

可以得到充分的糧食。

可是，事情並不就此完結。第一，我們既然提高了糧食採辦價格，就會也要提高原料價格，藉以維持各種農產品價格底相當比例。第二，我們既然提高了糧食採辦價格，就會在城市裡也不能維持低廉糧食價格，於是我們也會要提高糧食價格。我們不能而且不應當得罪工人，於是就會要加快速度來提高工資。可是，這樣一來，我們就不能不提高工業品價格，否則便會使財源違反若工業化事業利益，從城市裡流到鄉村中去。結果，我們就會不是根據降低的價格或至少是穩定的價格來調勻工業品與農產品底價格，而必須根據糧食和工業品一同高漲的價格來調勻這些價格。換言之，我們就會要採取使工業品和農產品漲價底方針。不難瞭解：這樣「調度」價格，不能不弄到完全取消蘇維埃價格政策，弄到取消國家在市場上的調節作用，弄到完全放縱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這將有益於誰呢？這將僅僅有益於城鄉富裕階層，因為高價的工業品和農產品一定是工人階級、貧農和農村窮苦階層所買不起的東西。佔便宜的是富農、富裕分子、耐潑曼及其他富足階層。

(中略)

個體貧農中農經濟在為工業供給糧食和原料方面，現在起着主要作用，而且在最近將來也還會起着主要作用。正因為如此，所以必須幫助個體的貧農中農經濟。但同時這又是說，單靠個體農民經濟已經不夠了。我們糧食採辦工作方面的困難，就是一個證明。因此，除發展個體的貧農中農經濟而外，同時必須盡力發展集體農業形式和蘇維埃農莊。因此，必須普遍實行定貨合同制，成立農業機器站，盡量發展合作社，作為個體貧農中農經濟過渡到集體公共農莊的橋樑，使農民易於把他們的細小個體經濟轉到集體勞動軌道上來。沒有這些條件，便不能真正發展農業。沒有這些條件，便不能解決穀物問題。沒有這條件，便不能使貧農階層擺脫貧窮困苦的地位。

最後，這就是說必須努力發展我國工業，因為它是農業生產改造事業所仰給的基本源泉，必須發展

冶金工業、化學工業和機器製造業，必須建設拖拉機工廠和農業機器工廠等等。顯然用不着證明：不經過普遍定貨合同制來促使基本農民群眾進到集體經營形式，不用大批拖拉機和農業機器等等來供給農業，便不能發展集體農莊，便不能發展農業機器站。可是，不加緊速度發展我國工業，便不能用機器和拖拉機供給農村。因此，加快速度發展我國工業，就是按集體原則改造農業的關鍵。

城鄉結合新形式底意思和意義，就是如此。

布哈林集團在口頭上不得不承認城鄉結合新形式是必要的。但這不過是口頭上承認而已，其目的是要在口頭上承認城鄉結合新形式的幌子下偷運一種完全相反的東西。其實，布哈林是反對城鄉結合新形式的。布哈林所持的出發點，並不是要加快速度發展工業，作為農業生產改造事業底槓桿，而是要發展個體農民經濟。在布哈林看來，最主要的就是使市場「常態化」，容許在市場上自由玩弄農產品價格，其實就是容許完全自由貿易。於是他就對集體農莊採取不信任的態度，而他這種不信任的態度，是他在中央七月全會上的演說內以及他在中央七月全會以前所起草的提綱內都表示出來的。於是他就對我們採辦糧食時所實行的一切用以對付富農的非常辦法，採取否定的態度。大家知道，布哈林躲避非常辦法，好像那鬼躲避神香一樣。大家知道，布哈林至今還不能瞭解，富農在現今條件下是不會自願地自流式地交出充分數量的糧食的。這在現時已由我們糧食採辦工作兩年來的經驗所證明了。

那末，假如商品糧食畢竟還是不夠，又當怎樣辦呢？布哈林回答道：不要用非常辦法驚動富農；從外國輸入糧食就是了。他不久以前還提議要從外國輸入五千萬普特左右的糧食，就是說輸入約值一萬萬金盧布的糧食。如果金幣需要用來輸入工業裝置品，那又怎樣辦呢？布哈林回答道：必優先從外國輸入糧食；這顯然是說要把輸入工業裝置品的事情擱置到後面去。

照他這樣說來，解決穀物問題和改造農業的基礎，並不是加快速度發展工業，而是要用自由市場和

在自由市場上自由玩弄價格的手段來發展個體農民經濟，包括富農經濟在內。

於是我們就看見兩個彼此不同的經濟政策計劃。

黨底計劃是：

(1) 我們改造工業。

(2) 我們開始認真改造農業。

(3) 爲此就須擴展建設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廣泛採用定貨合同制和設立農業機器站，作爲建立工業與農業間的生產結合的手段。

(4) 爲克服現時糧食採購工作方面的困難的起見，儘可採取一種倚靠中農貧農群眾共同贊助的臨時非常辦法，作爲一種打破富農反抗和儘量取得他們所有剩餘糧食的手段，我們一定要取得這些剩餘糧食，才可不必從外國輸入糧食，而能把金幣保存起來發展工業。

(5) 個體貧農中農經濟在爲國家供給糧食和原料方面，現時起着主要作用，而且將來也還會起着主要作用；可是現在單靠它來供給已經不行了，因此，除發展個體貧農中農經濟而外，同時還須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廣泛採用定貨合同制，加緊發展農業機器站，以便易於把資本主義分子從農業中排擠出去，漸漸把個體農莊轉移到巨大集體農莊軌道上去，轉移到集體勞動軌道上去。

(6) 可是，爲要做到這一切，首先就必須加緊發展工業，發展五金工業，化學工業，機器製造業，拖拉機工廠，農業機器工廠等等。否則無法解決穀物問題，無法改造農業。

結論：加快速度發展我國工業，就是農業改造事業底關鍵。

布哈林底計劃是：

(1) 使市場「常態化」，容許在市場上自由玩弄價格和提高糧食價格，那怕還會使工業品、原料

和糧食那昂貴起來。

(2) 盡力發展個體農民經濟，同時要相當降低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發展速度（布哈林在七月間提出的提綱，布哈林在七月全會上的演說。）

(3) 要自流式地採辦糧食，無論何時何地都不可採取，甚至不可局部採取非常辦法對付富農，即使這些辦法得到中農貧農群眾底贊助，也是不可採取的。

(4) 在糧食繳納不夠時，就從國外輸入約值一萬萬盧布的糧食。

(5) 在金幣不夠同時開支糧食輸入和工業裝置品輸入時，就必須減少裝置品輸入額，也就是說降低我國工業發展速度，否則我國農業就會「踏步不進」，也許還會「筆直下降」。

結論：發展個體農民經濟，就是農業改造事業底關鍵。

同志們，事情真相就是如此。

布哈林底計劃是降低工業發展速度和破壞城鄉結合新形式的計劃。

我們的意見分歧，就是如此。

(中略)

1、糧食採辦工作問題

關於我們的糧食困難問題，有人在這裡說了一大堆荒唐話。可是，他們却把我們糧食方面暫時性的困難中的主要點忽略過去了。他們首先忘記了我們今年所收穫的黑麥和小麥——我說的是收成總額——約比去年少五六萬普特這一事實。這能不反映到我們糧食採辦工作麼？當然不能不反映到。也許這應歸咎於中央底政策吧？不，這是與中央底政策無干的。這是因為烏克蘭草原一帶的收成不好（大冰凍和旱災），以及北高加索、中央黑土省和西北區有局部歉收的緣故。主要也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去年

到四月一日時，我們在烏克蘭已採辦了一萬萬普特糧食（黑麥和小麥），而今年却只採辦了二千六百萬至二千七百萬普特。同樣也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小麥與黑麥採辦額在中央黑土省幾乎降至八倍，在北高加索幾乎降至四倍。今年在東部某些區域內，糧食採辦額幾乎增至兩倍。可是，這當然不能補償，而且也沒有補償我們在烏克蘭、北高加索以及中央黑土省糧食採辦不足的情形。不要忘記，在常態收成下，在烏克蘭和北高加索所採辦的糧食，等於全蘇聯所採辦的全額糧食一半以上，有時甚至等於三分之二。李可夫竟把這個情況忽略過去了，真是奇怪。

最後，還有第二個情況，是我們糧食採辦工作方面遇到暫時困難的主要原因。我所指的，是富農和農村豐裕分子對蘇維埃政權糧食採辦政策的反抗。李可夫迴避了這個情況。可是，迴避這點，就是迴避糧食採辦工作方面的主要點。最近兩年來糧食採辦工作的經驗，是說明什麼呢？它是說明，握有大部分剩餘糧食並在糧食市場上起指揮作用的農村殷實階層，不願意把我們所需要的糧食按蘇維埃政權規定的價格自動賣給我們。我們每年大約需要五萬萬普特糧食來供給城市和工業地點，供給紅軍和技術原料作物區域。用自流式的辦法，我們大約能採辦三萬萬至三萬五千萬普特。其餘一萬五千萬普特，却不得不用有組織逼迫富農和農村殷實階層的手段來取得。最近兩年來糧食採辦工作的經驗告訴我們的，就是這一點。

在最近兩年內究竟發生了什麼變遷，這種變遷究竟是從何而來，為什麼自流辦法從前有濟於事，而現在却已經不夠了呢？變遷在於富農和殷實分子在這幾年內已長大起來，幾次豐年對於他們不是白白地過去了的，他們在經濟方面已鞏固起來，他們已積蓄起某些資本，因此他們現在已能在市場上玩弄手腕，把自己的剩餘糧食屯積起來等待高價，而拿其他農產品來週轉週轉。糧食不是平常商品。糧食與棉花不同，棉花是不能吃的，是不能見人就賣出的。在我們現今條件下，糧食與棉花不同處，就在於糧食

是大家都買，沒有它便不能生存的一種商品。富農注意到了這一點，所以把糧食屯積起來，使一般糧食所有人都沾染這種風氣。富農知道糧食是寶中之寶。富農知道剩餘糧食不僅是他們發財的手段，而且是可以用來盤剝貧農的手段。現在富農手裡的剩餘糧食，是在經濟上政治上加強富農分子勢力的手段，所以我們從富農方面取得這些剩餘糧食，就不僅便利着城市和紅軍底糧食供給，而且根本打破這種在經濟上政治上加強富農勢力的手段。

爲要取得這些剩餘糧食，就要怎樣辦呢？首先就要消滅那種危險有害的自流心理。就要組織糧食採辦工作。就要動員貧農中農群衆去反對富農，並組織他們共同擁護蘇維埃政權加強糧食採辦工作的辦法。在烏拉爾和西伯利亞一帶根據農民大會自己擬定繳納額的原則實行的糧食採辦方法，其意義也就在它使得有可能來動員農村勞動階層去反對富農以加緊糧食採辦工作，經驗已經表明這個方法能給予我們以良好的結果。經驗已經表明這些良好結果是我們按以下兩方面得到的：第一，我們徵取農村富裕階層底剩餘糧食，這樣來便利我國供給事業；第二，我們在這事情上動員富農中農群衆去反對富農，並在政治上教育這些群衆，把這些群衆組織爲我們在農村中的強有力的數千百萬人的政治軍隊。有些同志竟沒有注意到這第二個情況。而這個情況却正是烏拉爾和西伯利亞糧食採辦方法底重要結果之一，甚至可說是最重要的結果。固然，這個方法有時候是與反對富農的非常辦法配合着採用的，這就引起布哈林和李可夫底可笑的叫喊。但這究竟有什麼壞處呢？爲什麼不能在相當時候，在一定條件下採用非常辦法去反對我們的階級敵人，反對富農呢？爲什麼在城市內可以成十成百地逮捕投機商人，將他們放逐到土魯汗斯克邊區去，而對於那些企圖攔住蘇維埃政權咽喉和盤剝貧農的富農，獨不可按公共強制手續，按貧農中農出賣糧食給我們採辦機關的價格去取得他們的剩餘糧食呢？這是從那裡得出來的結論呢？難道我們黨曾經說它在原則上反對採用非常辦法對付富農麼？李可夫和布哈林顯然在原則上反對採取任何非常辦

法對付富農的。但這是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政策，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政策哩。你們不能不知道。列寧在施行新經濟政策以後，甚至還主張過——當然是在一定條件下——恢復貧農委員會政策。而什麼是局部採取非常辦法對付富農呢？這與貧農委員會政策比較，甚至於還算不得滄海一粟哩。

他們，布哈林集團中的人，希望說服階級敵人，讓他自願放棄他自己的利益而把自己的剩餘糧食自願交給我們。他們希望那些已經長大，已有可能拿其他農產品來玩弄手腕，而隱藏自己所有剩餘糧食的富農，會按照我們的糧食採辦價格，自願把自己的剩餘糧食交給我們。他們不是發了瘋麼？這難道不是明白證明他們不懂得階級鬥爭底的機密，不知道什麼是階級麼？而他們是不是知道在爲加強糧食採辦工作而召集的鄉民大會上，富農怎樣譏笑我們的工作人員和蘇維埃政權呢？他們是不是知道這樣的事實，就是例如在卡查赫斯坦，我們的鼓動員費了兩點鐘工夫去勸說糧食所有人把糧食交出來供給國家的時候，有一個富農口裡啣着煙斗，起來回答這位鼓動員說：「喂，小夥子，你跳個舞來看看，我就給你兩個普特的糧食。」

（座上有人喊道：「真是混蛋！」）

斯大林說：你們試試說服這樣的人吧。是呀，同志們，階級到底是階級呵。誰也逃不出這個真理。烏拉爾和西伯利亞方法底好處，本來也就在於它使得更有可能來推動貧農中農階層去反對富農，使得更有可能來打破富農底反抗，強迫他們把剩餘糧食交給蘇維埃政權機關。

（下略）

（一九四九年解放社版「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下冊，第二八二——二八三、二八七——二九二、三〇三——三〇七頁。）

斯大林：大轉變的一年（摘錄）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

（上略）

三 在農業建設方面

最後：就要說到黨在過去這一年來的第三個成績，這個成績是與上面兩個成績有密切聯系的。這裡所說的就是我國農業發展中的根本轉變：由規模狹小的落後的個體農業，進到規模巨大的先進的集體農業，進到共耕制，進到農業機器站，進到基於新技術的農業勞動組合和集體農莊，以及各用數百架拖拉機和康拜因機武裝起來的巨大蘇維埃農莊。

黨在這裡所獲得的成績，就是我們已使許多區裡的基本農民群眾由舊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轉上了新的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舊的發展道路僅僅有利於少數富農資本家，而極大多數的農民却陷於破產和被迫忍受貧困痛苦；新的發展道路是要把富農資本家排擠出去，而把中農貧農從新武裝起來，用新工具把他們武裝起來，用拖拉機和農業機器把他們武裝起來，使其能夠擺脫貧困的境遇和富農的盤剝而走上共同集體耕種的廣闊道路。

黨底成績就是我們在農民中間造成了這個根本轉變，並引導廣大的貧農中農群眾向前邁進，那怕有許多不可思議的困難，那怕有從富農和神父起至庸人和右傾機會主義者止的一切黑暗勢力拚命的反抗。讓我們舉幾個數目字來說吧。

在一九二八年，蘇維埃農莊底播種面積是等於一百四十二萬五千公頃，其商品穀物產量是等於六百餘萬公擔（即三千六百餘萬普特），而集體農莊底播種面積是等於一百三十九萬公頃，其商品穀物產量

約等於三百五十萬公擔（即二千餘萬普特）。

在一九二九年間，蘇維埃農場底播種面積是等於一百八十一萬六千公頃，其商品穀物產量約等於八百萬公擔（約四千七百萬普特），而集體農莊底播種面積是等於四百二十六萬二千公頃，其商品穀物產量是等於一千三百萬公擔（約七千八百萬普特）。

在當前的一九三〇年中，按計劃規定，蘇維埃農場底播種面積一定會等於三百二十八萬公頃，其商品穀物產量等於一千八百萬公擔（約一萬一千萬普特），而集體農莊底播種面積必定會等於一千五百萬公頃，其商品穀物產量應等於四千九百萬公擔左右（約三萬萬普特）。

換句話說，在當前的一九三〇年中，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莊底商品穀物產量應等於四萬萬餘普特，即超過整個農業商品穀物總產量（即運出農村以外的穀物總量）百分之五十。

（中略）

右傾機會主義者（布哈林集團）底斷語已經破產而打得粉碎了，他們認定：（中略）（4）發展集體農莊和進攻農村資本主義分子就會使國家得不到糧食。

所以這些資產階級自由派的陳腐論調，都遭破產而被打得粉碎了。

（中略）

第四，現在就是瞎子也看得見：如果我們沒有進攻農村資本主義分子，如果我們沒有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場運動，那我們現在就不會有今年在糧食採辦工作方面所得到的這種有決定意義的成功，也不會有現在國家手裡所有的幾千萬普特不可侵犯的穀物儲存。

並且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因為有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場運動的發展，我們正在完全走出缺乏糧食的恐慌，或者說已經走出了這種恐慌。如果我們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場愈益迅速發展下去，那末再過兩

三年以後，我們的國家就一定會成爲最富有糧食的國家之一，甚至也許會成爲世界上最富有糧食的國家。

(下略)

(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九——十、一五、一六頁。)

關於一九二九——三〇年國民經濟控制數字（摘錄）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全會

通過的決議

（上略）

國民經濟各主導部門這種超過五年計劃原定任務的增長，加上產業無產階級數量的增加（增加了百分之七·八），無產階級陣地的鞏固，政治積極性的提高等條件，遂使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事業起了根本的變化，這表現在由於貧、中農群眾積極參加農村社會主義改造事業，集體農莊運動地發展起來。結果，農業的集體化速度大大超過了五年計劃的預計。如以一九二七——二八年與一九二八——二九年相較，參加集體農莊的農戶總數由四十四萬五千戶增至一百零四萬戶（五年計劃原定增至五十六萬四千戶）。集體農莊底播種面積，由一百四十萬公頃增加到四百三十萬公頃，或者說增加了百分之二〇·六。七（五年計劃原定增加百分之二三·四），總產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四〇·五，商品產量增加了百分之二七八·三。集體農莊商品產量在農業總商品產量中所佔比重，由百分之二·四增加到百分之四·九，其中商品穀物的比重由百分之四·五增加到百分之二二·九。

這種空前未有的超過最高計劃的集體化速度，證明根據實際經驗確信農業集體經營方式優越的原有中農大衆，跟隨着農村貧農加入了集體化運動。

在貧、中農大衆參加集體農莊方面所發生的這種決定性轉變，是工人階級和黨在農村執行正確政策的直接結果，是在工人與貧、中農聯盟中加強工人階級領導作用、社會主義工業化猛烈增長與加強城鄉生產結合形式的直接結果，這種決定性轉變，意味着我們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已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與高速度的農業集體化同時，在建立蘇維埃農場與機器拖拉機站方面也獲得了巨大的成績。在一九二九年春，蘇維埃農場的播種面積已增加百分之二七·五（按計劃原規定增加百分之二六·三），穀物的總產量增加了百分之三四·七。

在一九二八——二九年，農業社會化部分的總產量共達六億一千二百八十萬盧布（一九二七——二八年則為二億八千三百二十萬盧布），商品產量達二億六千三百九十萬盧布（一九二七——二八年則為一億三千四百五十萬盧布）。其在穀物總產量中所佔的比重，在一年之內由百分之二·五增至百分之五·八（按計劃原定增至百分之四·九），其在整個商品穀物中所佔比重由百分之二·二增至百分之二·一。

由於農業社會化部分及鄉村貧、中農農戶播種面積的擴大，超過了富農與富裕農戶所縮小的播種面積，遂保證播種面積擴大了百分之五（雖較原定計劃任務尚較少）。

播種面積、農業總產量及商品糧產量的增加，定購合同的加多，農業社會化部分在商品糧產量中所佔比重的增高，所有黨的、蘇維埃的及合作社機關在糧食採購工作方面的緊張努力，為徹底完成計劃及克服富農的抵抗與怠工而進行鬥爭的貧、中農組織的加強，對糧食投機及富農囤積餘糧行為鎮壓的加強，以及對農村工業品供應狀況的改善，所有這些，都保證了糧食採購工作的順利進行，使之大大超過了過去數年來糧食採購的成績，並使我們有可能在今年建立起將近一億普特的糧食儲備。

（中略）

但與此同時，資本主義分子，即農村的富農，城市的耐潑曼，生產中的破壞分子的抵抗，也加強並且趨尖銳化了。

前一經濟年度的這些總結，充分說明了黨的一切政策的正確性，並徹底證明了右傾分子（布哈林集

團)立場的完全破產，這種立場無非是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之壓力的反映，無非是在尖銳的階級鬥爭面前的張惶失措，無非是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困難面前的投降。

右傾分子武斷地說農業「衰退」了。實際上是貧、中農經濟進一步提高了，播種面積普遍擴大了，機器的供給增加了，農業的物質、技術水平及農作技術水平提高了。

右傾分子武斷地說什麼貧、中農與工人階級「分裂」了。但實際上，工人階級與農民之間的聯盟更加鞏固了，無產階級在這一聯盟中的領導作用加強了，這表現在農業集體化的蓬勃發展及蘇維埃農場的建設上。

右傾分子預言，飢餓與糧食進口是不可避免的。在實際上，我們採購了這樣多的糧食，使國內生產的糧食足以保證全國的需要，並保證我們在貿易出超及積累外匯的條件下組織了數千萬普特的糧食儲備。

右傾分子硬說，計劃所規定的國家工業化速度是達不到的。但實際上我們不僅完成而且大大超額完成了計劃任務。

右傾分子說，計劃所規定的集體化速度及蘇維埃農場建設速度是不可能實現的，說不具備必要的物質技術前提，貧、中農不願意採用農業集體經營形式。但實際上，農業集體化是如此蓬勃的發展着，貧、中農戶是如此渴望農業集體經營形式，使集體農莊運動在實際上已經開始提高到以區為單位的全盤集體化的程度。這就是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新階段、新時代。

右傾分子，由於不相信工人階級的創造力，而要求向「薄弱的環節」看齊，消極地遷就困難。但實際上，工人階級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地克服了困難，保證了正向社會主義發展的生產力得到了更進一步的超計劃的發展。

右傾分子武斷地說，經濟總危機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說，生產與再生產的正常過程要遭受破壞。但實際上生產增長得如此之多，速度上升得如此之快，以致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因此，這就使我們有可能把五年計劃的最高方案在實際上變成爲五年計劃的最低方案。

只有堅決粉碎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們客觀上乃是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及富農、資本主義集團的經濟、政治利益的傳聲筒）使黨離開我國發展總路線的企圖，工人階級與黨才能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大踏步地前進。

與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取得這些成績的同時，不可避免地還有某些困難，而且這些困難又會因資本主義分子的抵抗而益形尖銳。因此黨的經濟政策的最重要任務之一，仍是克服農業、特別是穀物生產及畜牧部門發展速度的過分落後現象。這一任務獲得火速解決，即爲進一步加速集體化與蘇維埃建設，爲進一步改善與鞏固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場，最後爲加強農業底社會主義改造的關鍵——即工業的發展開拓了道路。

在本經濟年度，應特別集中注意於勝利進行春耕運動。

（中略）

一九二九——三〇年，應是農業社會化事業繼續大踏步向前發展的一年。蘇維埃農場的播種面積應自一九二八——二九年的一百八十萬公頃增加到三百三十萬公頃；集體農莊播種面積應自四百三十萬公頃增至一千五百萬公頃。

在一九二九——三〇年，應供給農業四萬台拖拉機（每架拖拉機以十四馬力計算），用這些拖拉機組織一百零二個機器拖拉機站，使其能耕種一百五十萬到二百萬公頃的土地，並加強集體農莊及蘇維埃農場的拖拉機庫。

只要完成農業社會化底這一計劃，我們就能移自社會化農業部分得到一九三〇年收穫量中在農村以外流通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商品穀物（按五年計劃原規定一九三三年才能得到商品穀物的百分四三），如再繼續擴大定購合同的範圍，則必將克服我國糧食困難，並基本上解決我國糧食問題。

（中略）

中央委員會全會特別強調一九二九——三〇年保證提高實際工資百分之二這一任務的重要性，為此，需要繼續貫徹降低工業品價格的方針，並要求一切蘇維埃的、職工會的、合作社的及黨的機關在改進工業地區供給組織、合理使用與分配食品儲備、改良食品的保管與加工，以便更完善地組織肉類與奶類生產方面，作更大的努力。由於糧食的極度缺乏，使這一任務成爲迫不及待、必須廣泛動員工人階級及工人階級的一切組織底力量予以解決的問題。

中央委員會肯定指出，必須於指定日期——即正月以前，完成全部糧食採購計劃，認爲須將糧食採購計劃正確傳達至鄉村與富農農戶，並採取最堅決的措施，反對富農對完成糧食採購計劃所實行的怠工與抵抗。

（下略）

（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聯共（布）關於經濟建設問題的決議」第二輯第八五——八七、八八——九〇、九三——九四、九六——九七頁。）

斯大林：論蘇聯土地政策底幾個問題（摘錄）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上略）

富農在一九二七年生產了多少呢？不是十九萬萬普特而是六萬萬普特穀物。可見，自十月革命以後，富農底力量已削弱了三分之二多。你們當然懂得，這件事實是不能不改善貧農和中農狀況的。

貧農中農在一九二七年生產多少呢？不是二十五萬萬普特而是四十萬萬普特。可見，貧農和中農在十月革命以後所生產的穀物已經是比革命前多十五萬萬普特。

（中略）

的確，富農在一九二七年所生產的穀物共達六萬萬普特以上，其中拿到農村外面出賣的約有一萬萬三千萬普特。這是一個頗為嚴重而不可忽視的力量。而我們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當時生產了多少呢？約有八千萬普特，其中運往市場的（即商品穀物）約有三千五百萬普特。請你們自己去判斷一下，我們當時是否能移用我們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底生產和商品穀物去代替富農底生產和商品穀物呢？顯然是不能夠的。

在這種條件下向富農舉行堅決進攻，就會是意味着什麼呢？就會是意味着一定遭受失敗，一定加強富農陣地而得不到穀物。

正因爲如此，所以不管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反對派如何從事冒險主義的空談，我們當時不能夠而且也不應當向富農舉行決定性的進攻。

現在呢？現在的情形怎樣呢？現在我們已有充分的物質基礎來打擊富農，來打破富農反抗，消滅富農階級，並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生產來代替富農生產了。大家知道，在一九二九年，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底穀物產量總共不下四萬萬普特（比一九二七年富農經濟底總產量少二萬萬普特）。其次，大家知道，在一九二九年，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底商品穀物共有一萬萬三千萬普特以上（即是比一九二七年富農底商品穀物多些）。最後，大家也知道，在一九三〇年，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底穀物總產量將不下於九萬萬普特（即是比一九二七年富農底總產量多些），其中商品穀物將不下於四萬萬普特（即是比一九二七年富農底商品穀物多得不可比擬）。

同志們，我國現在的情形就是如此。

這就是在我國經濟中所發生的變動。

由此可見，現在我們已具備有物質基礎來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生產代替富農生產了。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現在向富農舉行的決定性的進攻已有不容置疑的成功。

你們看，如果是說到真正的和決定性的進攻而不限於空洞的反富農清談，那就須這樣進攻富農。

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近來已從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政策過渡到了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

（下略）

（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第十九、三〇——三一頁。）

斯大林：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的

政治報告與結論（摘錄）

一九三〇年六月廿一日

（上略）

在農業中發展了新的力量，就是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倘若兩年前我們有過五穀生產的危機，在收買糧食方面主要的全靠個人經濟，那末，到了現在，重心已經移到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上去了，而五穀的危機大體上可以說是解決了。農民中間的基本群眾，徹底的轉到集體農場方面來了。富農的反抗已被打退。蘇聯的國內地位更其堅固了。

（中略）

一，倘若把一九一三年五穀田的面積當做一百，那末，每年穀田變動的情形如下：一九二六——二七年等於百分之九十六點九；一九二七——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九十四點七；一九二八——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九十八點二；到今年（一九二九——三〇年），根據所有的材料，將要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一百零五點一。

你們看到，一九二七——二八年的五穀田是減少了。這種減少，並不是像右傾機會主義營壘中的庸人關於這點的胡喊那樣，說是因為五穀經濟退化了；這乃是因為七百七十萬海克脫秋麥田（蘇聯秋麥田的百分之二十）凍死的緣故。

倘若再把一九一三年五穀的總出產當做一百，那末，所得到的情形如下：一九二七年等於百分之九

十一點九；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九十點八；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九十四點四；一九三〇年，根據一切的統計，將要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一十。

這裡也應該注意一九二八年五穀總出產的減少，這是因為烏克蘭和北高加索底秋麥凍死的緣故。

至於說到五穀總出產中的商品部分（鄉村外的流通），那末，我們見到更有意思的情形。假定那一九一三年五穀總出產的商品部分當做一百，那末，結果就是：一九二七年的商品生產等於百分之三十七；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三十六點八；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五十八；而一九三〇年，根據一切的統計，將要等於戰前百分之七十三以上。

因此，結果就是耕田面積和五穀總生產方面，只到一九三〇年才達到戰前的程度，並稍稍的超過了一些。

再就是，在五穀的商品生產方面，我們離戰前程度還遠得很，今年還要差百分之二十五。我們糧食缺乏的根源就是在這裡，這在一九二八年尤其緊張。

五穀問題的基礎也就在這裡。

（中略）

因此，在鄉村經濟上在我們面前擺着下列的問題：

（一）鞏固原料植物的地位底問題，其方法就是保證在那些區域有足量的賤價的糧食生產品。

（二）提高牧畜業和解決肉類問題，其方法就是保證那些區內有充分的五穀產品和草料。

（三）徹底解決五穀問題，這是現在鄉村經濟的主要問題。

這樣看來，五穀問題是鄉村經濟中的基本問題，是解決一切其他問題的鑰匙。

因此，解決五穀問題，是鄉村經濟的各種問題中的第一種任務。

但是解決五穀問題和引導鄉村經濟走上長足發展的道上——這就是根據消滅鄉村經濟的落後，供給它拖拉機和農業機器，供給他們科學工作人員，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商品出產量。沒有這些條件，就用不着夢想解決五穀問題。

(中略)

因此就發生一種任務，設立蘇維埃農場，聯合小農經濟成爲大的集體農場，這是解決一般鄉村經濟問題尤其是五穀問題唯一的方法。

自從第十五次大會以後，尤其是在一九二八年初發現了糧食的嚴重困難之後，黨就在日常實際工作中跑上了這條道路。

應該指出，我們黨在第十五次大會的時候，就把這種根本的任務提在面前當作實際上的任務，那時候我們還沒有遇到糧食的嚴重困難。

(中略)

至於說到他們五穀的總生產和商品量，那末，我們見到下列的情形。一九二七年集體農場出產四百九十萬担，其中二百萬担是商品的；一九二八年出產八百四十萬担，其中三百六十萬担是商品的；一九二九年出產二千九百一十萬担，其中商品是一千二百七十萬担；一九三〇年，根據所有的統計，將出產二萬萬五千六百萬担（十五萬萬五千萬普特），其中商品將有八千二百萬担（五萬萬普特以上。）

應該承認，一般地說來，算是發展得十分快的工業，其中沒有一個部門發展的速度有過集體農場建設那樣快。

這些數目字表明什麼呢？

這首先表明，集體農場中五穀的總生產，在三年內增加到五十倍以上，而商品量增加了四十倍以

上。

第二，這是表明，我們今年能夠向集體農場取得全國五穀商品生產的一半以上。

(中略)

照五年計劃，我們到五年計劃底，集體農場五穀的總生產應該有一萬萬九千零五十萬担。但是實際上，今年集體農場五穀的總生產，已經有二萬萬五千六百萬担了。

這就是說，我們在兩年之內已經超過了集體農場五穀生產的五年計劃百分之三十以上。五年計劃兩年完成。(鼓掌聲)

(中略)

現在還是這個問題：這種加速運動，這種加緊我們發展的速度的是不是已經到了，我們選擇時期，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開始向各方面作堅決的進攻，這是不是正確呢？

對於這個問題，黨已經給了明確的答覆。

是的，這樣的時期已經到了。

是的，黨所選擇的開始向各方面進攻的時期是正確的。

證明這一點，有工人階級積極性的繼續提高，在幾千百萬勞動群眾中間，黨的威信空前的增加。

證明這一點的，有貧農中農群眾積極性的提高，這些群眾的根本轉向集體農場建設。

證明這點的，就是我們現在不僅能夠用蘇維埃農場與集體農場來代替富農生產，而且能夠超過它幾

倍。

證明這點的，就是我們已經能夠大體上解決了五穀問題，積聚了一定糧食儲蓄，把穀類商品生產的重心，從個人生產方面轉到了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方面。

這些證據，證明黨正確的選定了向各方面進攻和指出消滅富農階級的口號的時機。

倘若我們聽信了布哈林右傾機會主義的話，倘若放棄了進攻，顛覆了工業發展的速度，阻礙了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的發展，依靠個人的鄉村經濟，那末結果是怎樣呢？

我們就一定破壞了我們的工業，葬送了社會主義改造鄉村經濟的事業，落得沒有糧食，並替富農肅清了道路。我們大概就已經坐在破鍋的旁邊了。

倘若我們聽信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派「左傾」機會主義者的話，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年開始了進攻的火線，那時候，我們還沒有一點兒的可能去用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來代替富農生產，那末，結果是怎樣呢？

我們大概已經在這方面破了產，表示了我們自己的軟弱，加強了富農和一般資本主義分子的地盤，把中農推入了富農的懷抱中，打翻了我們社會主義建設，落得沒有糧食。我們大概就已經坐在破鍋的旁邊了。

結果是一樣。

(下略)

(一九四九年解放社版「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下冊，第四〇六、四二一—四二三、四二六、四二七、四三六、四三七、四五五——四五六頁。)

斯大林：論農村中的工作（摘錄）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的演說

（上略）

去年，一九三二年間，我們的農村工作方面的主要缺點是什麼呢？

主要缺點就是我們去年的糧食採辦工作遇到了比前年，即比一九三一更大的困難。決不可說這是由於收成不好，因為去年收成不僅不比前年壞些，而且要比前年好些。誰也不能否認，一九三二年糧食收穫總量是比一九三一年多些，一九三一年因為蘇聯東北五個基本區域發生過旱災的結果，糧食數量大大減少了。固然，我們在一九三二年的收成，也因為庫班和特勒克以及烏克蘭幾個區域內氣候條件不好而受到了某些損失。可是，毫無疑義，去年所受的損失還沒有比一九三一年因東北各區發生旱災所遭受的損失一半那樣多。所以，我國一九三二年份的糧食收成是要比一九三一年多些。雖然如此，但我們在一九三二年糧食採辦工作方面還是遇到了比前年更大的困難。

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我們的工作為什麼有這個缺點呢？這種矛盾現象究應怎樣來解釋呢？

（一）這首先是因為我們的地方工作同志，我們的農村工作人員，沒有估計到農村中因宣佈集體農莊糧食貿易所形成的新環境。正因為他們沒有估計到這個新環境，所以他們也就沒有根據新環境來從新改變工作方式。在還沒有實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時，在沒有國家所定價格與市場價格這兩種糧食價格並存時，農村中的環境是一回事。自從宣佈集體農莊糧食貿易時起，農村中的環境就必定要急劇變了，因為宣佈集體農莊貿易就是承認較高於國家所定價格的市場糧食價格為合法價格，這種情況當然也就使農

民在向國家交納糧食時表現着一種吝嗇態度。農民當時這樣盤算着：「集體農莊糧食貿易已宣佈實行了，市場價格已經合法化了，於是我們把同等數量的糧食拿到市場上販賣，就能比交納給國家時得到較多的錢，所以我如果不是傻子，當然就要把糧食留一手，少交納一些給國家，多留一些來做集體農莊貿易，以便在出賣同等數量的糧食時可以多賺一些錢。」

這本來是最簡單而自然的邏輯！

可是不幸我們那些農村工作人員——至少是其中許多人——竟沒有懂得這個簡單而自然的事情。在這個新環境中，爲要不致破壞蘇維埃政權所定糧食採辦計劃，共產黨員本來應當在收穫開始時，即在一九三二年七月時，就竭力加緊和督促糧食採辦工作。這是客觀環境所要求的。而他們在事實上又是怎樣幹了呢？他們並沒有督促糧食採辦工作，反而督促集體農莊實行各種貯存，結果就使糧食交納者在履行其對國家所負義務時更加吝嗇起來。他們既沒有懂得新環境，於是他們就不來顧慮農民在交納糧食方面的吝嗇態度能障礙糧食採辦工作，反而來焦急農民會想不到要留下一些糧食，以便後來運到市場上去做集體農莊的貿易，焦急農民會不幸而把自己全部糧食統統交給國家倉庫。

換句話說：我們的農村共產黨員，至少是其中的多數人，只看見了集體農莊貿易底長處，只懂得，只領會了集體農莊貿易底好處，却完全沒有懂得，沒有領會集體農莊貿易底短處，——他們沒有懂得，如果他們這些共產黨員不是從收穫糧食最初幾天起就極力督促糧食採辦運動，那末集體農莊貿易底短處是會使國家大受其害的。

而且不僅集體農莊工作人員犯了這種錯誤。許多蘇維埃農場經理也犯了這種錯誤，他們竟罪犯式地把應該交納給國家的糧食留下來，却按較高價格賣給旁人，

人民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在其關於開展集體農莊貿易問題的著名決議①中，是不是顧到了實行集體

農莊糧食貿易所形成的這種新環境呢？是的，是顧到了的。在決議上直接說過：只有把糧食採辦計劃完全執行並把種子收齊以後，才可以開始實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在決議上直接說過：只有把糧食採辦工作和收藏種子的工作結束以後，大約是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五日的時候把這些條件都執行完結後，才可以開始實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人民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當時簡直是用它們的這個決議來警告我們的農村工作人員說：你們切不要因顧慮種種貯蓄和貯存而模糊自己的視線，你們切不要離開主要任務，而應當從糧食收穫最初幾天起就開展糧食採辦工作，並特別加緊這個工作，因為第一個任務是完成糧食採辦計劃，第二個任務是貯藏種子，你們只有把這些條件執行完結後，才可以開始實行和發展集體農莊糧食貿易。

也許中央政治局和人民委員會是錯在沒有充分強調這一點，沒有充分嚴厲預告我們農村工作人員關於集體農莊貿易所包含的危險。可是，它們毫無疑義是把這些危險情形預告了我們的農村工作人員，而且預告得十分明白。老實說，中央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對於我們各地方工作人員——不僅是區工作人員，而且有某些省工作人員——所具有的列寧主義鍛鍊和明達性，未免估量得有點過分了。

也許本來是不應該宣佈實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的吧？尤其是因為集體農莊糧食貿易不僅有其長處，而且還有一些短處，那末宣佈實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也許是一個錯誤吧？

不，這並不是一個錯誤。無論那一個革命辦法，如果它實行得不正確，都是不能担保沒有某些短處的。集體農莊糧食貿易也是如此。集體農莊貿易，無論對於農村或城市，無論對於工人階級或農民，都是同樣需要而且有利的。正因為它是有利的，所以必須加以施行。

人民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在施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時是根據什麼理由出發的呢？

首先，就是因為要擴大城鄉間商品流轉底基礎，改善供給工人們農產品和供給農民城市製造品的事

業。毫無疑義，單靠國營貿易和合作社貿易是做不到這一層的。除了這些商品流轉溝道而外，還要利用新的溝道，即集體農莊貿易。我們施行集體農莊貿易，也就造成了這些新的溝道。

其次，就是因為要經過集體農莊糧食貿易來給予集體農莊莊員一種附加收入的源泉，鞏固他們的經濟狀況。

最後，就是因為要實施行集體農莊貿易來更加推動農民去改善集體農莊工作，改善播種和收穫方面的工作。

你們知道，人民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所持的這些理由，是由近來集體農莊生活中的具體事實所完全證實了的。集體農莊更加鞏固了，退出集體農莊的現象停止了，個體農民加入集體農莊的意向加強了，集體農莊莊員力求按更嚴格選擇的原則來接受新莊員，——所有這一切以及其他許多類似的事實，都是顯然證明集體農莊貿易不僅沒有使集體農莊地位減弱，反而使集體農莊地位加強和鞏固起來了。

所以，我們農村工作方面的缺點，並不是由於施行了集體農莊貿易，而是因為我們的工作人員沒有始終正確實行集體農莊貿易，因為他們不善於顧到宜而實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所形成的新環境，不善於適應這個新環境來改造自己的隊伍。

(下略)

(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第一——七頁)

斯大林：在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

工作的總結報告（摘錄）

一九三四年一月廿六日

（上略）

可是，關於播種面積增加情形的統計還不能完全表明農業發展情形。有時候，播種面積雖有增加，但出產量卻沒有增加或且降低下去，這是因為播種工作變壞，每公頃面積收成率降低之故。

因此，除關於播種面積的統計而外，還必須看看關於總產量的統計。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蘇聯全國穀類作物和技術作物總產量統計表（單位百萬公担）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穀類作物	八〇一・〇	七二七・四	八三五・四	六九四・八	六九八・七	八九八・〇
棉花	七・四	八・六	一・一	一一・九	一二・七	一三・二
亞麻纖維	三・三	三・六	四・四	五・五	五・〇	五・六
糖蘿蔔	一〇九・〇	六二・五	一四〇・二	一一〇・五	六五・六	九〇・〇
油類作物	二一・五	三五・八	三六・二	五一・〇	四五・五	四六・〇

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農業改組工作最熾烈的年份，即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是穀物產量縮減得最厲害的年份。

其次，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因為在蘇棉區裡，農業改組工作速度較慢，所以蘇棉出產幾乎完全沒有受到損失，而是比較平整地和一件直前地向高漲，並保持其高度發展水準。

第三，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油類作物只受到少許的波折，與戰前水準相較始終是保持了高度發展水準；而糖蘿蔔種植業却不是如此，因為糖蘿蔔產區裡的農業改組工作速度最高，並且進入改組時期也最晚，所以在農業改組最後一年即一九三二年內，糖蘿蔔的出產有過最厲害的低落，把出產量降到了戰前水準以下。最後，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一九三三年，即改組時期完結後第一年，是穀類作物和技術作物發展過程中轉變的一年。這就是說，從今以後，穀類作物以及技術作物種植業就會腳踏實地和勇往直前地洶湧高漲起來了。

(中略)

我國農戶集體化在報告期內是怎樣發展了的呢？

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集體化統計表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集體農莊數目(單位一千)	五七·〇	八五·九	二二一·一	二二一·〇	二二四·五
集體農莊內的農戶數目(單位百萬)	一·〇	六·〇	一三·〇	一四·九	一五·二
農戶集體化百分數	三·九	二二·六	五二·七	六一·五	六五·〇

按各部分來說，穀物播種面積變動情形又是怎樣呢？

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穀物播種面積按各部分的分佈情形統計表

穀物播種面積（單位百萬公頃）

各部分在一九三三年播種

部分	類別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面積總數中 所佔百分數
(一)	國營農場	一·五	二·九	八·一	九·三	一〇·八	一〇·六
(二)	集體農莊	三·四	二九·七	六一·〇	六九·一	七五·〇	七三·九
(三)	個體農民	九一·一	六九·二	三五·三	二一·三	一五·七	一五·五
全蘇聯穀物播種面積		九六·〇	一〇一·八	一〇四·四	九九·七	一〇一·五	一〇〇·〇

這些統計表是說明什麼呢？

這些統計表說明，農業改組時期，即集體農莊及其莊員人數洶湧增長的時期，已經結束，並且是在一九三二年時就已經結束了。

所以，今後的集體化過程，將是由集體農莊來漸漸吸收和重新教育個體農戶殘餘的過程。

這就是說，集體農莊已經是最終地和永遠地勝利了（長時間的熱烈鼓掌。）

其次，這些統計表說明，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總共佔有蘇聯全國穀物播種面積總數百分之八十四點五。

這就是說，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總和起來，已成了決定全部農業及其各部門命運的力量。

其次，這些統計表說明，加入了集體農莊的農戶，即佔全國農戶總數百分之六十五的農戶，一共佔有全國穀物播種面積總數百分之七十三點九，至於所剩下佔全國農民人口總數百分之三十五的個體農戶，却只佔有全國穀物播種面積總數百分之十五點五。

此外，還要注意到一件事實，就是集體農莊在一九三三年所交給國家的各項糧食共有十億餘普特，

而個體農民也完全執行了糧食採辦的計劃，可是他們所交給國家的糧食却只有一億三千萬普特左右，但從前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度，個體農民交給國家的糧食約有七億八千萬普特，集體農莊當時交給國家的糧食不過一億二千萬普特。這件事實便是十分明顯地說明，在報告期內，集體農莊和個體農民雙方的作用已經完全改換了，集體農莊在這時期內變成了農業中的統治力量，而個體農民已變成了不得不服從和適應集體農莊制度的次要力量。

必須承認：勞動農民，我們蘇聯的農民，已經是最終地和永遠地站在社會主義紅旗下面來了。（長時期的奴才。）

（下略）

斯大林：在先進的男女收割機師會議上的演說（摘錄）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

（上略）

在我們這裡常常有人這樣說，我們已經解決了糧食的問題。如果就我們目前所處的現在的時期來說，這當然是對的。今年我們收了五十五萬普特以上的糧食。這個數目，足夠供我國人民的吃食，並且，還可以貯蓄充分的糧食，以應付一切意外事變發生時的需要。當然，這在今天已經是不壞的。可是我們不能祇限於今天，我們應當想到明天，想到最近的將來。如果從明天看起來，那末我們所達到的成績，還是不能滿意的。在最近的將來，例如在三四年之後，我們需要多少糧食呢？我們至少需七十到八十萬普特的糧食。同志們，你們看，事情是怎樣的。所以我們現在就必須採取適當的方法使糧食生產一年一年的增加起來，使我們能夠按時完成這個嚴重的任務。在過去時候，在革命前，我們國家糧食的生產約有四十到五十萬普特。這樣數量的糧食足夠與否，是另一個問題。無論怎樣，當時大家都認為是足夠了的，因為我們國家每年要輸出四萬萬到五萬萬普特的糧食。過去的情形就是這樣的，現時在蘇維埃條件之下，情形就不同了。我已經說過，我們從現在起就要準備在最近的時期，在三四年之後，達到生產七十到八十萬普特的糧食；以前是四十或五十萬普特，將來是七十或八十萬普特糧食。你們看，這裡的差別是不小的。

這個差別是怎樣產生的？我們國家的需要為什麼這樣增長起來？

這是因為我們國家已經不是如過去時候，如革命前的國家一樣。

首先就是因爲：在最近幾年來，我們的工業和城市比之舊時，至少增加了一倍。現在我們的城市居民、工業和產業工人至少比舊時增加了一倍以上。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們把好幾百萬勞動者從鄉村轉到了城市，變成了工人和職員；現在，他們同其餘的工人一塊推進我們的工業。這就是說，好幾百萬的勞動者以前在鄉村中生產糧食，現在他們不僅不生產糧食而且需要鄉村糧食的供給。而我們的城市還會增長起來，因此糧食也需要就會增加起來。

這就是糧食需要增長的第一個原因。

再則，舊時農產原料的生產比現在少些。現在我們棉花的生產比之舊時增加了一倍，至於麻和糖蘿蔔及其他等農產原料比之舊時增加得更多。結果怎樣呢？結果是種植原料的人就不能充分生產糧食。於是就必須有很多糧食來供給生產農產原料的人，使之能一天一天生產更多的農產原料，生產更多的棉花、麻、糖蘿蔔、葵花子等等。如果我們希望繼續發展我們的輕工業和食品工業，我們就不得不一天一天增加農產原料的生產。

這就是糧食需要增長的第二個原因。

還有一點，我已經說過，舊時我們每年生產四十到五十萬萬普特的糧食，沙皇的閣員經常這樣說：「雖然我們自己吃不飽，可是糧食還是要輸出的。」到底什麼人吃不飽呢？當然不是沙皇的閣員們。吃不飽的人是兩千萬到三千萬的鄉村貧農，他們真是吃不飽，祇是爲了沙皇的閣員們能把糧食輸出到國外去，他們過着饑餓的生活，過去的時候，是這樣的。現在我們是處在完全另外一個時候。蘇維埃政府是不能讓人民吃不飽的。兩三年來，我們已經沒有貧農了，沒有失業工人了，吃不飽的現象已經消滅了，我們已經很穩固地走上了富裕生活的道路。請問這兩三千萬貧農那裡去了？他們加入了集體農莊，他們已經在那裡安居樂業地生活着，並很順利創造着富裕的生活。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們現在比之

時需要更多的糧食來供給勞動農民，因為舊時的農民成了現時的集體農莊的莊員，他們在集體農莊中，應當有充分的糧食來建設自己富裕的生活。你們知道，他們已經有糧食，而且會有更多的糧食。

這就是我們國家對於糧食需要極大增長的第三個原因。

其次，現在大家都說，勞動羣衆底生活是大大改善了，日子更好過了，更快樂了。這當然是對的，但是這就使人口的增加比之舊時要快得多。死亡率減少了，繁殖率增多了，人口的純粹增長數目很快地增加。這當然是很好的，我們是歡迎這個現象的。

（滿場歡動）現在我們每年人口純粹增加數將近三百萬，這就是說，我們每年增加了整個芬蘭國一樣多的人口。（滿場大笑）既然這樣，我們就得去養活一天多似一天的人口。

這是糧食需要增加的又一原因。

末了，還有一個原因，我在上面已經講過人口，講過人口對糧食需要的增長。然而人底給養不僅僅限於糧食，他們還需要肉和油。城市底發展和增多，農產原料底增加，人口一般的增加，富裕的生活，凡此種種都要使油和肉的需要增加起來。因此，必須有經營得很好的牲畜業，有很多大牲畜和小牲畜，使能滿足人民對於肉類日益增長的需要，這都是明顯的事情。然而沒有大批的糧食來飼養牲畜，就談不到牲畜業底發展。祇有日益發達和日益開展的農業，才能造成發展牲畜業的必須條件。

這就是我們國家裡對於糧食的需要大大增長起來的又一個原因。

同志們，這些就是根本改變了我們國家底面目，並在我們面前提出刻不容緩的任務，——要使最近將來糧食的生產每年達到七十萬萬至八十萬萬普特的原因。

（下略）

斯大林 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

工作的總結報告（摘錄）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

（上略）

（乙）農業。在報告期內，農業也是和工業一樣是按高漲路線發展了。這個高漲不僅表現於農業出產量底增加，而且首先就表現於一方面是社會主義農業增長和鞏固，另一方面是個體農民經濟底滅亡。集體農莊底穀物播種面積在一九三三年是七千五百萬海克脫，而在一九三八年已增加到九千二百萬海克脫了；同時個體農民底穀物播種面積從一千五百七十萬海克脫縮減到六十萬海克脫，即縮減到全部穀物播種面積百分之六。我這不去說技術作物播種面積，在這方面，個體農民經濟底作用已等於零了。此外，大家知道，現時加入集體農莊的，共有一千八百八十萬農戶，即佔全農戶總數百分之九十三點五，而集體漁場及其他集體營業場還沒有包括在內。

這就是說，集體農莊最終就確立和鞏固了，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已是我國農業底唯一形式了。

（中略）

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穀物生產中的商品額問題，是值得特別注意的。據著名統計學家蘇蒙啓諾夫同志計算，在戰前時期，從五十萬萬普特的穀物出產總量中拿到市場上出賣的穀物，不過一十三萬萬普特左右，即佔當時穀物出產總量百分之二十六。同時，據蘇蒙啓諾夫同志計算，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這種大規模生產中的商品額，例如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度，約佔出產總量百分之四十七，而個體農民

經濟中的商品額約佔百分之十二。如果更謹慎地觀察這個問題，把一九三八年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生產中的商品額算作出產總量百分之四十，那末結果就是這樣：我國社會主義穀物業能夠供給，而且在本年度內確實供給了二十三萬萬左右普特的商品穀物，即比較前穀物生產中的商品額多過十萬萬普特。

所以，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生產中的高度商品額，是它的最重要的特點，對於國家供給有莫大的意義。

正因為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有這個特點，所以我國能很容易而迅速地解決了穀物問題，解決了為我們這個龐大國家充分供給商品穀物的問題。

應當指出，在最近三年以來，我國每年採辦的穀物數量始終沒有降到十六萬萬普特以下，有時候，例如在一九三七年間，甚至增加到十八萬萬普特。如果更加上國家每年所收買的二萬萬普特左右的穀物，以及集體農民經過集體農莊穀物貿易機構所賣出的數萬萬普特穀物，那末我們便可得出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所提供的上述商品穀物總數。

其次，還要指出，最近三年以來，商品穀物底根據地已從一向號稱我國穀倉的烏克蘭移到了北部和東部，即是移到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大家知道，最近兩三年以來，烏克蘭每年採辦的穀物將近四萬萬普特，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每年採辦的商品穀物等於十一萬萬至二十萬萬普特。

(下略)

(一九五〇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二七、三一——三二頁。)

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

工作的總結報告（摘錄）

一九五二年十月五日

（上略）

在報告所涉及的這個時期開始的時候，即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的時候，我國的集體農莊制度已經非常鞏固，集體農莊已經加強，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已經確定為唯一的農業形式了。

戰爭暫時使農業的發展停頓下來，並使它遭受了重大損失，特別時在淪陷區，希特勒侵略者在那裡破壞了、掠奪了集體農莊、農業機械站和國營農場。可是，儘管戰時的困難很大，但東部地區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却毫不間斷的以糧食供給軍隊和人民，以原料供給輕工業。如果沒有集體農莊制度，如果沒有集體農莊男女莊員們的奮不顧身的勞動，如果沒有他們的高度政治覺悟和高度組織性，我們就不能解決這個極困難的任務。

在轉向和平建設時，擺在黨面前的任務是以最快的速度恢復和進步一發展農業。在戰後時期，黨特別關切的，是在組織上和經濟上鞏固集體農莊，幫助它們恢復和進一步發展公有經濟，並在這個基礎上增進集體農莊農民們的物質福利。小集體農莊的合併對於農業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因為大集體農莊能够更順利地發展並改進公有經濟。目前有九萬七千個合併成的大集體農莊，而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的時候，它們却是二十五萬四千個小集體農莊。

由於黨和政府所採取的措施的實現，農業方面因戰爭以及接踵而來的一九四六年的嚴重旱災所引起

的困難已經勝利地克服了，在短時期內，已經恢復了而且超過了戰前的農產品生產水平。

戰後數年中，播種面積迅速恢復了，收穫量提高了，穀物、技術作物、飼料作物、蔬菜、瓜類以及其他農作物的總產量也增加了。一九五二年各種農作物的播種面積超過了戰前水平五百三十萬公頃。

戰後的第三年，穀物生產恢復到了戰前水平。今年（一九五二年）穀物的總收穫量達八

小麥——的總收穫量比一九四〇年增加了百分之

以前認為是最尖銳、最嚴重的問題——

（暴風雨般的經久不息的鼓掌）

（下略）

中又增加了，同時，商品穀物也大大增多

暴風雨般的鼓掌）而較重要的糧食作物——

鼓掌）

一樣順利地解決了，徹底而永遠地解決了。

（一九五



版，第四五——四六頁。）